

#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被邓小平称为「革命元老」的杨尚昆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上）

张闻天和刘英患难与共

由评价两位皇帝触发的两桩公案

「三出三进」祖国大门的侯健存教授

2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总第103期

# 炎黄春秋

## 陨 星 篇

2 被邓小平称为“革命元老”的杨尚昆  
..... 章学新 谢景星

11 出奇制胜的“旋风”司令韩先楚 ..... 张正隆

## 春 秋 笔

18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上) ..... 纪希晨

40 张闻天和刘英患难与共 ..... 崔向华

45 中共智斗土皇帝阎锡山 ..... 马仲廉

## 求 实 篇

51 我和于光远为“61人叛徒”假案平反作证 ..... 曾彦修

## 遗 闻 录

54 赵祖康把上海的资产档案移交陈毅 ..... 吴跃农

## 赤 子 心

59 “三出三进”祖国大门的侯健存教授 ..... 杨连元

## 群 言 堂

64 考据之学未可废 ..... 吴 江

## 两 岸 情

66 《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  
青少年时代的人和事 ..... 张光正

## 古 今 谈

70 由评价两位皇帝触发的两桩公案 ..... 李一鑫

76 “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与其友魏源 ..... 朱天策

## 故 纸 堆

79 楚图南接受“审查批斗”时  
写的“早年经历” ..... 楚泽涵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胡 绳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镛 张岂之

张国琦 欧远方 凌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美术设计\激光照排:

北京瑞和轩盛经济信息咨询中心

紫东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 被邓小平称为 “革命元老”的杨尚昆

□ 章学新 谢景星

1988年阳春4月，百花盛开。开放改革大业在中华大地阔步奋进。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云集北京。这是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第三次换届的盛会。

在七届人大的第一次会议上，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郑重向代表们推荐：国家主席是荣誉职务，应该由革命的元老担任。杨尚昆同志是革命的元老，他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代表们投票通过。于是，杨尚昆的名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第四任国家主席载入史册。

## 资深的革命家

杨尚昆于1907年出生，1925年19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离家乡四川进入上海大学。这时，国共合作的北伐大军已经接近上海，罗亦农在筹备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在华界南市一个僻静的仓库里，杨尚昆参加了训练起义工人的工作。这年，正逢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11月他被党组织选派前去学习。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希贤）都是他的学长。

1931年2月，他和张闻天乔装改扮，返回上海时，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正以武力“围剿”由朱毛红军开创的江西苏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留在上海坚持斗争，杨尚昆也在刀光剑影的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1933年春，杨尚昆进入中央苏区，先是在中央局宣传部编辑《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从这时开始，他走近毛泽东。

杨尚昆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是在江西苏区。

1933年春，在青松掩映的叶坪村一个祠堂里，《红色中华》报编辑杨尚昆前来访问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得知这个后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过四年马列主义时，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杨尚昆回答：“四川。”“你们四川有位杨闇公你知道吗？”“他是我四哥。”

杨闇公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1926年底，他和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委曾在川西的顺庆、泸州发动起义，坚守泸州40天，事为国民党右派所忌，不幸失败。这是南昌起义的前奏。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在南昌屠杀工农领袖时，四川军阀刘湘遥相呼应，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以割舌、挖眼、断手的野蛮手段杀害了杨闇公。在当时党的地方领导人中，杨闇公是第一个遇难的烈士，因此，给毛

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千世界，天涯陌路，但革命者之间又显得非常贴近，没料到六年以后，坐在毛泽东面前的竟是杨尚昆的胞弟。杨尚昆是杨尚昆走社会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杨尚昆生前自励的话：“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也成了杨尚昆继承先烈遗志的座右铭。

毛泽东当时政治上处于逆境。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大权独揽，只让他管苏维埃政府的日常事务，所以杨尚昆访问毛泽东后给《红色中华》写的两篇社论，一篇是《加紧防疫卫生运动》，另一篇是《关于夏耕运动》。



杨尚昆同志

## 彭德怀引导他认识毛泽东

1933年6月，杨尚昆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年底又去主力红军第三军团任政治委员，军团长是著名的战将彭德怀；随后杨又在党的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杨尚昆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无疑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受王明影响，政治上“排他”的结果。从“莫斯科回来”的杨尚昆虽受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重用，但他一见到赫赫有名的彭德怀，便开宗明义实话实说：“我带兵打仗是外行，到苏区的时间也很短，希望你多帮助。”

彭德怀长杨尚昆9岁。彭和杨：一个是自幼当过牧童、堤工的寒门子弟，一个是川东“名门望族”的勇敢叛逆；一个是出身行伍、久经沙场的战将，一个是出洋归来而缺乏实践的留学生；一个在战斗中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深有感受，

一个对中国革命道路“知之甚浅”；一个意志坚强，性格偏犟，一个涵厚随和，外柔内刚。但是，彼此没有私心，没有偏见，却有一颗共同的为革命的赤心，在客观事实面前，恰能刚柔相济，长短互补。杨尚昆说：“我和彭老总经常促膝谈心，彼此毫无芥蒂。”

杨尚昆真正认识毛泽东，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的战斗实践中，彭德怀则是引导他认识毛泽东的益友。

杨尚昆到三军团后，第一仗打的是福建的沙县。

1934年初，蒋介石准备以百万兵力“围

剿”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不顾红军的实力，竟然提出要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分兵作战”，命令彭、杨率三军团远离江西苏区入闽攻打沙县。彭德怀不同意分兵远征的错误决策，但无奈，只好从战术上补救。沙县驻有国民党军两个团的兵力，城坚兵骄，傲气十足。彭德怀硬是把地道挖到坚城底下，将炸药装进棺材里，埋进坑道，不但炸开城墙，强攻告捷，而且缴获颇丰。杨尚昆当然高兴，但是，彭德怀却深沉地对他说：“个别胜仗不能解决战略上分兵攻坚的错误，它 will 造成全局的被动。”

杨尚昆当时没有理解彭德怀的意思。但是，通过三溪圩的反击战和广昌保卫战，他开始认识到临时中央“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

这时，敌军已从北线和东线逼近中央苏区，采用的是陆空配合，步步为营的战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和新来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下车伊始就说：“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提出

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以“碉堡对碉堡”，“短促突击”，与强敌决战。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军主力的碉堡之间打一下，把他们“挤”出碉堡加以消灭。在广昌附近的三溪圩反击战中，红军集中了三万兵力，在敌军的碉堡缝里钻来钻去，因为没有重炮，怎么也“挤”不出敌人，枪弹只有消耗，没有缴获补充。眼看着战士们前赴后继，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争夺，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向中革军委发电报：“敌堡坚固，如继续强攻，不仅消耗兵力，而且丧失战机。”

广昌是赣南的一个小县，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县治所在地没有坚固的城墙，易攻难守。敌军11个师分两路筑堡推进。博古和李德集中了几乎全部红军，并且亲自上阵指挥，连战十天，也不得不且战且退。彭德怀不顾个人得失，再次向博古和李德进言：按照红军的条件和现在的打法，不可能固守广昌。李德不以为然，说指挥员的意志和信念是决定一切的。杨尚昆则建议大家一起视察广昌的地形，再定作战方案，刚愎自用的李德竟然说：“欧洲的城市保卫战，多数不靠高而且坚的城堡。”命令他们立即用土木修筑半永久性的碉堡工事，坚守阵地。彭德怀按捺不住地说：“就算有了较为巩固的野战工事，也经不住敌军的轰炸和炮击。如果这样固守，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三千人将遭覆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为了缓和僵局，杨尚昆和参谋长邓萍共同商定了一个决战防御的方案：派一个加强连，守备在工事内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广昌西南五公里的山上，控制制高点，待敌军攻我守备阵地时，主力从敌侧后发起突然袭击。李德和博古勉强同意，并下了最后命令说：正面守备的不得少于一个营。

4月27日，敌人出动三四十架飞机，一个炮兵旅开路，一次推进一、二千米，构筑好野战工事后，再前进一步，敌军此起彼伏、波浪式地推进，红军战士被炮火封锁得难于机动。

我正面守备的加强营，被敌人的火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几次突围受挫，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第二天广昌陷落了。

当天晚上，率直的彭德怀面对李德和博古

说：“五次战争以来，我们没打过一次好仗，这是司令部指挥的错误。”彭德怀越说越激动，甚至有些急不择言：“这次战斗，三军团要是全听了你们的话，多兵堆集广昌，全完了！红军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在你们指挥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江西苏区长征。彭德怀心情沉重地和杨尚昆说：“尚昆，在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领导我们，仗打得很顺利，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蒋介石五十万兵力长驱直入，我们只有三万多一点人，丝毫不乱，一一将敌军粉碎。这一次，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力比以前强很多，可是落得这么个结果……”彭德怀的回顾和慨叹是对杨尚昆认识毛泽东的启迪。

10月17日，红军在既不甘心而又无奈中撤离中央苏区。

兵贵神速。尤其是必要的转移，只有轻装快捷，才能摆脱追敌，争取主动。临时中央的长征却是“搬家”，在行军编队上，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五千多人，带着坛坛罐罐，前由主力红军一、三两个军团开道，两侧护卫和殿后的是其余红军，浩浩荡荡，一天的路程至少要走两天，使能征善战的红军，像是抬着两顶“轿子”的轿夫，跑不快，跳不动，在敌军围追堵截下，失去机动能力。

11月底，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由江西进入湘南，到了湘江边。这时蒋介石摸清了红军西渡湘江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了40万兵力，在湘江西岸布下了口袋阵，企图利用天堑全歼红军。27日，彭杨率红三军团占领了湘江渡口，架起了浮桥，全力抵挡住合围拢来的湘军、桂军和蒋军，但是中央纵队还在80里以外的文市。于是，坚守渡口的红军，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地面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前赴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阵地，湘江两岸出现了一场鏖战。到12月1日，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时，8万多红军损失了5万多；三军团的实力伤亡一半，第六师已不成建制，担任掩护的十八团，完成任务后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之战的悲剧，使广大红军官兵对临时中央的军事指挥完全丧失了信心，军心所向，纷纷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恢复红军的作战传统，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应运而召开。

李德曾说：“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他根本不懂得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实践，而不是书本教条和宗派观念，也根本没有料到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而对错误的军事路线反戈一击的是“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和张闻天。如果说，王稼祥和张闻天是在行军过程中在毛泽东启发和影响下觉醒的，那么，杨尚昆则是在火线上一系列的挫败中，经彭德怀的开导而觉悟的。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他以亲历的事实批判了这条以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为特征的错误军事路线。遵义会议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

## 在毛泽东指挥下奋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统率在川黔边的三万多红军，面对50万敌军，避强打弱，机动灵活，在运动中伺机击敌，演出了一曲四渡赤水的壮歌。在这场战斗中，彭、杨积极贯彻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意图，从战场实际出发，及时提出合理建议，上下齐心，军心振奋。

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红军原来准备从黔北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即命三军团攻占重要渡口土城。军委估计土城守敌是川军的四个团，不料一打响，敌军火力出乎意料的猛，侦察的结果，是三个旅共九个团。彭、杨立即向军委建议“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当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亲临前沿观察，接受了彭、杨的建议，漏夜下令全军西渡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改从宜宾附近继续渡江，这就是一渡赤水。

一渡赤水中，部队落伍较多，亟待整编。这时大量的敌军被吸引到川南，为了摆脱追敌，军委命令全军掉头东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红三军团改编后奉命向遵义以北的桐梓进军。在进军途中，彭、杨发现守备黔北门户娄山关的只

有黔军的三个团，立即抓住战机报告军委：“拟以迅速动作歼此敌。”当天深夜23时，军委下令“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并授权“全军统归彭、杨指挥”。翌日上午10时，红三军攻占娄山关，守敌仓惶向遵义南逃。时春雨绵绵，红军沿着盘山公路，以凌厉之势乘胜追击，再占遵义。这时，蒋军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渡乌江北上，孤军驰援遵义，被红一、三两军团从两边一夹，一举歼灭其大半。

遵义之战，在彭、杨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三日内击溃蒋军两个师、黔军8个团，俘敌2000，缴枪1000以上。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红军重占遵义后，在重庆督战的蒋介石判断：红军入川不成，“必向东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便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的战术，企图歼灭红军于巴黔大道地区。毛泽东当机立断，三渡赤水，一举把50万敌军像牵牛一般从赤水河东牵向河西，星夜赶筑碉堡，企图在古蔺地区和红军决战。岂料红军“出敌不意，折西向东”，在敌军的碉堡还没有筑成时，闪电式地四渡赤水。五天之内，红军在高强度的运动中，把敌军甩在河西，开始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下一步，是如何快速地扩大机动，摆脱追敌。彭、杨为此向前敌指挥部第三次提出建议。这就是转向敌兵力空虚的“东南之乌江流域”。前敌指挥部再次接受建议，授命彭、杨指挥红一、三军团迅速向南渡乌江前进。

时逢雨纷纷的清明时节，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很低，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摸不清红军去向。当红军的先头部队奇迹般地出现在乌江畔时，南岸守江的敌一个营，手足无措。在风雨呼啸中，红军先头部队乘竹筏夜渡乌江。第二天，大军分三路架设浮桥过了江，直逼贵阳，竟然出敌不意在贵阳城外贴出了红三军团的标语：“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贵阳城里只有两个团守备，蒋介石心惊肉跳，一面调整部署，力阻红军向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一面急从云南调三个旅前来增援。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即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命红军向

贵阳东北急进,迷惑敌人。当蒋军忙于部署兵力防堵红军东进时,前敌司令部命令主力红军从贵阳东南的龙里折向西南方向,大踏步向广顺、长顺西进。一时,敌我双方背向进军,成为蒋介石瞎指挥的一则笑话。彭、杨立即抓住战机向前敌指挥部建议:野战军应迅速向西渡过北盘江,“袭取”黔滇咽喉的平彝、盘县,使敌封锁困难;入滇以后,“改推进为急进”,红军“机动区域更大”。这是为前敌司令部采纳的彭、杨第四次建议,它对于中央红军跳出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北渡金沙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5月4日,中央红军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终于摆脱了追敌,凭着一双铁脚板,保存了自己,磨练了自己,不啻如虎添翼。

从此在杨尚昆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

## 大是大非不含糊

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路北上。6月中翻越海拔49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在懋功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

红军过大渡河时,蒋介石命令刘湘利用天堑歼灭红军,重演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历史悲剧;但是,红军不是太平军。令人遗憾的是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庆祝会师的热情尚未消散,张国焘的分裂野心却给红军内部带来一场政治风波。杨尚昆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斗争中紧随着毛的步伐。

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是1935年5月初撤离四川的通南巴,北上和中央红军靠拢的,一个多月内,走的路、打的仗都不多,所以军容整齐,全军号称10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8万多人。杨尚昆说:“在党中央心目中,这支队伍是党的财富,但是,张却把它当作个人的资本。在他眼里,幸存的二万多中央红军是‘兵不像兵,马不像马’,所以他拥兵自重,后来甚至说:谁有军队,谁最强,谁领导。”



1935年2月20日,毛泽东、杨尚昆等同志在长江号军舰上

6月底,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北上,先打初到松潘的胡宗南部队,占取甘南,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是发展革命的方针。张国焘却消极避战,坚持在川康地区休生养息。所以他对会议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阳奉阴违,消极抵制。

会后,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首先向甘南进军。7月初,从驻地懋功出发,一周内接连翻越雪峰连绵的梦笔、长板山、打鼓山、仑德山等四座雪山,到达黑水县的芦花。张国焘却按兵不动。直到7月中,经党中央电催,才来到芦花。这时,松潘战役的时机已被延误,张却毫不在意,反而热衷于争权,一方面以“提拔新干部”为由,要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安排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方面,则对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拉扯扯。

有一天，张国焘请杨尚昆“叙旧”。早在莫斯科时，张是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杨就认识张。回上海后，两人又在全国总工会共事，张任党团书记，杨是宣传部长，对外以表兄弟名义相掩护。在杨的心目中，张好摆老资格，听不得意见。两军会师后，在两河口时，张曾设宴招待彭德怀，说：“三军团一路上打得好苦，18000多人，只剩下二三千；我准备给你们补四个团。”后来，又派秘书送来二百块光洋，说是为彭德怀“解决困难”。彭说：我个人没有困难，若是解决部队的困难，这点钱太少，不要。事后，彭德怀对杨尚昆说：“张国焘把我当什么人看了！这是军阀收买人心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所以，张请杨“叙旧”，杨是有所警惕的。

杨尚昆说：他一见到我，就说“老杨呀！你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了，要枪杆子了，辛苦辛苦”。席间，张言不由衷，说话吞吞吐吐。杨尚昆意识到，如果触及战略方针问题，张国焘必然会跳起来，弄得不欢而散，不如说东道西，各找各的话题，应付一下。

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北上，8月初，政治局重申北上方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并将周恩来的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让给四方面军的陈昌浩，红军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当有的同志对张国焘一再要挟中央忍无可忍时，毛泽东告诫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不适宜，应用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正是在这个时候，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忽然找杨谈话：

“尚昆，你和陈昌浩不是中山大学的同学吗！”

杨尚昆说：“那时我是党支部委员，他是共青团支部委员。”

“你在江西时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你到总政治部去名正言顺。”毛泽东胸有成竹：“你们又有老关系，有利于团结。”

毛泽东还特地关照杨尚昆说：“你到那里去，要当‘牛皮糖’，不要当‘玻璃’。”他解释道：“‘玻璃’一碰就碎，‘牛皮糖’，拉不断，扯不折。总而言之要把团结搞好，不要一碰就破。”

杨尚昆心领神会。他带了原总政治部的100多干部，包括秘书长萧向荣等，到陈昌浩那

里去报到，随右路军一起过草地。到潘州时，他和陈昌浩部住在一个村子里，尽管陈昌浩不大管理他，他却奉命在那里当“牛皮糖”。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驻在潘州附近的班佑、巴西和包座一带，等候张国焘率左路军到来。但是张硬是借故拖延，一会儿说噶曲河涨水，部队过不来，一会儿又提出要南下到四川去，令人十分焦急。这时，周恩来患肝脓疡，在三军团司令部养病。一天，杨尚昆去探视周，回潘州途中遇到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他们见了杨，离鞍下马。毛说，张国焘不肯北上，反而要中央和右路军一起南下。我们只好单独北上。明天拂晓行动。你快回去和叶剑英、李维汉同志联系。

这时，叶剑英在前敌司令部任参谋长，见了杨尚昆就说：张国焘来电报，命令右路军全部南下，“彻底开展斗争”，看来是起了歹心，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央通知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他要杨以割青稞筹备粮食南下的名义，把总政治部的人带出来，向三军团驻地集中。最后叮嘱杨说：“凌晨两点钟，在村外的水磨坊会面，切勿走漏风声。”

这天子夜，月色昏暗，星光依稀，总政“筹粮”的队伍出动后，杨尚昆按约定的时间只身离开驻地，走向村外的小磨房。他们不带行李，不带警卫员，不骑马，只有叶剑英提一只小箱子，里面装着甘肃省的军用地图，毕竟参谋长想得周到。

夜气如磐。杨尚昆等走了七八里光景，忽听得身后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三人便闪身到道旁，只见十多个骑兵，挥着马鞭飞奔过来，对三个“光杆司令”没引起注意。他们继续赶路，走到一个藏民的寨子前，晨曦中，只见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向他们招手。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哩！”

在火药气味浓郁的气氛中，杨尚昆等跟随毛泽东，脱离了险境。后来才知道，张国焘已向四方面军布置了警戒，诬蔑一方面军是“逃兵”。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深明大义，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关键时刻得免于兵戎相见。

9月12日，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到了甘肃迭县的俄界村，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决定将 7000 多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杨尚昆为政治部的正副主任。这是一方面军规模最小的历史关头，但却是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先锋，担负着实现中央战略方针的重任。

一年以后，张国焘南下失败，不得不北上，实现一、二、四三方面红军的大会合在西北建立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杨尚昆说：“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没有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以后解决西安事变，和蒋介石谈判以及抗日民族解放战线，我党就没有物质基础，起不了那么大的政治作用。”

## 甘作“磨灭方休”的马掌铁

如果说，从 1945 秋，杨尚昆在延安从李富春手里接过中央办公厅的工作重担算起，到 1965 年冬离开这个岗位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整整干了 20 年。

20 年，杨尚昆在贴近毛泽东的岗位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感受。

1947 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时，毛泽东决定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继续留在陕北，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转战，拖住胡宗南的 23 万兵力，杨尚昆则和叶剑英一起，在黄河东岸的山西临汾县三交镇主持后方委员会工作，为马背上的中央发挥后勤保障和参谋作用。陕北战场上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告捷后，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中间突破，南下经中原，把战争由内线转到外线，由防御转入进攻。杨尚昆在靖边小河村的羊圈旁第一次听毛泽东说：“对蒋介石的斗争，从 1946 年算起，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1948 年 3 月，毛泽东离开陕北，向西柏坡进发，过三交镇时，对杨尚昆等人说：“同蒋介石打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 60 个月。60 个月者，五年也。前 30 个月，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 30 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客观事实完全证

实了毛的科学预言。八个月后，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后，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在军事威慑和政治争取之下，傅作义将军宣布起义，兵不血刃，使举世闻名的古都北平回到人民手中。杨尚昆在日记中言出肺腑地写道：“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以想象的。作为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步地照毛主席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胜利，实在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幸。”

20 年，在革命事业迅猛发展的岁月里，一个干部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踏实工作，没有三心二意，没有见异思迁，这是难得的。杨尚昆甘心在党的中枢，在毛泽东身边做一块“磨灭方休”的“马掌铁”。

在西柏坡时期，任弼时病了，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大管家”，杨尚昆是周恩来的助手，每天晚上，周主持“大办公”会议，把中央各部的头头找到一起，传达书记处和毛泽东的指示，许多要务，由杨尚昆组织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居于执政地位，中央办公厅是党中央的心脏，战线越来越长。中央办公厅六处三室，秘书、警卫、机要、行政、档案乃至特别会计室，联系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千头万绪；不分内务外事，不论昼夜节假，凡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有所指示，办公厅立即运作。杨尚昆兢兢业业，言行谨慎，不敢一刻懈怠，他诙谐地说：“打麻将不是有张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有些工作，虽有主管的职能部门，有时办公厅也得参与”。比如：外事工作，国务院有外交部，党中央有联络部，但是，和当时的苏共中央联系，在杨的办公室里有一条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热线；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几次出访，办公厅都要成立安全保卫的专门班子，调度力量，内外配合，连他们乘坐的飞机航班都要过问，保证万无一失；1962 年调整经济计划，压缩城市人口，书记处决定成立精简小组，由杨尚昆任组长，两年半内，城市人口压减 2600 多万，缓解了暂时经济困难；1964 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按说有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内务部，但书

记处决定由杨担任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1956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是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密切配合邓工作。在他的岗位上有大量的具体事，但都不是“小”事。

## 逆境中相忍为党

没有料到，1965年10月，祸起红墙，杨尚昆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离开了中南海。

自1962年以来，毛泽东形成一种错觉：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政军文各单位“相当的一个多数”，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1965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各大区书记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性运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10月28日，杨尚昆奉命送走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定为反党分子的彭德怀去四川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向彭表示：庐山的那件事真理可能在彭那边。杨尚昆对彭的复出心里很高兴。他没有想到，一周以后，中央通知免去杨的中办主任职务，到下面去工作两三年；由汪东兴接任中办主任。到地方去工作，是杨早有的愿望，但如此突然不免令他纳闷。三天后，杨移交完工作，上书毛泽东，请求谈一次话。第二天，11月10日，毛泽东约见了杨尚昆。毛说：

“你下去，我给你个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措施，有没有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如果有，你给我写个报告，提出你的意见；第二，中央各部门下达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如果有，你给我理一下。就这么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去做就是了。”杨尚昆答。

“你决定到广东去，广东那么热，你跑那里去干什么？！”没等杨回答，毛又说：“既然你已经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再搞两

三年。”毛泽东亲切的问话，使杨感到他对干部的关怀和期望。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主要是了解地方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有没有互相打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地方打架得很厉害。”

谈话的气氛使人感到是一次正常的调动工作。可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四人帮”称为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檄文”。一时举国上下政治上惴惴不安，大有乌云压城之势。

杨尚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向周恩来辞行。他怀着焦虑的心情问道：“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周恩来是深知杨尚昆的，但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政治形势下，他难以预料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浓眉深锁，两眼盯着杨尚昆，默默无语。然后无奈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12月10日，杨尚昆怀着对自己政治生命的迷惘感和完成毛泽东嘱托的使命感，登上了京广列车。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杨抵达广州后不久，即看到中央通知，罗瑞卿被撤掉了书记处书记、常委秘书长和公安部长等职务。“罪名”是“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杨尚昆进一步陷入迷惘和困惑。12月30日，中央又发出通知，任命杨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离开了中南海的杨尚昆不知该作如何理解？

半年以后，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中央文革小组”出台，对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专案审查”。5月22日，中央通知：“停止”杨尚昆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免除”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中共广东省肇庆地委书记。在“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中，杨尚昆是惟一被任命新职务的成员。

接到降职通知的第二天，杨发电报请求，“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28日，中央同意杨改去山西，任临汾地委书记。5月30日，他离开

广州，到山西临汾去“上任”。杨尚昆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逐步升温的，毛主席撤了我的职，还允许我革命，11月10日那次谈话，给我布置调研任务也是诚恳的，和以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是不同的。”

以后的做法，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7月3日，杨尚昆被宣布“监护审查”。从此他与外界包括家属失去一切联系。中南海里呢？从5月下旬开始横扫一切，到7月23日，中办领导不顾事实地在报告中写道：“中央办公厅为杨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又诬陷杨“包庇怀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在颠倒黑白罗织罪名下，原中办的核心领导和骨干14人被诬陷为“反党分子”揪斗，1454名干部中被立案审查者达238人，随着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被“炮打”，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所谓“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杨尚昆从山西被“揪”回北京。

整整九年里，他接受群众批斗，写不完的“交代”，作不完的“检查”。他相忍为党，等待着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盼望着切合实际的“审查”结论。随着林彪折戟沉沙，江青等被毛泽东宣布为“四人帮”，1973年，邓小平复出，接替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国的政治气候如雪后初霁。抓全面整顿，立竿见影，使他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1975年2月，杨尚昆被解除“监护”，6月，去山西临汾。6月下旬，“四人帮”控制的“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向他宣布所谓“阴谋反党”等的“结论”，并提出“清除出党”的处分。杨尚昆忍

### 更正

由于编校工作的疏忽，我刊今年第八期《雇工上将傅秋涛》一文作者漏排了谭允智同志。谭离休前是总参动员部处长、傅秋涛秘书。《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死》的作者应是柏龙驹。特此更正，并向谭允智、柏龙驹同志致歉。

本刊编辑部

无可忍了。7月18日，上书毛泽东。信中驳斥“专案委员会”的“结论”：“把我说成自从参加革命起，就是阴谋反党的。这不合事实。”他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可惜，从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健康逐渐恶化，他已经没有时间解决“文革”以来大量存在的冤假错案，在“还是安定团结好”的愿望下，把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当作一份政治遗产，留给后人去评说和处理。杨尚昆的上书，自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东方既白，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拂去了历史的尘埃，还杨尚昆以“革命元老”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 洛松)

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名刊

## 今古传奇

大浪淘沙 更显传奇本色

### “一拖三”大行动

大传奇 真传奇 短传奇 应有尽有  
传统版 纪实版 故事版 任君选择

《今古传奇》单月号(传统风格)

堂堂正正的中国气派 地地道道的民族风格

真真切切的百姓情感 实实在在的作品分量

逢单月1日出版，每册定价9元，全年6期共54元，邮发代号38-83

《今古传奇》双月号(纪实风格)

家喻户晓的真实人物 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与众不同的策划包装 独树一帜的纪实品质

逢双月1日出版，每册定价9元，全年6期共54元。

本刊自办发行，常年办理邮购，挂号邮寄，免收邮费，万无一失。

《今古传奇·故事版》月刊

一脉相承的传奇风格 拍案叫绝的精短故事

贴心贴己的大众口味 有趣有益的文化快餐

每月1日出版，32开本，每册定价2.5元，全年12期共30元，邮发代号38-349

今古传奇2001年10000人抽奖大行动

2001年，今古传奇杂志社拿出10万元回报读者，设立10000个幸运读者奖，奖品为《今古传奇20年》文集精华本。凡订阅《今古传奇》单月号、双月号 and 《今古传奇·故事版》者均可参加抽奖，详情请看《今古传奇》2000年第九、十、十一期。

本刊社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417号(430077) 咨询电话：027-86782453

# 出奇制胜的 “旋风”司令韩先楚

□ 张正隆

1946年5月，位于沈（阳）安（东——今丹东）铁路中点的小镇通远堡，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潮润的南风中，吐出些微绿意。

镇内一户高墙大院的堂屋里，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正在主持会议。

这天清晨，毛泽东从延安发来急电，要南满部队集中兵力，在中长路南端选择有战略意义的一两个大中城市展开进攻，将进攻北满的敌人拉回南满。肖华立即从安东赶来四纵，召集纵队领导研究如何行动。

纵队领导坐在炕沿或炕上，屋子里弥漫着呛鼻的关东烟味。

有人开口了：连几个“窝棚”都打不下来，还能打大中城市？

有人说：派一两个团，去沈阳或别的什么地方，放一阵枪回来就算了。

坐在炕沿上的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下地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看了起来。

1946年5月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冀东、山东八路军，苏北新四军，还有冀中、陕北部队和一些党政干部，陆续出关进入东北。东北人民本来就不大了解八路军、共产党，再加上进入东北的同为共产党的一些苏联红军纪律很坏，使东北人愈发“想中央，盼中央”。我到东北的部队原以为可以接

收大批日军武器装备，因此许多主力部队只带少量武器，有的甚至徒手，来了才发现并不尽然。当时，黑土地已经雪花飘飘了，我军还穿着单衣，因无根据地，补给无着，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国民党到东北的几个军，大都是远征缅甸的精锐之师，他们齐装满员，美械装备，后勤补给畅通，夺占山海关后逼压我军。我军从四平撤退后，国民党一直追到松花江边。东北局已经准备放弃哈尔滨，继续北撤。毛泽东发来急电，明令不得放弃哈尔滨，同时指示南满我军发起攻击，将北满之敌拉回南满。

有人说的连几个“窝棚”都打不下来，指的是不久前的沙岭战斗。四纵三个旅加一个炮团，围打新六军的一个团，打了3天3夜没打下来，却伤亡2000多人。

韩先楚是沙岭战斗当天到四纵就职的。纵队有主官，还有辽东军区的首长，他一个副职不好说什么，况且战斗已经打上了。四纵是山东部队，抗日战争，他是晋冀鲁豫的第三分区司令。他刚从抗大来这里，属“外来户”，又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就听着看着，在心里琢磨着。现在，他不能不说话了。

他认为南满这一仗必须打。他说，一些仗能不能打，并不是以能否打赢来决定的。有些仗即便连战连捷，也是不能打的。因可能惊动了敌

人，暴露了战略意图，或是分散了兵力，局部的胜利造成全局的被动、失败。但眼下是东北的战略全局要求你必须打这一仗，无论有多大困难，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打，因敌人正倾其全力进攻北满，东北我党和军队的首脑机关都在北满，必须策应、保护他们，把敌人拉回来，减轻他们的压力。你不打，苟安于一时，待敌人把北满收拾完了再回过头来，你也完了。

促使韩先楚下决心的首要因素，就是这一仗在战略全局上的地位。随着职务的提升，不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使他的胸襟和视野，超越局限而纵横全局。

韩先楚认为：现在根本不是研究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研究打哪儿，怎么打。他用手指着军用地图上的“鞍山”，又向下一划，定在“海城”上。他说：“毛主席让我们在中长路南端选择有战略意义的一两个大中城市，我认为就应该在这两个地方动刀子。”

他接着说道：从客观上看，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北满，南满空虚，兵力分散，正是我们用兵的时机。大家知道，六十军是云南龙云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老蒋有矛盾，日本投降后老蒋又把龙云抓了起来。这些因素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一仗不仅必须打，而且能打好。

有人沉思，有人点头，也有人摇头。

肖华道：“我看这一仗就由你来指挥吧。”

韩先楚道：“纵队司令调军区工作了，第一副司令还在休养，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肖华说：“好，你就带四个团去打一仗。”

韩先楚感到惊愕：四个团打什么仗啊！

肖华有些为难：十二师正在沈安线上与敌对峙，大打也只能是十师和十一师。

韩先楚说：最少也得两个师，再加上炮团。

肖华沉思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十师、十一师、炮团，还有辽南军分区两个独立团，都给你，大打！”

部队冒雨出发了。

鞍山、海城、大石桥，敌人一八四师三个团沿着中长路上的这三个点一线摆开。得知四纵行动，敌师长潘朔端判断是要攻取大石桥，就将注意力投向那里。韩先楚很快得到这个情报，将计就计，将辽南独立团留在那里，作出要攻打大石桥的样子，自己率领主力直扑鞍山。

十师是四纵主力，下属二十九团更是主力中的主力。在团长杨忠基的率领下，很快拿下城外制高点神社山，又尾追溃逃之敌打进市内，一鼓作气攻下敌五五一团指挥所驻地伪市公署大楼。还在外围的二十八团急了，团长胡润生红了眼睛，要组织敢死队，被韩先楚制止了。

见副司令来了，大家就焦急地等着他出点子、拿主意。谁知他却下令暂缓攻击，然后坐在那里，挺有耐性地审讯起俘虏来了。

韩先楚估计，这仗下来，我军伤亡当在一半左右，甚至更多。他的既定方针是，哪怕伤亡过半，部队打残了，只要能够达到战役目的，就是成功。打着打着，一个问号在他脑子里闪了出



韩先楚(中)与同班战友刘震(左)、陈先瑞(右)合影

来：能不能迫使这个一八四师放下武器，甚至投诚、起义？

我军进入东北后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些部队，有些改编、收编的伪军警部队，经不起打，有的战斗打响了一触即溃，有的听说国民党来了就散了、垮了，有的干脆就哗变反了水。四平撤退后，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副科长，都带着文件投敌了。就连捉到的俘虏，一个个也梗着脖子叫号，说你们只会偷偷摸摸搞我们，这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咱们拉开架势打一场试试？实实在在，这时敌对双方脱离自己队伍的人，我军比敌人多得多。而眼下又正是南北满我军开小差逃亡的高峰期，也是敌人最嚣张、狂傲的时候。可韩先楚却在这当口打起这个注意，岂不是异想天开吗？

比之国民党到东北的其他主力，这个一八四师装备、战斗力是差的，我军装备则更差，可作风勇猛顽强，战斗力就成倍增大。这个一八四师差的就是股顽强劲儿。他认为不应简单、笼统地将此视为一般敌人的共性，而是要重视其特殊背景中的个性。他觉得一个高明的指挥员就是要窥准对手的死穴，巧施重拳，才能获取出人意料的成功。

审问了几个俘虏，那滇地口音实在难懂，只能听出个大概：都说抗战胜利了，本想复员建国，也没想到还要打仗，他们不想打仗，更不想到东北来打仗；说国民党对滇军控制很严，他们还是从家信中得知龙云被老蒋抓起来了；都说老蒋没安好心，把他们赶到东北是利用共产党消灭异己，看不到前途和希望。

韩先楚觉得有门儿。他立即下令加强政治攻势，开展战场喊话；同时从俘虏中选了个40多岁的司务长，向他说明我军政策，让他回去相机把队伍拉过来，投降、投诚、起义都行。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司务长就带着连长，把守在前面桥头的一个连领过来了。

韩先楚眼前一下子敞亮起来，马上召集会议，说明还是要猛打狠打，往死里打，打到一定火候，就要展开政治攻势，用攻心战术使其放弃抵抗。兵书上讲“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否则，你一味往死里打，他就会

也跟你往死里打，打光了算，这种打法不划算。

韩先楚不失时机地派人进去谈判。一个马营长率部放下武器，拿着韩先楚写给一八四师师长的一封信，去海城交给了潘朔端。

战役初打时，潘朔端已惶惶不安，杜聿明明令他坚守到一人一枪。眼下鞍山已失，海城城破，枪炮声越来越近，从那玉皇山上飞来的炮弹，一发发不紧不慢就在这师部四周爆炸，发发都像落在他心上。

韩先楚的那封信潘仔细读了，他承认信中所说都是事实。令他不解的倒是这些共产党将军，特别是这个韩先楚。战役刚发起，就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丝丝入扣，步步紧逼。

他不知道那炮是韩先楚让那样打的，但他能体悟出个中的韵味。于是那一发发炮弹就像一个一个问号，在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炸响着：投降？投诚？起义？还是为老蒋殉葬，将一八四师的云南子弟抛扔在黑土地，成为孤魂野鬼？

他选择了起义。

当杜聿明从北满调来的援军急火火赶到南满时，潘朔端已率一八四师师部和五五二团2700余人起义，早随着四纵转移了。

鞍海战役的大捷直接影响了东北国共两党棋盘上的走势。

韩先楚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把一些人不想打、也不敢打，即使打了也是一场不负责任的滑头仗，决战决胜地打了个满堂彩！

一八四师被歼，国民党调整部署，决定首先扫荡南满，稳固后方，再向北满进犯。9月，杜聿明调集八个师10余万人，从沈阳地区出发，分左右三路向南压来。韩先楚接到辽东军区命令，立即率队驰奔新开岭歼敌。

拂晓赶到十一师指挥所，这里已激战了三天三夜，部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师长蔡正国板着脸告诉韩先楚：刚接到纵队指挥所电话，要我们停止战斗，准备撤退。

撤退？为什么？韩先楚愣了一下，随即赶到纵队指挥所。

胡奇才司令告诉他：面前这个二十五师，是国民党的嫡系精锐，全部美械装备。抗战时期远征印度，参加打通印缅公路战役，以敢于承担艰

险任务、善于迂回包围著称，号称“千里驹”。这个师近万人。而四纵算上还在路上的十师，只有1.6万人，装备又不如敌人。还是照毛主席的老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韩先楚听罢，急急地说：敌变我变，兵力不足，这里地形却十分有利，可以弥补。司令员，这是千载难逢的歼灭战的好地方，你这地形和战机抓得太好了。机不可失，这一仗一定能打好！

韩先楚又说：十一师的同志不同意撤退，十二师什么意见？胡奇才道：十二师正向敌人侧后运动，可能还没到达指定位置，没接到通知。韩先楚道：十二师没接到通知会吃亏的，那就更不能走了。韩建议成立一个前线指挥所，司令、政委留在基本指挥所，自己到前面指挥作战。四纵政委彭嘉庆，赞同韩先楚的意见。胡奇才咬咬牙：打！

黄埔4期毕业的国军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一个50多岁的老资格军人，根本就没把面前的对手放在眼里。他一路挥军紧追四纵到新开岭，连两边的村庄都不搜索。在沈阳坐镇的杜聿明，发现“千里驹”进入的是个死地，立即下令北路、南路、西路的一九五师、二师和新六军二十二师，分头开进新开岭护卫。

大凡骄横者都是有点本钱的。“千里驹”马不停蹄，到了就打，看准老爷岭是个要点，很快将其拿下。

新开岭周围起伏的群山间不断的枪炮声，因雨雪雾障而显得沉闷、滞重。敌攻我守，我攻敌守，双方搅杀在一起，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老爷岭下一处山凹里，几块褥单、包袱皮用铁丝缝联起来，四角扯开绑在半空中树干上，下面一台日式军用电话，周围几个参谋，这就是四纵前线指挥所了。

韩先楚站在指挥所前，右手拿着望远镜观察老爷岭，他咬牙切齿地说：“拿不下老爷岭，我韩先楚不做人！”

胡奇才打电话来了：老韩，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韩先楚觉出有点不对劲儿：司令

员，我已经看过地形，马上要去警卫营，让他们从十师和十一师中间插过去，配合二十八团从侧面发起攻击，争取今天晚上拿下老爷岭。

傍晚，政委彭嘉庆又打来电话，要他回去参加党委扩大会议。鞍海战役是一鼓作气，新开岭打得一波三折。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对于战国初期杰出军事家吴起的这句话，在座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成员在此刻应是体味到的。

中等个头，长得很壮实的胡奇才，神态十分严峻：如果不能尽快吃掉二十五师，三面援敌上来，我们将陷于被动。大家要认真考虑考虑，我们是打下去，还是撤出去。是打，是撤，都要快，要争取时间。

胡奇才才是员虎将，向以勇猛顽强、敢打硬仗著称。辽沈战役中塔山阻击战，林彪、罗荣桓指名要他到塔山村前线坐镇指挥。有他在那儿，你就往死里打拼命仗去吧，谁也休想后退一步。而新开岭战役能够全歼这个全美械装备的二十五师，首先就在于他决心硬，有眼力，善抓战机，将这个“千里驹”引入了死地。

韩先楚开门见山：我不同意撤。

他说：现在战场成胶着状态，双方咬在一起，想撤，一些部队、伤员也撤不出来。那个上来的新二十二师虽然离我们只有15公里，但我们还可以阻击迟滞它一天时间，这期间战场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困难很大，敌人的困难也很大，就看谁能咬紧牙、咬到底，谁就能把对手顶倒、吃掉！

他把目光对准党委书记：我认为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孤注一掷，把全部力量都投进去。

有人赞同，更多的人则是反对，有人甚至认为现在根本不是打不打的的问题，而是撤不撤的问题。打了3天3夜，老爷岭连攻九次未拿下，部队伤亡三分之一，再打下去也是白打，晚了怕是想走都来不及了。

一个极力主张撤退的团长，说伤亡太大，全团就剩几百人了。韩先楚立即顶回去：不对，你至少还有千把人。

后来有人问他你去看过吗？他说没有。那你

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从那枪炮声中,就能知道他还有多少人。”

这是山脚下的一幢草房,东北农家常见的南北大炕上,坐着参加党委扩大会的近20个人,显得有些挤。随着映红窗纸的一声轰响,吊在墙上的煤油灯的火苗就忽闪一下。争论激烈时,外面世界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沉寂下来,谁点支烟,火柴哧啦一声,就好像要把室内的空气点燃了。

一场争论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攻击老爷岭的战斗。

有人说,对于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打仗打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个决心。

据说,在主撤派占了上风,眼看着就要形成决议时,韩先楚吼了起来:要撤你们撤,把部队给我留下来!

韩先楚的光火,使得党委书记和纵队司令都改变了决心。

最后形成的决议是:将纵队预备队三十团也拉上去,集中全部炮兵,全力攻击老爷岭,打到明天上午12点再打不下来,立即撤退。

一夜未合眼,韩先楚只觉得秒针咔咔地跑得飞快,恨不能将时针拨回几圈。

很巧,40辆马车拉着炮弹赶到了。韩先楚长长地呼出口气,顿觉一颗心落到了实处。

韩先楚来到炮兵阵地,亲自与纵队炮团团长王一平和辽东军区炮团团长刘莫亚,组织步炮协同。他要求炮兵一律向前移动,各门火炮要拉到距敌主阵地500米至1000米内,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又通知各师山炮营,将一部分山炮分解开,搬上前沿阵地,距敌200米以内抵近射击,给步兵当手榴弹用。

夜暗中,炮团向前开进了,三十团向老爷岭侧后两翼运动了。二十八团团长胡润生、政委张继璜,还把全团机关干部、炊事员,还有轮训队的学员,编成一个突击队。团长任队长,政委当指导员,关键时刻亲自率队冲锋。

拂晓时分,攻击开始了。

老爷岭下的炮声与老爷岭上的爆炸声,分不出点儿,硝烟弥漫中,只见上面碉堡的砖石和敌人尸体,不断被抛向空中。就在炮兵转移射向,开始轰击老爷岭北侧山坡上敌人二梯队援兵后不久,我军已从三面攻上老爷岭主峰。炮火随即又转向黄家堡子二十五师指挥所,一辆辆汽车、装甲车、辎重车在雪地上燃起熊熊大火。

韩先楚看表,还不到8点。



1951年韩先楚(右二)、肖剑飞(左一)和两位人民军将军合影

为了实现其“先南后北”战略,3月下旬,杜聿明重又调集重兵,向我临江根据地压来。辽东军区决定由三纵司令曾克林和四纵副司令韩先楚,组成前方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三纵和四纵十师,迎击来犯之敌。

曾克林看中的是敌暂编二十师,把它作为首攻对象。

暂编二十师是云南部队,装备、战斗力一般,位于外翼侧,从外翼侧一步一步打下去,较为稳妥有利。

韩先楚盯住的却是最突出的敌八十九师。

这个师为蒋介石嫡系主力,全美械装备,战力很强。但他们



不熟悉南满地形，不了解我南满部队的战斗作风。且一路轻敌冒进，我军正可利用这一弱点，诱敌深入，将其全歼。

曾克林对这位四纵副司令员深怀敬意。可眼下他不去拣软的捏，挑弱的打，却要硬碰硬，这不是太冒险了吗？

双方言辞都不激烈，但都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那言来语去碰出火星子。

这时，四纵作战科长肖剑飞，在韩先楚耳边参谋了一句：别争了，是否把两种方案都报告辽东军区，请军区首长定夺吧。

肖剑飞，认定军区会同意韩先楚的方案，却未想到陈云、肖劲光签名的复电中，还写着这样一行字：“由韩先楚统一指挥三、四纵作战。”

应该说，在韩先楚的方案只有他自己一票赞同的情况下，人们只是在无条件地执行军区的命令。现在，这位让人一时间还不知称其为“指挥”还是“总指挥”的四纵副司令，又提出要在白天发起总攻，即便听过作战方案、部署后开了心窍的人，也不免顿生疑窦了。过去都是夜间攻击，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是我军的老战法，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本来就是硬碰硬了，这下子敌人不就更硬了吗？这是打的哪门子仗呀？

韩先楚道：如果八师二十三团和十师二十九团诱敌成功，那么，4月3日早晨，敌人就仍将处于麻痹状态向三源浦行进中。这样，敌无工事可守，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迅速、大量歼灭敌人。而且这一带地形复杂，土地爷是我们的朋友，便于我军隐蔽埋伏，近战歼敌。

他在一个多小时的作战会议部署中，突出强调两个字：“示弱。”

他指着墙上地图上八十九师的位置：要诱使他再前进一步，只准使用轻武器，六〇炮以上火器一律不准开火。转移阵地时，要显得混乱些，以显示我军是地方部队或游击队。一句话，要顺着敌人的嚣张狂傲、藐视我军的心理，不断地示弱、示弱、再示弱，让这头蠢牛按着我们的节拍跳舞。

果然，一路追来的八十九师，越追就越趾高气扬，师长万宅仁甚至嘲笑起他的同行：都说南满共军厉害，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到底是他们

厉害，还是你们都是熊蛋！

刹那间，寂静的雪野卷起猛烈的旋风。先是子弹、手榴弹、六〇炮弹泼水般地泻来，榴弹炮弹炸起烟尘雪柱搅暗了半边天。接着就是四下里狂潮般扑涌过来的人海，嘹亮的号音伴着雷鸣般的杀声，山呼海啸，摇天撼地。

万宅仁算是最早见识了“旋风部队”的国民党将军了。

10小时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一个加强师，并俘八十九师代理师长张孝堂以下7500余人。这场战斗，就是史称的第四次临江保卫战。

1947年9月下旬，四纵副司令韩先楚调任三纵司令。

此时，东北解放军发起秋季攻势，东总要求三纵歼灭开原县的一一六师。

政委罗舜初主持研讨作战方案。

罗舜初指着地图：大家看到了，这个师在开原威远堡、西丰，距沈阳不到200公里，又骑在铁路、公路上，又是机械化装备，交通便利，沈阳敌人说到就到了。这次作战，上级没有给我们配属打援的部队，一切都靠自己料理。所以，我认为应该集中全纵兵力，首先打击、歼灭西丰之敌。

罗舜初来三纵之前，是辽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自然是韩先楚的上级。罗舜初长期做军事工作，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军事上有一套。而且三纵干部大都是他从山东带来的，在鲁中指挥部队打了许多好仗，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未等讲完，许多人表态，认为这是个稳妥、可行的方案。

罗舜初望着坐在长条凳子上的韩先楚说：“下面，请韩司令讲讲。”韩先楚开口就是：我不同意罗政委的意见。

他说：“东总”发动秋季攻势的作战意图，就是趁敌人主力西调辽西之际，在中长路上大量消灭敌人。“东总”对我们三纵的指示也很明确，就是要吃掉这个一一六师，所以我们制定作战方案的目标也只能是这个。那么，怎样才能吃掉它呢？

他站了起来，将手中抽了半截的香烟扔掉，

手指地图：我的设想是，先来它个长距离奔袭，用“掏心”战术直扑威远堡的一一六师师部……

这个方案也太出人意料，太大胆、太冒险了，不能不让人想到那个“万一”了。与会的师以上干部和司令部的科长们出于对老首长的尊敬、信赖，甚至忠诚，一些人使大劲也只能是个不吱声。

一阵难耐的沉默后，八师副师长杨树元站了出来，说：“韩司令这个‘掏心’战术好，大胆，出奇，胜利大，伤亡小，我举双手赞成！”

韩先楚只高兴了一会儿，就莫名其妙地发现杨树元的发言，反倒使他更不利了。原来，杨树元是冀东来的，打仗是员虎将，有人却认为他马虎、冒失，不稳当。结果，一些稳重的人也就更加稳重起来，认为韩先楚的方案欠稳重了。

韩先楚有些急，指着面前七师政委的鼻子点起将来：“李伯秋同志，你是什么意见？说出来嘛！”

李伯秋还真就赞同韩先楚的方案：“掏心战术是个奇思妙想，高招绝招，敌人是想不到的。但有一条，必须速战速决，未等援兵上来，就要结束战斗。”

没有比在苦战中受到火力支持更让人激动、兴奋的了。韩先楚趁热打铁，又点了七师师长邓岳的名字。他对三纵的干部情况不大了解，但他认为邓岳肯定会站到他一边。邓岳是湖北麻城人，都是鄂东老乡，红四方面军的，彼此比较了解。两人又在延安抗大学习、工作两年，而且七师是主力，说话自然有分量。

邓岳却迎头泼来一盆凉水：开原、威远堡一带还有五十三军两个师，会那么容易就让我们插进去？就是插进去了，被敌人缠住了又怎么办？弄不好，就是送上门去让人家掏心了。

争来论去，赞同他的只有两票。

碰上这种方案之争，通常是应由司令员进行决断的。所以身为副司令时，他必须全力阻截，据理力争，以使正确的决心能够得以贯彻、执行。现在他已成了司令，若在别的场合，他可以说一句“我是司令，军事、作战由我负责。”可眼下是党委扩大会，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的，何况他还是一个上任不到3天的司令。怎么办？争来

论去，最后惟一的办法还是老办法，将两个方案同时上报，请“东总”裁决。

第二天下午，署名“林罗刘”的复电到了：“按先楚案实施战斗。”

9月29日，各师团开始向攻击和阻援地域运动。未出发即下雨，秋雨阴凉，道路湿滑。

经一天半夜强行军100公里，第二天拂晓前，陆续进入指定位置。

侦察科长郑需凡带个骑兵班，从前边侦察回来，半路上碰见韩先楚。见司令身边就作战科长和几个参谋、警卫员，郑科长批评韩先楚：“离大部队这么远，身边连个警卫排都没有，您的胆也大得太出格了！”

韩先楚不理会说，咱们找个能看到威远堡的地方。一行20多人就爬上距威远堡一公里多远的东山。

夜暗中，七师前卫二十团和纵队炮团，陆续从山下通过，对面的威远堡鸦雀无声。

天色逐渐亮了，在轮廓越来越清晰的镇子里，突然响起一阵起床号。

在起床号中醒来的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听到枪炮声和报告后，第一个反应是共军是从哪里来的呀，我是不是还未睡醒，还在梦中呀？第一个动作是给三十师、一三零师发报求救，第二个动作是给西丰、莲花街的三四六团、三四八团下令，让它们立即赶来救援师部。当这两个团与其说是遵从他的命令，倒不如说是按照韩先楚的意志，乖乖地进入三纵打援部队的伏击地域时，他也到了只有落荒而逃的份上了。

最后一个动作，是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他蹲在一片待割的高粱地里，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

在威远堡战后总结时，罗舜初说：韩司令用兵，不拘一格，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向他学习。

从鞍海战役到威远堡战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分局、辽东军区，不断地给韩先楚率领的部队以通电表彰。

国民党也不吝啬褒赞。威远堡战斗后，一些国民党军队敬畏地称三纵为“旋风部队”。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上)

□ 纪希晨

编者按:本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

作者是党的老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他不仅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还曾亲自访问过领导指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有许多鲜为人知。

本文选自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中的一章,该章原题为《十月春雷》。现在这个题目为本刊编辑所加,看来虽直白了一些,独立发表却较引人注目。全文将分上、下两部分在本刊连载,特此敬告读者。

## 最后的岁月

健康情况一直较好的毛泽东,曾以矫健的体魄,乘风破浪,横渡万里长江。

但是从1971年“九一三”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他的身体就日渐走下坡路了。林彪,这个被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上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的驾机逃亡,给毛泽东以极大的精神创伤。

这次事件的打击如此沉重,即使像毛泽东这样身经百战,饱经沧桑,扭转了历史巨轮的伟人,也是难以承受的。尽管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批阅文件、主持会议,听取报告;像往昔一样的在宽大空旷的厅堂里踱步,从窗口凝望云天,远远注目着中南海的风光,但是总难以压抑内心的痛苦和烦恼。他两天两夜不曾睡觉,不停地在房

间的地毯上踱步……

他感到孤独了,他常常躺进长沙发里,点燃一支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他手捧着头,望着烟头上的一丝青烟,陷入长时间的思考……

1971年11月下旬,毛泽东曾患过一次重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脱险,但是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复原,一双脚浮肿得很厉害。原先的鞋不能穿了,身边的人员只好赶制了两双大拖鞋,让毛泽东散步时穿。

由于受健康情况的限制,他只能在中南海住地的“游泳池”,被人搀扶着往来散步。他走过一段草地,沐浴着温柔的阳光,倚在栏杆上,迎着水波荡漾的湖面,从郁郁葱葱的树林间,眺望着远处的红墙。

1972年1月6日,在井冈山上同毛泽东长期坚持战斗的陈毅元帅,患癌症逝世了。

8日,毛泽东亲自在病床上签发了陈毅追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悼会的文件。他清楚记得召开追悼会的时间与地点。因之，10日下午3时，午睡过后，他准时地缓缓从病床上坐起身，摸索着穿上拖鞋，只穿一件睡衣，便急匆匆地走出卧室，他对进来的工作人员说：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身边同志急忙给他加了一件大衣，就急匆匆地扶他进了汽车。这天，严寒封冻着大地，刮着黄风的天空，变得混沌沌的。路旁被北风吹卷的落叶，发出萧萧飒飒的响声，象是在哭泣。

周恩来总理一听到毛主席要参加陈毅追悼会，立刻通知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去开会，他并且立即坐进大红旗车，加速追赶毛泽东的汽车，提前到达八宝山。在灵堂的休息室内，周恩来总理临时为毛主席调来十多只电炉。尽管如此，休息室里仍然很冷，顶不住寒冷的吹袭。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他看见陈毅夫人张茜进来，握住她的手，无限深情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西哈努克亲王来了。毛泽东坦率地向他谈了林彪事件。

“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逃跑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

毛泽东移动一下身体，面向在座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地说：

“林彪是打倒你们老师的，我们的老师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又是公开的。”

说到这里，他抬起右手，歉意地指着在座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责怪地说：

“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在场的几位老师，一个也没有说话，他们相互望了望，不自然地笑着，在心底里默默地说：那时候连面都难见上，哪还能说上话呵！

一阵哀乐响起，毛泽东被张茜搀扶着走进灵堂，工作人员在他那件银灰色的大衣袖上，缠上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摆满花圈挽联的灵堂中央，沉重地致悼词。他读着不足600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全场一片呜咽声、抽泣声。当毛泽东在灵堂陈毅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时，全场呜咽之声，再次响彻瓦屋。

毛泽东因为身着睡衣参加追悼会，天寒受凉，回来就感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引起气管炎、肺炎、心脏病。肺气肿又复发了。据医生说，毛泽东的左肺上有三个大的空泡，呼吸困难，他常常只能借助美国赠送的呼吸器呼吸，几次急救中出现了虚脱的危险症状。

## 病中的会谈

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刚到北京两小时，就在中南海那间陈设简单、朴素的房间里，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

当时，毛泽东脸部、手部浮肿，眼皮下涌起几道皱纹。两只脚浮肿得也很厉害，只在有人搀扶时才能艰难地移动脚步。周恩来总理原计划让他只会晤15分钟，可是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谈，却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兴致勃勃，他风趣而幽默的谈话，给尼克松留下极深的印象。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座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

“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利索了。周恩来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在这次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会谈里，尼克松称赞：“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是毛泽东却谦虚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尼克松写道，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想象闪电一样敏捷。当他们谈到总统大选时，毛爽朗地笑着说：“上次选举时，我也投了你一票。”

“我喜欢右派，”毛开心地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事关紧要的

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会谈产生了震惊世界的《中美联合公报》。它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23年没有交往的两个国家，从此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在尼克松告辞的时候，毛泽东拖着脚步慢慢陪送尼克松走到门口。他对尼克松说，他身体不好。

尼克松说：“不过你气色很好。”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长期被慢性肺炎折磨，心脏患病，1976年5月、6月、9月曾连续三次发生心肌梗塞。在他与死神搏斗期间，报刊广播的新闻里，却千篇一律的称呼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隐瞒了真相，欺骗了公众。

### “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1989年10月5日上午9时，我在铁道部老干部局办公室访问了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在主席逝世后，回到铁道部，分配做老干部工作。她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大而明亮的眼睛，文静、大方、端庄的神态，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张玉凤出身工人家庭，14岁参加铁路工作，18岁在长沙专列上，开始在毛泽东身边从事机要保健工作。

张玉凤脸色苍白、憔悴。主席的逝世，精神的压力，流言蜚语的创伤，使她过早地显老了。当时她刚刚45岁，黑发里已露出丝丝白发了。她用手指按着自己的脸庞，一按一个坑。她说：“你看，我的脸上还有点肿！”

张玉凤的丈夫刘全生在铁道部门工作。他们有两个聪明、漂亮的女儿，都已上中学，一家四口过得很幸福。

张玉凤回忆说：“当时，‘文革’进入第四年，毛主席被无数‘万寿无疆’、‘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颂词所神化，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并非如此，而被严格保密，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高级干部也很难知道。但他毕竟是76岁高龄

的老人了，加上大权独揽，日理万机，平常又过分自信，不愿请医生看病。因而多种疾病逐渐缠身。从1970年开始，每到开春、冬日时节总要生病，患的是老年人最怕的大叶性肺炎，又因气管炎，昼夜咳嗽。有段时间，老人家已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繁重的日常护理工作大都落在我和一些服务员身上。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给老人家精神上的打击极大，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这年冬天，老人家曾经昏迷休克过一次……”

毛泽东说话口音不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惟有张玉风能听懂毛主席的话。所以，张玉凤在主席接见外宾和中国同志时，总是担任不是翻译的“翻译”。

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笔者，在病中，毛泽东睡眠时间很少，醒来就躺在床上，或靠在沙发上，忙着批阅重要文件。1973年到1975年，他走路虽有困难，但肺气肿、心脏病却都有好转。

1975年到1976年初，毛泽东的肺心病加重了，不能起来，成了半瘫的老人。他不能进食，全靠医生给鼻饲。说话也很困难，说不清楚，但是可以用一只眼睛，看大字印刷的报纸。1974年春，毛泽东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有一次，对江青的一封信，是毛泽东躺在床上批的，有几个字都叠在一起了。眼睛的白内障病也日益严重起来，以致发展到双目失明。

眼睛失明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特别是象主席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都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全国的党政军大事，从全国各地向他涌来，文件堆在办公桌上。在双目

失明的情况下，文件、信件、报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为他朗读，遇有请示报告，有时靠主席口述，由秘书代写。

在毛泽东眼睛失明的近两年时间，他的日常生活，他的穿衣、吃饭、服药、走动，无一不要人照顾。机要秘书张玉凤更是日夜付出辛勤劳动。她那端庄美丽的姿态，温柔沉静的性格，落落大方的神采，乌黑含笑的眼睛，好学上进的精神，任劳任怨的作风，特别是她对主席无微不至的照顾，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好感。张玉凤日夜为他一口口饮水、服药、吃饭连续达四年之久。

一次，主席一口痰吐不出来，医生不在身边，听到喉咙里咯咯地响，张玉凤立刻跪在床边，亲手为他掏痰，避免了危险。这表现了她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领袖的无比崇敬和热爱。

毛泽东在晚年，病多，心情又不好，容易发脾气。有一次，因为弄录音机的事，主席生气了，他对张玉凤说：“不高兴，你就给我滚！”

张玉凤脾气也很直。她二话没说，拿起小包就走了。回家后，心情很不平静，不愿见人，更不愿与人讲话。

后来，毛泽东又请她回中南海工作。毛泽东



1975年11月，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图为清华大学大字报专栏

对她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发。”

1975年8月，唐由之医生非常成功地为毛泽东进行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恢复视力以后，他又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他不听医生、秘书的多次劝阻，不顾病弱的身体，躺在床上，一手举着书报，一手拿只放大镜看，一连几个小时阅读批示文件。有时，他实在太累了，无法工作了，便仰卧在床上，背后垫上枕头，暂时休息一下。

这时，他的手抖个不停。这双大而柔厚的手，过去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批示过千万文电，书写过亿万字的瀚海书林，如今却显现出条条青筋，连自己拿书和文件的能力也没有了。

毛泽东常常咳嗽不止。他每次带着极大的痛苦呼吸着，嘴唇抽搐地一张一合。他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了。有些日子，每天都吸氧气，听不清楚讲话，每餐只能吃一、二两饭。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这更加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灵，刺伤了他的精神世界。

1976年1月8日，当他在病床上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他手捧报告，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一字一句地阅读着关于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和有关悼词的请示报告。他让秘书递给他一支笔，在自己的名下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万语千言，毛泽东用这个圆圈寄托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的哀思，他的眼睛红了。他嘴唇痛苦地抽搐着，两行老泪顺着面颊流下，滴在胸前的睡衣上，他悲痛得泣不成声。

守在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看见主席如此悲痛，一边扶着他的肩膀，替他揩着眼泪，一边轻声向他请示：

“主席，你要不要去参加周总理追悼会？”

主席点点头，脸上现出凄凉和悲伤，闭着双眼，痛苦而吃力地拍拍腿，无力地说：

“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1976年5、6月间，毛泽东健康状况明显恶化。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一面积极抢救，一面把主席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各省市负责同志通报。后来，经过抢救

转危为安了。

7月初，朱德委员长突然逝世。不到半年时间毛、周、朱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三位老战友痛失两位。老人家精神上很受刺激。他通常以诵诗读赋寄托自己寂寞悲凉的感情。

一天，他让秘书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在床边给他连续朗读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就自己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的背诵：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以何堪。”

1976年7月28日清晨的唐山大地震，对毛泽东又是一次重大震动。后来，当他得知地震中死亡24万人、伤16万多人时，毛泽东已成了半瘫痪的病人。为保护主席的安全，在强烈余震中将毛泽东由中南海游泳池，搬进附近新建的一座坚固的抗震力很强的“二〇二”办公室。他在这座厦房内，虽然不能多讲话，但仍十分关切灾难的情况，亲自批阅有关地震灾情的报告。

8月28日，毛泽东前妻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来看望他。在问了李敏今年多大岁数以后，他紧紧握住女儿的手，泪水盈满了眼睛。他闭目沉思良久，准确地说出了李敏的出生年月。

毛泽东随着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变得极烦躁，他不愿多讲话，也不愿多见人，心情也很悲凉。他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直望着宽敞的卧室，注视着窗帘缝里射进的阳光。有时，他像想起了什么事，轻轻地摇着头，低声地说着什么，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一天，张玉凤给毛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自己也跟着背诵起来，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

他常常独自饮泣，含泪背吟《史记·汲郑列传》的最后一句话：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一天，毛泽东用手势招呼张玉凤走近跟前。他要她准备笔墨纸张，亲自把这几句话，书

赠给她，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别人展览的偶像！”

## 诀别和哀悼

毛泽东病重期间，一直住在中南海为他特别建造的二〇二号房内。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病榻上对守护在身边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回顾自己的一生和往事时，曾这样感叹地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他接着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的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

第二件事，他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许多曲折，并且造就“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巨大的错误。即是如此，历史也不会忘记，他在完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为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从1976年6月起，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开始轮流在毛泽东身边值班。经常单人值班的，有毛泽东私人医生率领的医疗组，有党中央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

毛泽东尽管病情日益严重，头脑却一直很清醒。直到他逝世前5小时，还在看书报文件。

毛泽东病危期间，江青却带着她的人马到大寨“蹲点”、“视察”。9月5日，第一副主席华

国锋打电话催她回北京。9月7日下午，江青从她住的春藕斋赶来，一进门就对医疗组高声大嚷：“你们谁来报告情况？”接着就恶狠狠地对医疗组长李志绥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华国锋走来劝说江青：“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尽到职责了。”

9月8日凌晨，在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的时候，江青却要给毛泽东翻身。医务人员根据主席病情，不同意翻身，但是江青根本不理医生的劝告，坚持要给主席翻身。值班医生方圻教授特地跑到二〇二大厅请示王洪文。他赶到主席病床前说，可以翻身。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晚上，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通知全体政治局委员，来到毛泽东遗体旁边，向领袖告别。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的病情，一直对外保密，即使对最亲密的国家和兄弟党也没有透过口风。政治局委员们看到导师安息的遗容，大家都悲恸的大哭起来。

哭声中，江青却莫名其妙地突然大叫一声：“大夫呵，你为什么不救救呵！”

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知道，专家、医生为抢救主席的生命，日日夜夜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劳动，这怎能说是“不救救呵”，这不又是新的栽诬陷害吗？所以，当时大家对江青的叫喊都未理睬。

在二〇二房间举行告别仪式以后，华国锋当即在毛泽东卧室旁边的房间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叶剑英、许世友、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苏振华、陈永贵、吴桂贤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原来是研究料理毛泽东丧事的问题，但是江青俨然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和口气，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

“现在政治局要团结，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我们要拥护他。”接着，她声色俱厉地说：“如果有人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盛气凌人，骄气十足，当即引起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的愤怒。他不等江青把话讲完，立即站起来，怒斥江青：“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穿一身黑套服，坐在沙发上，连忙辩解：“我并没有说你嘛。”

许世友气愤地说：“你不能血口喷人嘛！你张狂什么？主席在，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

经几位老同志劝说，争吵停了下来。

接着，江青提高嗓门，把话题转到批邓问题：“你们知道吗？毛泽东是被邓小平迫害死的，他在临终前惦记着头等大事，依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江青的话越讲越多，并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你们知道吗？毛主席为什么不久前还在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里有重大的战略问题。我建议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批邓的问题，并且我建议，在公布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时，公布政治局的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见江青还在唱高调，实在忍不下去，气呼呼地站起来：

“江青同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主席的治丧和悼念活动还没进行，你拉扯那么多干什么呀？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邓小平该怎么办，这是以后讨论的事……”

华国锋瞟了一眼说：

“批邓当然是不能停止的，……不过眼下嘛，我们首先要把主席的治丧问题先定下来，我们总不能把主席的遗骨放在一边谈批邓嘛！”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决定：把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下来，让各族人民世代能看到他老人家的遗容；立即向全国全世界广播毛泽东逝世的讣告，组织各界人民代表、干部，在人大会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当噩耗从电波传向全国全世界的时候，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从城市到农村，从

首都到边疆，亿万人民为失去自己的领袖而沉浸在悲痛之中。

我走上街头，庄严的《国际歌》声在晴空回响。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半降的五星红旗在微风中飘动。匆匆的行人行列里，有人一边走，一边擦着热泪。

在连续七天的吊唁里，来自四面八方的30万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科学家和各族代表，排成整齐的队形，身着素装，臂戴黑纱，默默地等候在天安门广场上，冒着雨缓缓走进大会堂。

我跟着泣不成声的人群，向主席致哀。毛主席的遗体安放在松柏常青树中，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他身上，他那坚毅安详的遗容，仿佛刚刚入睡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旁边守灵。

敬献的花圈中，有一个由葵花、麦穗、玉米、文冠果组成的花圈，上写：

“沉痛悼念崇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您的学生、战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志、毛远新。”

长长的队列，悲恸的人群。大声哭泣着从毛泽东遗体前走过。他们默默地在心底呼唤着：

“毛主席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世长存！”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罪恶的黑手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走向哪里去？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共产党，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谁来作东方这艘巨轮的舵手呢？

全中国在注视着北京。

全世界在注视着中国。

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倾听着北京的声音。

北京发生了什么呢？

“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快了妄图篡夺中央领导权的活动。

毛泽东逝世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护好主席遗体的问题。

“四人帮”认为，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还达不到保护遗体的水平。在他们看来，保护遗体一

定会失败。如果失败了,对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不好交待。江青怕负责任。因此,他们决定不插手遗体保管工作。一旦遗体处理不当,就嫁祸中央领导人。江青说:“我心情不好,我不管!”

笔者两次访问华国锋同志。1989年10月5日上午,华国锋在住宅里再次接见笔者。他说:为保护好毛主席遗体,党中央决定通过外交部,派人乘飞机到越南河内了解胡志明主席的遗体保护情况。虽然得到了一些技术知识,但能否保护好,还没有把握。这时江青一反常态,立刻要往里钻。华国锋反问她道:

“你过去不是说,对保护遗体,你不管,不参加吗?怎么这时候,又来参加,又要管了呢?”

江青红着脸,噘着厚嘴唇,默默坐着,无言答对。张春桥见她神态十分尴尬,连忙解围说:“大家都有责任过问嘛!”他转过身对华国锋说:“还是议别的事情吧!”

“四人帮”加快夺权,把黑手直接插进中南海。9月10日晚上,当首都亮起万家灯火的时候,窃取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带着秘书廖伯康、米士奇来到中南海,在紫光阁架起17部电话机,他要秘书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通知各省、市、区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他们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各省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华国锋听到王洪文直接同全国各地联系的情况汇报,十分气愤,这么大的事情,他们竟瞒着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是想干什么?他马上打电话要汪东兴来到他的住处。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汪东兴进屋听了华国锋说的王洪文的情况,心里很是不安,连忙说:“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的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华国锋气愤地拍着茶几说:

“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叶剑英同志也是副主席嘛,怎么能把我们架空呢?你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一切重大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汪东兴看到华国锋的态度如此强硬,心里很高兴,说:“华主席,你早该这样了!毛主席不

在了,我保证会像听毛主席的号令那样,坚决执行你的指示!”

配合王洪文的夺权活动,江青孜孜追求当党中央主席的美梦。她搬回中南海以后当面讲要和华国锋“团结”,背地却又进行分裂中央的阴谋活动。

9月19日,参加毛泽东追悼会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毛远新去看望江青。一见面,江青就向毛远新发牢骚。她闷闷不乐地说:“昨天开追悼会,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人和我握手。华国锋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不尊重我。”

毛远新说:“主席逝世了,他是主席了,应当尊重他。”

江青不耐烦地耸耸肩膀,呲牙冷笑着说:“他是主席谁承认?谁是主席还不一定呢!”

毛远新惊愕地望着江青:“为什么?”

江青愠怒地将肩头一扭说:“还要看一看。”

毛远新审慎地说:“那是你说的,毛主席没有这么说,毛主席交待要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毛远新1980年交待)

毛泽东患病以后,毛远新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日夜守候毛泽东身边,负责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及时向他汇报国内外的重大情况。对这个权力很大的“联络员”,毛泽东、江青始终对他寄托极大的希望。

江青日夜做着当女皇的美梦。主席病重期间,她离开北京,四出活动。

8月28日,她第三次窜到天津小靳庄时,尽管是大热天,她却打扮像陕北农民那样,头上包一块毛巾,坐在凉篷里,故弄玄虚地说:“我这次来可不容易,是深夜请示主席,主席批准我才来的。”她泼妇骂街似地攻击党中央:“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分裂党、分裂党中央。”

江青在小靳庄大讲要破“男尊女卑”,胡说什么“我们中央就不合理,都是大男子主义”,“在政治局我是单干户”,叫嚣什么:“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江青胡说什么“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她时哭时笑,十分下流,说什么“男人简单得很”,“男人有什

么贡献,就是一个精虫的贡献。”

江青离开小靳庄,在8月30日这天,到了济南部队某部“攻城第一连”。她讲了一阵“我是大女子主义”之后,于9月3日,江青乘着豪华的专列,有七个车厢,两个车皮,还带上四匹马,第二次窜到大寨。

江青指着自己的鼻子对人说:

“你知道我这次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邓小平是反对我的……”江青头戴草凉帽,腰挎小黄包,骑着白马奔驰在大寨山茱萸上,她时而抱抱小白兔,时而逗鹿玩耍,时而探访她那条被人填成猪场的“战壕”。

有一天,江青走进供销社,一气买了40多件东西以后,逗耍售货员郭和妮,要她写下自己的名字。江青看见郭和妮只写了自己和父亲的名字,而没有写母亲的名字时,她突然发火了。

“为什么不写你妈的名字,你们不是妈生的?没有母亲,你从哪里来的?这是大男子主义,你们要把妈放在父亲上面,造他们的反,将来女的要掌权,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

9月5日,她来到虎头山大寨公社牧场,一批男社员来迎接她,她又生了气:“怎么都是男的,没有女的?给我找几个女的来!”

当天晚上,中央打电话催她返京,她却不顾毛主席病危的情况,要医生、警卫员继续陪她打扑克,直到11点才返京。

9月9日,迟群在清华大学讲话,要民兵特别提高警惕,“一旦有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斗争想得激烈一些,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

9月12日,迟群、谢静宜盗用清华北大两校师生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效忠信”。他俩在信上说:“一定为主席争光、争气,请江青同志放心。”他们还秘密串连一些人写“劝进书”,要江青当中央主席。

在此之前,“四人帮”早就进行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舆论准备。1976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曾密令清华、北大写作组,编写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秘密报告,亲自授意写《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法家人物介绍》等,名为吹

捧武则天、吕后,实际是为江青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毛泽东早就指出:“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江青根本不听,她把自己看作是毛泽东身后理所应当的接班人。

1976年8月26日,江青连续窜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北大等地,无耻欺骗群众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她到处散布说,俾斯麦、梯也尔、拿破仑死后,他们的妻子都受到迫害。她还要随行的《北京日报》记者,为她撰写一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新闻。

## 谁当接班人

谁当接班人的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经常考虑的问题,也是他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林彪是我选的,王洪文也是我选的,都不行啊!”

毛泽东常是独自一人,一手搬着手指,默默地考虑问题,一个一个地分析着、较量着可以当他接班人的人。一天,他要机要秘书张玉凤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一个地向他报告。他一边听,一边陷入长久的沉思。

念到周恩来时,张玉凤说:

“主席,我们的周总理多好啊,德高望重,很得人心,为什么不选他作你的接班人啊?”

毛泽东紧皱双眉,静静地听着。接着,深情地望着张玉凤,高高地扬起右手,用猛力向下一砍的手势,遗憾地说:“周缺乏这个……”

主席的意思是,周恩来缺乏统帅全局的果断和魄力。

严于解剖自己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坦率承认自己这方面的弱点和不足。在一位主帅的决策下,他可以精明地组织和处理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问题,但过多过细的考虑,会使他表现出犹豫。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几十年的左右手,象擎天柱一样支撑着国家大局。他的突然病逝,对毛泽东是个很大的打击。

周恩来总理病逝后,毛泽东曾告诉毛远新

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俩让一下。”

“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华国锋同志好一些。”主席提议：“让华国锋当总理！”

毛远新连连点头：“好，好，选得好！”

毛远新根据主席的提名，马上向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

会上，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张春桥。

江青专门打来电话：

“我热烈拥护主席的提议。主席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华国锋对两边的意见都能听。”

会后，汪东兴特地来看望毛泽东主席，向主席祝贺选华国锋同志当总理。汪东兴走到主席身边，激情地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得实在好！我双手赞成。对这项决定，政治局的同志都很满意。”汪东兴说：“主席，你要吃好睡好，其他的事我们来办！”

毛泽东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睁大眼睛，满脸笑容，搬着指头说：“华不但有地方工作经验，省委工作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嘛！”

1976年4月3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华国锋陪同外宾去见主席。

华国锋送外宾归来，向主席汇报了国际国内的情况。

毛泽东静静地专心专意地听着。主席说：

“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呢！”

当时，毛泽东说话已不大清楚，华国锋听不明白。在场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又把毛主席的话翻译一遍，向华国锋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连张玉凤也听不清楚。

主席示意张玉凤拿来纸和笔。她手搀扶着毛泽东，然后，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三句话，交给华国锋：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笔者访问华国锋同志时他谈到毛泽东亲笔给他写的“三句话”，谈到粉碎“四人帮”的经历。原先李先念同志住的房

院，现在正是华国锋的住地。在那间宽大的客厅里，华国锋对笔者说：

“‘四人帮’急于夺权，形势相当紧急。一天，李先念来看我，我拿出毛主席给我写的三句话，对先念同志说，他们盗用毛主席的临终遗嘱的话，欺哄全党，其实，毛主席真正写的手令是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不但说了，而且写了！”

李先念很激动，拍着茶几说：“好极了，快快，拿来我瞧瞧！”

华国锋从内屋保险柜里取出两张纸。果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句话。

李先念一边看，一边鼓励华国锋说：

“国锋同志，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一步棋寄托在你的身上。毛主席的这三条手令，好比尚方宝剑嘛。江青他们别看是主席的亲属，他们有啥？有的是毛主席多次对他们的警告和批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轮到他们掌了大权，怎么会有我们的活路？”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在贺龙元帅创建的晋绥解放区工作。1940年担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1945年担任交城县和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建国前夕，他随军南下湖南，任湘阳县委书记。两年后又调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任县委书记，领导互助合作和大跃进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第二年，他又从县委书记提拔为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毛泽东回湖南，华国锋多次向他汇报工作。他那稳重的言行、忠实憨厚的性格，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好评。195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亲自提名让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因为他跟湖南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站在一起，所以进入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1968年4月9日，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

1970年8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下山来到湖南找华国锋谈话。他向主席汇报了湖南建设工业省的计划。临别时，华国锋请示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严肃地说：“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

但是，坏人是谁呢？主席没有点明。当时，华国锋还以为是指大闹庐山的陈伯达呢！

8月25日，华国锋再次应召来到武汉。第二天，华国锋去见毛泽东，他见华国锋胸前佩戴着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很不高兴地说：

“你戴那干什么？”接着又说：“取下来！”

毛泽东问了湖南的情况，深思了一阵，再次告诫华国锋说：

“你满脑袋是农业，我满脑袋是路线！”

华国锋至此才明白：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次谈话后，华国锋随毛泽东到了广州，做广州方面的工作。有一天，毛泽东向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谈起他怎样从信仰孔夫子到信仰马克思。在谈到江青时，毛泽东当众夸奖汪东兴：

“汪东兴有办法，能顶住江青，不让她来干扰我的工作！”

汪东兴谦诚地说：“这全靠主席。若不是主席支持我，我怎能管得江青啊？！”

1971年，华国锋调到中央，任国务院业务组长。毛泽东指示华国锋要多调查研究，并且制定了要跑二十多个省市的计划，但是，走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上海七省市之后就病了。参加处理九一三事件后，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华国锋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毛泽东于1976年1月21日和28日几次提议，让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日常工作。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经常以毛泽东的代理人自居的江青，对于华国锋升任第一把手，内心深为不满。9月1日，北京召开唐山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叶剑英等领导人出席大会。

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召开“四人帮”一伙人的紧急碰头会，“女皇”针对华国锋、叶剑英，大发脾气，破口大骂：

“他凭什么坐第一把椅子？还发表重要讲话？还有那个老家伙竟然也出来亮相，坐在第三把交椅？真是太不公平了！”

张春桥立刻说：“那个执掌军队实权的是个核心人物，华也要靠他才能立得住。最令人头痛的是军队……”

江青马上吩咐王洪文：

“洪文，你现在要紧的是抓紧上海的第二武装！”

毛泽东逝世，按通常程序，理所当然的应当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可是，江青却兴风作浪借机发难，妄图窃取党中央主席的职位，这就不能不引起华国锋的警惕。回忆到毛泽东向他亲自讲述的刘邦关于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的故事，感到自己肩上责任更加重大了，他决心制止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

华国锋向李先念透露毛泽东的手令后，他为巩固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争取更多的政治局委员支持，他又专门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当时公布了前两条。到会的江青、王洪文均有记录。姚文元却别有用心地把“照过去的方针办”在审改人民日报送来的社论时，同意了社论中提到的“按既定方针办”。

这篇社论中的“按既定方针办”，并不是姚文元的发明，而是人民日报写社论的作者从新华社的一则电讯中看到的。于是作者就把它写进了社论。自此，姚文元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的毛泽东临终嘱咐。要求新华社在处理各省悼念主席新闻时，都要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也要添上类似的话。

9月18日，首都百万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会刚开完，江青来不及换衣服，身上穿着黑色丧服，头上披着黑纱，迳直来到主席女秘书张玉凤那里，取走了毛泽东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和一些手迹。毛远新还伙同江青以“要看一下”的名义，骗取了毛泽东和杨

得志、王六生同志两次谈话的记录稿。

江青走后，张玉凤马上把此事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指示她要立即追回文件。

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包含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主席刚一逝世，叶剑英亲自给汪东兴打电话，严肃地说：

“东兴同志，你保卫了毛主席的安全，你还要看管好主席的文件档案。”

对此，汪东兴又向华国锋作了请示。得到批准后，他立即打电话给江青。听到是汪东兴的声音，她故意拉长腔调，傲慢地说：

“什么？让我把毛主席的文件交给办公厅？笑话！天大的笑话！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主席的妻子，是主席的继承人，我有这个权利！”

“江青同志，你冷静点。”汪东兴坚定地说：“主席的所有文件档案，都是党的最高机密和遗产。因为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你拿走的文件档案还是应该交回来，由中央办公厅保管。”

这话更加激起江青的怒火。她嘶哑着嗓子大声说：“你，汪东兴同志，有什么权利敢对我这样说？主席遗骨未寒，你就想赶我走吗？你想干什么？”

汪东兴再次严正警告江青：

“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我是奉命办事的，希望你也要按照共产党员的纪律办事！”

江青冷笑一声，“砰”地扔下话筒，转过身子对站在电话边的张春桥说：“你看到了吧？主席刚刚归天，他们的面孔都露出来了。这是好事，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得很哟！”

江青虽然碰了钉子，但是贼心不死，继续纠缠不休。深夜三点钟了，她突然打电话给华国锋，大哭大闹地说：“为什么不把主席的文件交给我？我是主席的妻子，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待我，连我进主席家的权利也剥夺了，这叫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说着就在电话上嚎啕大哭起来。

华国锋按捺住心中的怒火，镇定而平静地说：

“江青同志，你不要吵闹。我不是早就当面

告诉你吗？毛主席的文件，是党的财富，应该一律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保管，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四人帮”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抢夺毛主席的文件？叶剑英说，一是怕，怕主席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的东西；二是要整人，要找打人的炮弹。

如果“四人帮”真要掌握控制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他们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掩盖自己的狐狸尾巴。他们还可以以正统自居，任意歪曲篡改，制造种种理论，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还可以任意制造“最高指示”，“临终遗嘱”，独揽一切权力，为所欲为了。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9月21日，党中央封存了毛主席的文件。

## 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四人帮”加快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

江青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次会议，她要 and 姚文元、毛远新来参加。而这几个人根本不是政治局常委，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江青蛮横不讲理地说：“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也不可能懂！……我们几个人都要参加，叶帅病了，不要来参加！”

“为什么不让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呢？”华国锋迳直问她。

江青一时说不出话。华国锋立刻明白了她的阴谋，顶撞她说：“不让一位副主席参加会议，那还讨论什么重要问题呢？这件事，过些天再谈吧！”

打完电话的第二天早晨，张春桥来到华国锋家里，充当江青的说客，对华国锋解释说：“听说你和江青同志又发生不愉快了？你不要计较她，她不是冲着你来的嘛。”

华国锋强压着一肚子火，很客气地对张春桥说：“毛远新的联络员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

沈阳,还要干什么呢?”

“我主张安排毛远新为三中全会起草报告;他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记得很全面。”张春桥注视着华国锋的表情,眯着眼睛说:“我这意见,你不会反对吧?”

华国锋坦率地说:“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参加中央全会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张春桥仰着脸说:“论能力,论水平,论条件,他当政治局委员都当之无愧。召开十大的时候,我是秘书长,在许多小组提的中央名单中就有毛远新。是主席谦虚,不愿让自己的亲属都进中央委员会,所以才亲手删掉了他和肖力等人的名字。”

华国锋接过话头,反攻过去:

“是呀,我们现在更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违了他老人家的心意。”他严肃地对张春桥说:“我觉得主席不让他们进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个谦虚的问题,而是从全国的局势统筹考虑。春桥同志,我们不能主席刚去世,就另搞一套,显得比老人家还高明呀!”

华国锋见张春桥红着脸,一时说不出话来,接着又说:

“再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报告怎么起草,都得政治局会议讨论,不能少数人决定呀!”

就在9月23日这一天,王洪文从北京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他要上海“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催促赶快把民兵武装动员起来,准备应付万一。

王洪文刚放下电话,就来到张春桥的屋里,姚文元、江青也都在。王洪文到不多久,电话铃响了。他接过电话,一边听,一边说:“好,好”,最后说:“我们研究一下。”

王洪文放下电话以紧张惊讶的神气,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说:“是叶帅的电话。”

王洪文讲了叶帅电话的内容,谈到关于批邓的问题,以及他和江青吵架的问题。王洪文深为忧虑地说:

“我和江青吵架,他怎么会知道呢?是谁告诉的呢?叶是想拉我。叶打电话前是否跟谁商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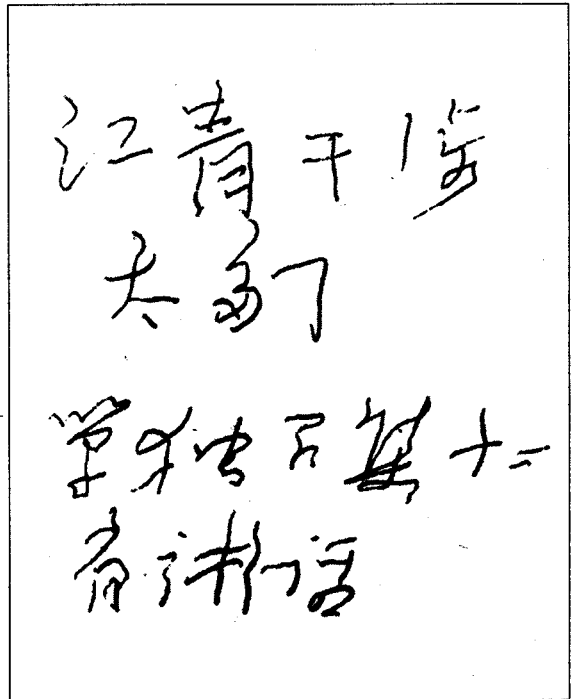
姚文元闪动着一双鼓鼓的金鱼眼睛,深有所思地说:“难道这么凑巧?原来两边都在开会!”

姚文元指的“两边”,一边是指王、江、张、姚四个人的议论;一边是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姚文元从叶剑英在凌晨三四点钟给王洪文打电话这件事上,敏锐地感觉到“两边都在开会”。他弄不清楚这是不是叶剑英进行的一种战前的“火力侦查”?难道不是想用电话这条“热线”,了解一下动静,摸摸“四人帮”的脉搏吗?

毛泽东逝世以后,姚文元日夜都想着毛泽东生前讲过的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谈话:“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每想到这个谈话,姚文元就心慌意乱了。

有一次,姚文元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到中南海开会。散会后,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单独留下,对他交待说:“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你们要继续做好报纸的



1976年2月3日,江青私自召集1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开会诬陷攻击邓小平。3月10日,毛泽东亲笔写下了对江青的批评

出版工作。现在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还要看一看。”

谈话中暗示鲁瑛,可能要出事。

姚文元晚间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突然对孩子们说:“爸爸死了,你们不要哭。”把孩子吓了一跳,姚文元连忙安慰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见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审讯记录)

早在1975年夏,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严肃批评过“四人帮”。

王洪文受到批评后,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第二武装”,他说他“要搞40万民兵,要有40万支枪,我们还要用炮武装民兵”。

在这期间,他们制造大批枪枝弹药,准备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3个地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团,配备一三〇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82门。

这些武装按规定应由解放军统一保管。可是王洪文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下发到民兵手里。”

王洪文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1976年9月21日,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特地来到北京,向张春桥报告了他同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的谈话情况。

在这次谈话中,丁盛向他们说:“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徐景贤说:“已有所准备。”

其中重要准备之一,是根据市革委副主任马天水亲笔批的“立即发枪”的命令,突击发给“民兵”枪7420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

张春桥听了上海情况,表示满意,同时又不放心。他握着徐景贤的手再三叮嘱:

“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垮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现在形势紧张,要谨慎小心,要特别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张春桥尽管再三嘱托,可是他总放心不下。他怕在此紧要时刻,上海的同志对斗争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误了大事。于是,他在深夜又写信给上海的同党。信上写道:

“马天水同志并市委有关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早逝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毛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斗争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也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特别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大有人在的。

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张春桥把写好的密信交给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要他亲自送给上海市委。肖木是张春桥推荐给王洪文的,对他特别信任。9月28日,临行前,张春桥把肖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要他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传达他的口信:

“上海要提高警惕,也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由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上海会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

他们要同谁打仗呢?这就是准备发动上海叛乱,把中国重新陷入内战的火海!

## 公开的挑战

在作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夺权准备后,“四人帮”杀气腾腾,磨刀霍霍,匕首出鞘了。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恬不知耻地向人游说,她要担任党中央主席。

1976年9月23日下午3时30分,江青通过刘秘书的联系,把主席机要秘书张玉凤接到钓鱼台11号楼的会客室。等了30分钟,江青把张玉凤引到办公室坐下。

张玉凤试探地问江青:

“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党的主席怎么办?”



“党的主席未定。”江青说：“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

张玉凤说：“知道。”

江青说：“党的主席中央要讨论，要党的全会决定。”

张玉凤说：“我想是你的。”

江青听了很高兴，满有把握地说：“不错！”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啊！”

“怎么个复杂法？”张玉凤问。

江青说：“同修正主义斗，同走资派斗，要注意斗争策略。”

在这之后，江青又把毛主席从前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接到钓鱼台 11 号楼，嘱咐他说：

“你是老红军，主席的警卫员，跟毛主席，拥护主席的。主席逝世后，你跟谁？拥护谁？”

不等陈昌奉回答，江青接着就说：“要跟我，拥护我！”

陈昌奉说：“拥护你！”

江青很高兴：“是嘛！我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正确的，你是知道的。”

陈昌奉接着又问江青：“我该怎么拥护你呀？”

江青面授机宜说：“你要做工作，做宣传。你有部队干部，有老战友，都可以向他们做工作，但不要在大会上讲拥护我。”

在分别做了这些安排以后，江青急不可待地出马了。

1976 年 9 月 29 日，江青大闹政治局会议。

人大大会堂比往日显得更加庄严、宁静。耀眼的灯光下，辉煌的大厅里，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政治局会议准时在晚 21 点开始了。

这天晚上的会议，事关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紧迫问题。除刘伯承久病请假外，15 名政治局委员，4 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许世友、李德生、苏振华、韦国清、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吴德、赛福鼎、吴桂贤、倪志福、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环坐在长排沙发里，等待着华国锋宣布开

会。

华国锋同志告笔者，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

江青首先发言。她手里摇着“红宝书”，提议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悼念，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毛主席著作最好的地点，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那里召开毛主席著作学习会。

讨论时，有人同意开会学习，多数政治局委员则主张，应该以更加庄严隆重的形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 27 周年纪念会议。这个决定很快通过了。

江青接着又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江青把大家望了一眼，哭泣地说：

“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同志们，我和主席生活 40 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自己的评价，都有深厚的感情。这个他是对我有交待的。所以，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最深。春桥同志，还有洪文同志，要求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可是竟有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我们采取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心寒吗？”

坐在一边的王洪文，绷起嘴唇，涨红了脸，说：“是谁反对呀？”

“我，是我叶剑英反对！”

叶剑英挺身坐在沙发里，轻轻扶正老花镜，神情激动地说：

“我跟毛主席干革命快 50 年了，中央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同志。他们都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理解毛泽东思想比你江青深得多。难道他们整理毛主席的文稿和档案材料，就不合适？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所以，我坚决主张主席的所有文稿档案，要中央办公厅保管。至于毛远新同志。他是沈阳部队的政委，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的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叶剑英的话，像在会上点了一把火，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李先念马上发言表态：“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他的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

张春桥板起脸，咄咄逼人地说：

“口头上讲对主席忠诚，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对现在活着的人嘛。具体地说，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主席的态度。今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叶剑英听到张春桥话中有音。他想要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掌握中央领导权，马上说：

“春桥同志，你这样提出问题是严肃的，很不严肃。江青怎么能和我们毛主席相提并论呢？不但是她，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和主席并驾齐驱。”

叶剑英拍着桌子，眼睛里闪耀着愤怒的光芒，说：“主席已经分配了她的工作，政治局委员就是她的工作，还要分配什么工作？要讨论，也得在中央全会上讨论。”

李先念急起呼应叶剑英，连忙插话说：

“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应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翻开党章看一看，哪一次主席，不是中央全会选举的。”

王洪文说：“政治局有权提出这个问题。很多同志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党的主席。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席职务。”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心里一惊。会议议程原来根本没有关于江青工作的安排问题，张春桥突然提出，完全是突然袭击。他说：

“同志们不要吵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要开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不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立即将话题引向讨论关于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我收到毛远新的一封信。他在给中央的信里说，他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在办完毛主席的丧事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辽宁？如果中央有事，他可以留下来。”

毛远新写信的本意是要中央批准他留在北

京工作。

对这，江青曾亲自向毛远新作过交待。9月21日，在毛泽东住的202号房间，江青对毛远新说：“我找张春桥谈过，让他找国锋谈一下，要你留下，不能走，清理主席的文件。不同意你回辽宁工作。”江青并且说：“毛主席要我们五个人团结，就是要留你在中央工作。”

毛远新缺乏社会经验。他对江青留他在中央工作的恶毒用意，并没有理解。所以他对江青说：“过去我是主席联络员，主席交待我一些工作，参加一些会议。现在主席逝世了，我又不是中央委员，留在中央干什么？”

江青劝他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前段不是这样吗？”

毛远新没有同意江青“妈妈”的意见。于是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华国锋同志告笔者：讨论这个问题时，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致坚持原来的意见，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毛主席的档案书籍，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会上，华国锋也明确表态：

“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去。”

华国锋的话刚刚落音，江青就泼妇骂街似的吵闹起来：“怎么？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把毛远新赶走？办不到！我还没死哩！何况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还要毛远新整理，怎么能让他走？”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一口咬定地说：

“毛远新不能走。批邓以来的情况，他最清楚，需要他留在北京，为中央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准备随时召开三中全会，用合法的形式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华国锋。

华国锋清楚记得，江青在一次会上曾说过，待毛主席丧事一办完，毛远新就回东北。他手指江青，严肃地说：

“你过去不是同意要毛远新回东北吗？你这样出尔反尔，不好！”

江青一时难以回答，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正当她弄得脸面下不来时，张春桥又来打圆场了。

“这件事暂时说到这里吧。”他侧过身，对江青说：“我是记得，你在什么会上说过，你是同意过他回辽宁工作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三个决定：  
一、毛远新要回辽宁工作。

二、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交给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三、关于党中央的领导，应由政治局讨论安排。

“四人帮”的阴谋失败了。

江青气急败坏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清晨一点了。打着哈欠，傲慢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都走吧，华国锋留下，我们个别谈谈。”

华国锋听了很生气。他想，江青，你不是会议主持人，你有什么权力，指挥这个走，那个不走呢？江青的狂妄，又一次激怒了华国锋。华国锋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对大家说：

“叶帅、先念同志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其余的人继续开会。”

这时，江青更加大闹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不行，没有事的都走！”

坐在桌旁的汪东兴，一听江青说要大家都走，心里马上警觉起来。心想：只剩下“四人帮”的四个人和华国锋，“四人帮”不是正可以围攻华国锋，逼迫他交出党政大权吗？“四人帮”都可以参加，难道我就不可以参加了吗？我偏坐在那里不走，陪着华国锋同志，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敢赶我吗？赶，我也不走！你江青的那两下子，我早就看透了，我才不怕你哪！

这样，政治局会上，形成了4比2的格局。

会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手稿、文件，交给毛远新。

华国锋不同意，说：“那怎么行！毛主席的文件、手稿都要汪东兴、张玉凤管，要封起来！”

叶剑英、李先念虽然离开会场，但是并没有回家去，两位老人在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等候了一会。听到会场上吵嘴的声音，叶剑英、李先念又回到了会议室里。叶剑英和解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没意见就散会吧！”

华国锋顺水推舟：“好！散会！”

散会以后，江青一回到家里，刚走进门就对毛远新说：

“我今天为你回辽宁的事跟华国锋吵了一架。”她怒气冲冲地埋怨毛远新：“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我？”

## 夺权与反夺权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的夺权丑剧，被挫败了。但是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更加尖锐地进行着。

10月1日这天，江青起床很晚。她中午刚刚吃完早饭，就又急急匆匆跑到清华大学。这是她第八次接见清华学生了。她疯狂叫嚣：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以后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声嘶力竭地喊着：

“小将们，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她明目张胆地煽动年轻人：

“你们要把好东西留着，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

10月2日，毛远新不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给沈阳军区打电话，要把孙玉国的一个装甲师调到北京来。沈阳军区报告叶剑英。叶剑英命令停止执行，并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谁也不能调动部队。

叶剑英对沈阳军区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做得对！凡是没有经过军委，擅自调动军队的做法，不管是谁下的命令，一律是非法的！”叶剑英果断地下命令说：“立即命令孙玉国，让他把装甲师开回原地！听明白了吗？立即把装甲师开回原地！”

就在同一时期，张春桥在他的亲笔写的提纲里，赤裸裸地提出“镇反”、“杀人”的计划。他在“镇反”一项写道：

“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

“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四人帮”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王洪文在10月2日拍了“标准像”。接着，王洪

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一起，还特地拍了“历史性纪念的彩色合影”，准备登台大典。

在“四人帮”拍照的同天上午（10月2日），华国锋走进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放着外交部长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这是急件，需要马上处理。

华国锋打开文件，专心致志地读着文件。当他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时，华国锋紧皱了一下眉头，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划了一个大问号。他曾问过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嘱咐，只有江青和毛远新听到了。这是真的吗？这里有鬼！”

华国锋挺身望着窗外思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伙阴谋家，什么坏事都会作出来的。他们连日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他们的“既定方针”，就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人民能答应他们这样蛮干吗？要是不揭穿他们的欺骗岂不是要弄假成真吗？有真凭实据的，是毛泽东给他亲笔写的三句话，就在他的保险柜，其中一句是“照过去方针办”。他决心借此机会，来否定他们造谣的“临终嘱咐”。于是，他提起笔来在稿上批道：

“此发言有误。文字中引用毛主席嘱咐，我对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三句话，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华国锋决心戳一戳纸老虎。他把稿子交给秘书，要他将文件交中央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交外交部。华国锋并亲自找到耿飏、韩念龙谈了这件事。

耿飏同志气愤地说：“他们尽是胡说八道！”

文件很快传到张春桥手里。他仔细推敲着华国锋的批示，为了稳住阵脚，他立即在文件上写了一个批示：“此件暂不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向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打电话。江青又通知迟群、谢静宜、钱浩亮、刘庆棠等人，深夜赶到钓鱼台会议厅。

正当大家相互问好的时候，江青穿着一身新军装，像导演样板戏那样，神气活现地走进来了。她板着脸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吗？我们都是并肩战斗过多年的战友，我们有事不能不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她眼里闪射着一道凶狠的光芒，厉声高叫道：“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他批倒批臭，他还会东山再起的。因为，中央有他的人！”

王洪文忙着插话：“倒了邓小平，还有邓二平、王三平！现在他们要背叛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要和我们斗，要夺权，他们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江青同志！”

张春桥说：“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哪！”

“但是我不怕！”江青尖声怪气地说：“我现在每天都在练太极拳，把身体锻炼好，好和他们斗啊！”接着又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让华国锋当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吗？”

大家还没有弄清楚她提这个问题的意思。这时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江青，又大谈起历史来了。

“刘邦死后，是吕后在掌大权。因为只有吕后能继承刘邦的事业。太子太幼，没有威信，还不能亲政嘛。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江青的话，对她的追随者说来，真是“一点就明”。曾扮演过《红灯记》李玉和的钱浩亮，被江青提拔当了文化部的副部长。会上，他首先站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我们要向中央请愿，请江青同志担任党的主席！”

刘庆棠马上响应说：“对！我们要坚决拥护江青同志任党的主席！”

刘庆棠原来是中央歌舞剧院副队长，被江青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联想到自己的成长，他感恩戴德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江青的恩情，誓死跟着江青干革命！”

张春桥看到大家情绪很激昂，连忙摆了摆手：“现在有人已经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他们要篡改毛主席的本意，要同我们较量了！我们今天穿着军装接见你们，就是要迎接他

们的挑战!”

顿时，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江青是文革的旗手，我们坚决拥护江青当党的主席!”

这天晚上的会议，实际上是“四人帮”夺权的动员会。他们的夺权活动更加猖狂了。配合城里的活动，10月3日，王洪文窜到平谷县，向一些干部发表讲话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10月4日，“四人帮”的笔杆子用“梁效”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胡说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四人帮”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一看到文章，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不向机关要车，迳直骑着脚踏车，带着《光明日报》急速赶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把报纸交给他，请汪东兴把报纸转交给华国锋。

华国锋接过报纸，仔细看着，特别是对李鑫划了粗线着重点的地方，看得尤为认真。看完最后一句，愤怒地高声吼着：

“这还了得，这是公开向党中央挑战!”

## 夺权的信号

李鑫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向党中央送去“四人帮”夺权的信号，内中有一段少为人知的经历。

毛主席病逝以后，9月15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姚文元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他想要直接插手毛选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

李鑫1948年5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中

国共产党。1958年由高教部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历任康生办公室秘书，跟随康生犯过错误。但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在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领导成员、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后，主要精力编阅毛泽东选集。当他听到姚文元询问毛选五卷文稿情况时，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别有用心，他气愤地拒绝交出毛主席的文稿。

但是，姚文元仍不死心。过了一个星期，姚文元又写信给李鑫，要李鑫将毛选五卷的文稿送给他。李鑫还是不给。

9月24日，李鑫带着姚文元的信，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经过商量，9月25日，李鑫又把姚文元写给他的信，送给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建议党中央直接抓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出版工作，并要求面见华国锋。

华国锋约李鑫在9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

李鑫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在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主要是听李鑫讲。

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

华国锋接着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李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自此以后，李鑫每天仔细阅读当天的首都报纸。10月4日这天，当他读到《光明日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的时候，立刻骑着脚踏车，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汪东兴报告，请他立速转告华国锋。他说：

“这是‘四人帮’向党中央发起夺权的信号，建议党中央赶快行动，采取果断措施!”

## 无声的惊雷

“四人帮”磨刀霍霍的罪恶活动，引起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愤慨。他们一旦上台，千百万人就要人头落地。党和国家面临着空前的危险!

深为党和国家命运担忧的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像飞翔在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肩负着历史的责任，私下在商议着、谈论着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立刻派出中央代表团奔赴灾区，亲切慰问灾区人民。但是“四人帮”却竭力阻止报道救灾活动。

这时，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却发表了署名忻启明的《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文章，胡说什么“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文章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胡乔木读到了这篇文章，文中的火药味引起了他的注意。联想到江青到大寨等地的活动，有一天，他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里。他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同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汪东兴，有着长期共同工作的友谊。所以，今天他特地找汪东兴，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埋在心中的问题。

“你有没有这份杂志？”胡乔木送给汪东兴一本《学习与批判》：“你看了里边的文章没有？”

“我没有这份杂志。”

“你看看吧，这里透露了他们的野心。”

胡乔木把杂志交给汪东兴，接着，又把脸凑到他跟前，低声而又坚决地说：

“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要动手啦，应该先把张春桥搞起来。”

汪东兴望着胡乔木文质彬彬的面容，微微一笑说：“搞他一个人不行。抓了他一个，还有别人哩！”

这次谈话，对后来启发汪东兴思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起了促进作用，每当遇到“四人帮”在中央会议闹事时，他都想到关于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另一些高级干部中早已酝酿了，酝酿得更多。

王震将军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住在三〇一医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他多次找叶剑英谈心。他以军人豪爽的姿态，单刀直入地说：

“叶帅，他们几个人这样猖狂，为什么还不

把他们弄起来，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摆了摆手制止他，怕人窃听去讲话。他见到四周无人，才低声慢气地说：“老人家刚去世，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他比着手势：“需要等待时机！”

为此，叶剑英委托王震去征求陈云意见，共同商量对策。一天，陈云同志先后同邓颖超同志一块来到叶剑英的住处。

叶帅住地的后山上，在茂盛的树林中，有一座古雅、精致、宁静的小凉亭。他常常到这里休息吟诗，看清晨的日出，观看西山的雄姿，听潺潺的溪流，迎着晚风吹来的花香，放声背诵苏东坡的《放鹤亭》。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把这间凉亭改名为“风雨亭”。“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常和一些老师、将军们在这儿谈话，议论国家大事。这里也没有可能安放窃听器一类的东西，他可以在这里发牢骚，说心里话。

听秘书报告说，陈云同邓大姐先后来，他连声说：“请他们到这里来！到这里边聊天边凉快，准备些水果来，我们就在这风雨亭谈谈心嘛。”

陈云走进风雨亭，拉住叶剑英的手，拍着他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快想办法才行呀！”

叶剑英笑盈盈地望着陈云，幽默地说：“办法得大家想啊，只靠我怎么成呢？你瞧他们把我参加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摇摇头，叹息说：“那几个行事，既不要党纪，也不要国法，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就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把一个削好的苹果，送到邓颖超手里，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恩来在世时，对他们也是头疼得很。为了毛主席，他委屈求全，任劳任怨，终于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就连总理这样的人，他们都不能相容，那伙小宗派还能放得过谁呢？邓大姐，总理生前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邓颖超深情地摇了摇头，郑重地说：“恩来的性格和脾气，你们都熟悉，他从不对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一定

时候党是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地表达他个人的意见的。”

陈云是我们党的最老的政治家之一。叶帅十分敬重陈云同志。他首先给陈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待陈云看完以后，叶帅问他：

“你看该怎么办？”

陈云低沉着消瘦清秀的脸容，坚定地说：

“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接着又说：“我们的总理总是照顾大局。从前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现在，我看有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很好。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

“你估计党要收拾他们，全国人民会拥护吗？”叶剑英激情地问。

“保险赞成！”陈云说：“他们几个人，倒行逆施，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怒。天安门事件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叶剑英同志，和这四个人斗，党心、军心、民心，都是向着你的！”

陈云的话，使叶剑英很受鼓舞。他一拍大腿站起来，激动地说：“好，有你们这几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要和他们再斗一斗！”

陈云关切地说：“不过你一定要注意等待，再做一些工作，争取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华国锋同志，他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从组织观念讲，也要争取他，争取他能担起斗争的责任。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

在这期间，叶剑英多次向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说：“研究时局，掌握形势，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叶剑英要求办公室的同志全面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要注意“四人帮”的活动情况。不论工作怎么忙，他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他对国内全面局势，了如指掌。

9月21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委托恢复总参谋部工作的杨成武将军到叶剑英的住地转达了他的期待。聂荣臻元帅神情严肃地对杨

成武说：

“那几个东西（指‘四人帮’），闹腾得很厉害。这伙坏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同志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不得了，中国革命就会倒退几十年。现在，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情况很紧张，请叶帅快拿主意，早下决心，他得挺身而出啊！”

叶剑英听了杨成武的汇报，笑了笑，心情激动地说：

“你回去报告聂老总，请他放心。他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我已有思想准备了，你回去报告他，有事随时同他商量。”叶帅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要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也不约而同地来到叶剑英家里，尽管这时叶帅已经“靠边站”了。

1976年2月2日，中央曾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不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可是叶帅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指战员。

用中央文件形式，异乎寻常地发出叶剑英“生病”的通知，在军内引起广泛的反映。有些同志以为叶帅病情严重，纷纷写信或打电话询问。当他们知道叶剑英身体已恢复健康的时候，恍然大悟，方知所谓“生病”的通知，是经毛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分别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肖华等高级将领。他分别嘱托他们要严密注意形势，特别是要在各自的岗位上，注意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防范万一。

恢复了自由的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从狱中出来以后，住在三〇一医院，一天，他来到西山探望叶帅。刚走进客厅，还没开口，叶帅就转过身来，伸出手，向他走来。

“叶帅，您身体很好噢！有人造谣，说您生了病！”

身材高大的傅崇碧，双手紧扶住叶帅。那满头的白鬓，红润的脸色，潇洒的风度，机敏的目光，使他十分激动。

“好噢！”叶帅手拉傅崇碧向沙发走去，一边

幽默地说：“崇碧，我们是同案哟！我是二月逆流，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我是杨余傅事件的后台！”

傅崇碧坐在叶帅身边，眉峰间显出忧虑的神色，兴奋地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差点被他们整死！”

“鹿死谁手，等着瞧吧！”叶帅大声地说着，随即开怀大笑起来。刹那间，老帅像返老还童一样，心花怒放，神采飞扬。

傅崇碧看到叶帅很高兴，一定是有什么新发现。他连忙询问。

叶帅举起右手，微笑地向他伸出四个指头。他胸有成竹地讲了四句话，精辟地分析当前的形势。

“一、不要紧，他们没有抓到我们什么东西；二、他们积怨甚多；三、要进行斗争；四、要讲究方法。”

叶帅突然从沙发前站起来，快步走过地毯，来到大玻璃窗前的一架钢琴旁边。叶帅兴奋地拉开琴盖，手按音键，静静地仰望西山的蓝天。他扬起双臂，以扫荡一切的英雄气概，急风暴雨

似地弹起钢琴来。他时而前俯后仰，时而低首细听，随着来往飞舞的手指，迸发出一阵阵高昂激昂的琴声。

傅崇碧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钢琴旁，听着那惊心动魄的旋律，仿佛变成了隆隆的雷鸣，刺破云空的闪电，浮荡在西山的上空，发出狂怒的吼声。让战斗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叶帅，祝您健康长寿，再见！”

傅崇碧像士兵一样，笔直立正向叶帅敬礼告别。回到医院，他立刻把会见叶帅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断腿重伤的罗瑞卿同志和其他高级将领。寂静的病房，顿时喧嚷沸腾起来。

“干吧，老子准备再拼一次！”

“他们抓了我们一次，坐了几年监，难道我们还要吃二遍苦吗？”

“老家伙们，作好准备，拿起武器！”

住医院的老将军们都仿佛变得年轻起来。他们从这间病房，走进那一间病房，就象在昔日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从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一样。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方实）

---

编者按：本期编发的两位作者的更正，体现了作者对自己作品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应该说，刊物每个差错的出现，都有编辑的责任。但是，由于受知识面的局限，靠编辑纠正差错，有时很难完全做到。为此，希望作者于投稿前，能对作品字斟句酌，特别是对人名、地名、时间和所引史料，认真核对。通过我们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

## 作者更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六期发了拙作《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一文，有凭记忆叙述不准和笔误，经查文字资料，需更正：

一、第8页第二排第1行：“1967年3月……”应为“1968年3月……”；第2行：“温玉成任副总……”应为“温玉成副总长兼……”；往下倒数第10行“到1953年……”应为“到1955年……”；倒数第8行“……兼北京军区司令”应为“……兼华北军区参谋长”；倒数第5行“……任

军事常委”应为“……任军委常委”。

二、第12页第二排第19行“……林彪派张云生……”应为“……林彪派张根生……”。

陈虹

《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刊登我的《获罪易辩诬难》一文，由于笔误，出现一处差错：“从1943年开始，一直到逝世，马克思没有一天停止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1943年应为1843年。特此更正。

吴介民



# 张闻天和刘英患难与共

□ 崔向华

刘英今年已95岁，她是1929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就认识张闻天的，长征到达陕北，她同张闻天结为夫妻。在张闻天遭受错误打击、含冤受屈的17年漫长岁月里，她始终陪伴着张闻天，相濡以沫，患难与共。

**刘英说：“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

1933年6月，刘英由莫斯科回国，到红色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一天，她接到洛甫的电话，说：“尤克娜（刘英留苏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当晚就约上十几个同志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由于有过去是师生关系，刘英同张闻天比较接近。以后工作接触多了，互相更加熟悉起来。长征路上，刘英常到中央队“三人团”处反映情况，张闻天对性格爽快、办事麻利的刘英很有好感，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每当刘英去看张闻天和陈云等人打乒乓球，他都喊上一句：“刘英，来一盘！”一次张闻天在遵义街头叫住正和邓小平等逛街的刘英，约她去坐坐。正是早春季节，屋里升着一盆暖烘烘的炭火。他们吃着醪糟，谈着谈着就沉默上了。刘英预感到他有什么话要说。终于，张闻天含蓄地表达了希望和刘英不仅

做一般的同志。刘英当时没有思想准备，从“敬爱”到“恋爱”有很大距离。她生硬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刘英心里有过创伤。她生性好强，不甘平庸。少女时代她就冲破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发奋求学。1924年，她考入徐特立刚刚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深受革命思想熏陶，1925年入党。“五卅”运动前后，她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大革命高潮中，她担任过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协助书记郭亮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斗争，她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和滕代远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因事机不密而失败。白色恐怖中她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行前一周同将赴醴陵任县委书记的林蔚结婚。林蔚曾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1928年3月刘英返回长沙再赴上海时，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牺牲。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临时省委“住机关”一年多。1929年春，党中央将她送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劳大”停办，她于年底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1932年冬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回国后，先在少共中央局任巡视员，后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团省委书记。后在少共中央局，先后担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4年5月突击扩大红军，她被派往于都县任“扩红”突击队长，用一个半月时

间超额完成了三个月的任务。项英称赞她“一鸣惊人”。她受到了武装动员部的嘉奖。长征开始，刘英担任“红章”纵队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三梯队负责后勤、供给，组织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挑夫搬运炮弹、发电机、文件档案和金银钱财。遵



张闻天与夫人刘英 1939年在延安枣园

义会议后不久，她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撒种子”（秘密发展党员留在本地工作），发动群众，拥护红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刘英是红一方面军30名女战士的杰出人物之一。

话虽出口，刘英的脑海里却开始浮现出张闻天的种种言谈举止，觉得他确实可亲可爱。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与他保持着距离。战友们都觉得张闻天、刘英是合适的一对，有意成其好事。1935年4月，毛泽东提议，总政主任李富春经办，将刘英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此后，他们在工作中更加深了彼此了解，刘英渐渐地由敬生爱。毛泽东、陈云等不时拿他们打趣，刘英默默地领受着张闻天的爱和战友的情。长征路上，写文件做记录一般都是用铅笔。张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要做记录了，有时他就把钢笔给刘英。当时，钢笔真是稀罕之物。会后，他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记得不确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了一个小马灯。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流萤（意即刘英）嘛！”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的。她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在心底，艰苦的战争环境使她不敢谈恋爱。张闻天尊重刘英的决定，直到同甘共苦走完长征到了瓦窑堡，他才征求刘英

的意见：“这下总可以了吧？”刘英终于点了头。

他们在一孔石窑洞里安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夫妻了。邓颖超、博古等熟悉的同志到他们的窑洞坐一坐，说几句庆贺祝愿的

话。倒是刚从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毛泽东一回来就“闹新房”：“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张闻天一碰到开玩笑的场合，只是憨笑。刘英口齿伶俐：“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泽东说：“那就不承认！”闹了一阵，毛泽东又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祝贺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接着就朗声念了起来。这首诗，除了庆贺新婚以外，还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夸了一番。

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就是在张闻天和刘英住的窑洞召开的。张闻天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当毛泽东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后，在会上发生了争论，博古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危险的”。毛泽东反驳了博古的观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毛泽东尖锐地质问：“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在毛泽东和博古争论的过程中，张闻天和毛泽东“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会后，张闻天受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 张闻天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毛泽东常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不以为然，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

1935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张闻天就多次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左倾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并首先把要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提了出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



张闻天与毛泽东

错误军事路线。此后又起草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当时，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他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二十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张闻天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倾注全部精力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应当指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被推举为在党内负总责的核心领导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除了张闻天对遵义会议所作的杰出贡献，还主要因为他当时已经担任了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1933年初，张闻天进入苏区后，仍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并任军委委员，已经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无庸讳言，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站在王明“左”倾路线一边，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在“左”倾统治时期，除了犯有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错误之外，根据他的独立思考与认识能力，已经开始逐步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对正确的方面。所有这些，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而是张闻天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有利于加强党内的团结；共产国际也不会作梗。一直到1938年10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由苏联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毛泽东的威信才被共产国际所信服。虽说张闻天在全党负总责仅三年多的时间，但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却是光辉灿烂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失败走向胜利；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西北一隅走向了全中国；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

自从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以来，他与毛泽东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我们从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可看到，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为止的三年多时间里，以“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之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

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

张闻天办事出以公心，谦虚谨慎，宽厚练达。刚到陕北时，鉴于中央红军同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就要会合，张闻天代表常委向中央建议成立军委（当时称西北军委），提名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闻天是党内最早提出和平解决方针的领导人。次日，张闻天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言，就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同意除蒋，明确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立即派周恩来等同志赴西安。

1937年1月中旬，刘英被派往西安去做巡视青年工作。这年11月，她染上肺结核，中央要她赴苏治病。同行的有贺子珍等人。1939年初，在回延安之前，任弼时交给刘英一项任务，要她到共产国际交通部带一套密码回去。当时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国际的代表。所谓“带”密码，并没有密码本给你，而是要你将这套密码的编制方法和基本电码都记在脑子里。刘英接受任务后，每天熟背强记，凭着好记性，又学过收发报，她很快就把这套密码掌握了。回延安后，她将存在大脑中的密码交给专管同国际联系的电台负责人。此时担任秘书处长的刘英得知张闻天已不“负总责”，他衷心拥护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的意见，即向毛泽东提出“让位”。

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还说，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毛泽东要人们绝不要忘记他们。

### 张闻天坚信列宁的格言： “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延安时期，张闻天向青年学生讲演时说过：“一切伟大的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们

有着伟大的理想，而且还因为他们始终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作为伟大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在他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的历程中，不论斗争形势如何恶化，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或是个人蒙受了怎样的冤屈打击，他对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和确定的伟大理想，都毫不动摇。他非常喜欢列宁的那句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他将此言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张闻天不再在中央负总责，他的主要精力倾注于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先后兼任过党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他还亲自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们讲课和编写教材。他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张闻天于1942年初至1943年3月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刘英一直跟着他，帮着抄录数据和整理材料。张闻天在调查结束后写了《出发归来记》，他对刘英深有感触地说：“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刘英一直与张闻天同甘共苦。在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张闻天坚持了正确意见。在陈云主持下，他起草并同陈云等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报，建议东北工作基本方针应是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不应当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大城市。在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两年期间，刘英同张闻天经常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彻骨严寒坐马拉爬犁深入基层。没有热炕，他们裹着皮大衣睡觉。一次，凤翔县城遭五百多土匪袭击，而主力部队正在山区追剿土匪。张闻天立

即亲自带领军区直属部队乘火车赶往鹤岗，指挥部队分两路救援凤翔，迫使土匪在当天中午，丢下我大部分被俘人员，匆忙逃遁。

自1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达十年之久，他先后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对我国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推动和组织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他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长达1.4万字的系统的发言，诚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这是我党当时少有的一篇深刻剖析1958年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发言，是闪烁着真理光辉、批判“左”倾错误的警世之作。张闻天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遭到错误打击。会议结束了，张闻天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刘英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你搞外交工作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发言？张闻天的回答是平静的，他说他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能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对于这些缺点越是不要我讲，我就越是要讲，因为我脑子里就存在那些东西啊。”刘英明白，事实上张闻天早就知道开顶风船确实不易，但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良心促使着他要讲真话。所以，他并不后悔。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的领导职务。经过几次申请，最后才被批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

张闻天的晚年是一个坎坷、艰难的晚年，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光辉的晚年。从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后，直至逝世的17年中，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搞的问题。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一边读书思考，一边不停地写作。他身处逆境，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大量的笔记和文稿约有40万字。1962年他到苏、沪、浙、湘等省市

进行经济调查，写成《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向中央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

十年浩劫中，张闻天被隔离审讯，备受折磨。1968年5月，张闻天和刘英被隔离“监护”。他们住的房子只隔一小间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他们碰面。好在盥洗室合用一个，他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每天清晨拖地擦桌子，刘英个小常因举不动浸水的拖把而挨骂。张闻天从骂声中听出原因，后来刘英每次去拿拖把都发现总是洗净好用了。张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刘英也总是悄悄地放上洗衣粉搓上几把。只能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在长达五百二十天的隔离后，1969年10月他们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遭受监视的环境中，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写下《人民群众是主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许多文稿，尖锐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以及建国后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并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张闻天的视力只有零点二了，他还是不停地读；他握笔的手已经微微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将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他按照专题，写了一迭又一迭卡片，分装在纸袋里。刘英得空也帮他抄写。张闻天总是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病重中的张闻天对刘英交代：“我不行了……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刘英强忍一腔泪水默默点头。张闻天要刘英拿纸笔写下保证，签上名字。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无锡。

党中央于1979年8月25日为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1985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闻天选集》。1995年《张闻天文集》一至四卷出版。

（责任编辑 仲文）

# 中共智斗土皇帝阎锡山

□ 马仲廉

阎锡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他长期盘踞山西，拥兵自重，诡谲多变，翻云覆雨，左右逢源。为了达到“存在”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在抗战期间，他脚踩三只船——拥蒋、联共、又想降日。中国共产党对阎采取了团结抗战，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抗战八年，同他智斗了八年。

## 惧怕人民力量强大 阎氏改联共为反共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敌当前，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亲密合作，组织了著名的忻口战役，抵抗日军的进攻，开创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阎的联共抗日政策发生动摇。1938年2月临汾失守以后，他看到山西大片土地陷于敌手，共产党的力量却不断扩大，对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于是逐步走向反动，直至“十二月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8年7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此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的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他还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惟独八路军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强，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的立足之地吗？”

牺盟会（全称为牺牲救国同盟会）是由当时“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倡议下成立的。成立不久，薄一波在阎锡山的邀请下，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回到太原，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晋绥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损失很大。阎对亲手培植起来的军队已失去信心。他曾在与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的一次谈话中说：“晋绥军扰民有余，扰敌不足。”因此，他急于扩军。这时，薄一波等向阎提出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得到阎的同意。新军的名称定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决死队在1937年8月成立时，只组建了1个团。但到1939年夏，山西新军迅速发展发展到约5万余人，共计50个团。牺盟会会员已发展到300万人左右。在山西105个县政权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特派员担任。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名义上是由阎锡山直接领导，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

阎锡山在古贤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是煽动旧军起来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从此，阎锡山一步步走上扶旧抑新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阎说，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他甚至说，“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的天下。现在的形势是，蒋要抛弃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

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

中共北方局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及时了解秋林会议情况，派晋西南区党委负责人张友清，秘密住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与新军领导人薄一波等，领导左派势力同阎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同时，紧急疏散左派力量，在秋林的牺盟会、决死队的干部，有的回前方，有的到延安。

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关于阎锡山内部情况的汇报。王说，阎锡山召开的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阎在报告中批评军队的政治工作，撤换进步分子等。毛泽东指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摩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听取了参加秋林会议返晋西北路经延安的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的汇报。毛泽东对雷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提醒山西新军领导人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1939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阎锡山又召开了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目的是借开会之名一举端掉新军领导人。新军领导人识破了阎的阴谋，除二纵队政委韩钧参加会议观察情况外，其他新军领导人均未到会。阎的阴谋未能得逞。

## 阎氏发动十二月事变 中共据理实施反击

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又称晋西事变），命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六十一军、十九军等部，围攻驻守在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大宁等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干部及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数十人。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维护山西抗战局面出发，促使阎锡山悬崖勒马，派彭德怀副总司令由延安赴秋林。12

月5日、6日，彭德怀先后会见了阎锡山与梁化之。彭痛斥反动分子的罪行，陈述利害关系，表示拥护进步，坚持反对倒退的决心，同时也表示了某种让步。谈话以后，彭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阎的上述反动决心有动摇之意。总之，阎投降与反共未到最后决定。”6日，毛泽东关于晋西事变及党的方针致电朱德等：“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决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以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晋西南新军于6日组成了“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指挥晋西南新军一致行动，对顽军的进攻实施反击。9日，毛泽东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方针又作了补充指示，认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我们的方针，“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有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

这天，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和八路军总部等，指出，“阎已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

晋西南地区新军由于连日作战，极度疲劳。顽军正以数倍兵力逼进。新军即决定北上晋西北。27日晚，新军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由柳林至离石之间的公路通过日军封锁线，进抵临县招贤镇、任家山；30日，又转移至离石、方山、交城、静乐地区。驻防于晋西北的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集中8个团的兵力，在白文镇、寨上村、开府、方山一线，企图阻止晋西北新军南下，并以6个团在临县以南阻止晋西南新军继续北上。在此情况下，晋西北新军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以续范亭为总指挥，实施反击，至1940年1月16日，将顽军逐出晋西北地区。顽军逃向晋西南。

在此期间，阎属第八集团军孙楚所部，联合部分中央军向在晋东南地区的新军决死第一、三纵队和八路军发动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奋起自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我们采取强硬方针是对的。当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指出：“（甲）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11日，毛泽东在复彭德怀的电报中，对目前国内形势指出：“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退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1月16日，毛泽东、王稼祥指示王世英，立

即向阎锡山等表示：山西新旧军斗争应和平解决，以便团结抗日，拟派南汉宸去秋林协商，问阎是否同意。28日，毛、王又电王世英，要他再问阎锡山等，“是否真正同意此间派人商谈团结抗战及调解新旧冲突。”2月11日，毛泽东为新军起草薄一波致阎锡山的电报，希望阎锡山调和山西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当日，毛泽东电朱、彭等，指出，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并指出，同阎锡山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

在中共一再争取，做到仁至义尽的情况下，阎锡山复电中共中央，表示，“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致阎的亲笔信到达秋林。信中鼓励阎：“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毛泽东还指示萧、王，“你们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的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软弱可欺。”萧、王在秋林与阎谈判了四天，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同意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等细节问题。阎锡山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4月初，双方正式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从此双方划界而治。

5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笔致信阎锡山，信中说：“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披诚直达，敬希明鉴。”



## 求生存 欲脚踏三只船 为大局 力争阎氏中立

“十二月事变”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方面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山西旧军力量在阎的指挥下，保存阎在吕梁山的地盘，恢复新军和阎的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和西北抗战。”

这时阎锡山的处境，实际上更为困难。他掌握的仅有晋西吉县等十余个残缺不全的县份，且这一地区山峦连绵，土地贫脊，军民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为表示励精图治，阎锡山把他的驻地吉县城南村，改名为克难坡。

始终处于日本、蒋介石和中共斗争旋涡中的阎锡山，想脚踩三只船，以图求得“存在”。

在阎锡山的司令长官部驻地，早在1938年8月下旬，便设立了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那是在朱德总司令由前方回延安，途经洛川转道山西吉县古贤村时，向阎提出并经阎同意的。商定由王世英担任办事处主任。王是山西省洪洞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生，1929年曾在阎军中工作，是办事处主任的最佳人选。办事处成立后，除了沟通中共与阎方的联络外，对阎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这个办事处直到日本投降时才撤销。国民党的省党部是1938年4月成立的。开始时，蒋介石提出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的要求。阎深知蒋的用意，未予理睬。于是，国民党就在财政上给二战区制造种种麻烦，压迫阎屈从。阎虽然不满，但因对国民党中央有依靠和需要的一面，所以只好同意。这样，在山西省停止活动多年的国民党省党部又重新挂起了牌子。主任委员名义上是赵戴文兼，实际上是蒋介石派来的书记长黄树芬。黄到任后，干了许多破坏团结抗战，反共反人民的勾当。随着形势的变化，阎锡山后来也与日军勾结，作投降日本的准备。日军虽然没有在阎的驻地设立办事机构，但准备降日和与日军勾结的人员，也是由这里策划和派出的。日军在策动阎投降的活动中，一方面与之谈判，另一方面也以军事进攻相威胁。因此，第二战区领导机关住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

变化。形势紧张了，从河东吉县克难坡迁到河西的宜川县秋林镇；形势缓和了，再由河西迁回河东的吉县克难坡。

当时，阎锡山是黄河两岸度春秋。一天，阎在用餐时，他的孙女树榕说了一首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抗战抗战，黄河两岸；十三个高干，哄着一个老汉。”阎听后一怔，接着哈哈大笑说：“他们的说法不对，是一个老汉哄着十三个高干。”

## 在国共两党的 斗争中保持中立

十二月事变，阎锡山尝到了追随蒋介石反共的教训。所以在后来的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他采取了左右逢源，保持中立的态度。

1940年4月4日，秋林各界举行除奸大会。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黄树芬在会上大骂共产党、八路军。4月11日，黄又在清明节追悼会上通过了呼吁国民党中央讨伐“叛军”的通电。对此，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提出质问和强烈抗议，要求在报端澄清是非，阎锡山却以“无可奈何”来搪塞。

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何应钦、白崇禧发表“皓”“齐”两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阎锡山接到通电后，犹豫不决。王世英面见阎锡山，指出“皓”“齐”两电是鼓动反共，破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坚决反对，一定要斗争到底。阎于是对何、白的电报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指示王世英，向阎锡山等说明国民党反共之自杀政策，“我们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执行友好。”并电述毛、朱向阎等三人的问候之意。

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副主任曹言行面见阎锡山，说明皖南事变真相。望阎仗义执言劝告蒋介石，以团结抗战大局为重，立即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和被捕将士。阎以“皖南的事不会是中枢的意见”为由加以敷衍。中共中央得知阎的态度后认为，阎锡山的态度是中立的，对孤立蒋介石有利。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了第三次反

共高潮。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黄树芬，利用曾任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武玉山致电毛泽东，要求取消中共组织。对此，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对阎的交际处提出质问。阎批令主管机关查纠，并下手书对武玉山严加斥责。

1944年9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会上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提出改组国民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中共方面通过办事处询问阎锡山的意见。阎锡山说，现在的中央政府，大家说是独裁政府，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有人又会说这是党派分脏的政府。表明了他既不拥护国民党独裁政府，又不赞成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

## 发展双边贸易以自救 阎氏愿与中共求共存

阎锡山财政上十分困难，部队粮饷靠中央政府供给。为了多领粮饷，阎属行政人员也实行军队编制。而国民党方面，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同时，不断卡紧阎的脖子，1941年以后，蒋介石进一步压缩对阎的供应，使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10月18日，他对王世英说，重庆当局不仁，晋西地域狭小，为抢粮生存，已令前方个别部队与日本人往来，并表示愿与中共亲密合作，“以共生求生，以共存求自存。”

为了解决阎方的经济困难，中共方面倡议双方开展贸易活动：“以物易物，以有易无，互助互利”。阎对此非常高兴，指定其经济作战处长徐士珙和贸易特派员崔楚材等与中共方面联系商谈。决定阎方在黄河西的桃渠和河东的吉县成立办事处，在平渡关、马头关、永和关、辛关和三交等地设立专事物资交换的渡口。初期双方交易主要项目是陕北的食盐和石油，晋西的布匹和熟铁。往后双方的联系越来越多，贸易额越来越大。1944年春，崔楚材去延安与边区对外贸易局就扩展贸易范围及交换物资品种进行磋商，此后，崔成为二战区常驻延安进行经贸活动的代表。二战区的各经济部门都开展了对边区的贸易。当地商人也一批批地到陕北做买卖，促进了晋西与陕北的经济发展，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对阎锡山的限制与吞并。

阎方与中共的经济往来和阎派员驻延安，被国民党特务侦知。重庆的国民政府指责阎，并企图阻止。阎回答说：“交换货物，并无其事，购买食盐则是实情，因晋西军民不能不吃盐故也。”国民政府无可奈何，只好决定每月拨20万斤食盐给晋西。阎方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的监视，改变了一些货物交换地点，不在宜川到克难坡的路上设点，改在吉县龙王迪以北的马头关、凉行崖渡口等地进行。

崔楚材在延安的活动暴露，蒋介石电阎查询，阎只好将崔密令召回。但1944年夏，阎借口欢送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的机会，又派徐士珙带崔楚材赴延，避开中央社记者耳目，秘密与边区有关部门达成物资交换的一致意见。

第二战区与陕甘宁边区在双方贸易中，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也促进了政治上的了解与合作。阎锡山借助边区的力量与蒋介石抗衡，达到了“存在”的目的。

## 中共旗帜鲜明反对投降 阎氏始终未敢公开降日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阎锡山为了“存在”，也考虑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同时，日军方面也在寻找机会对阎进行诱降活动。

1940年夏，驻太原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派汉奸白太冲偕特务小林高安，到孝义和隰县与阎锡山警卫军军长傅存怀接触，后又派特



阎锡山

务头子大矢秘密前往克难坡见阎。阎派其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随大矢到太原接头，并将两名日军俘虏秘密护送到太原。11月，阎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同日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赵秉承阎的旨意，提出“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项原则，并要求日军武装山西军队30个团等。1941年3月，阎派赵赴白壁关与日军第二次接触。4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清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9月11日，阎、日双方代表在汾阳签订了《晋绥军与日本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通称“汾阳协定”。此后，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按照协定向日军催要东西。后来，双方达成了阎方在太原、汾阳、运城等地设立办事处，和日方交换军事情报、物资的正式协议。

阎、日勾结，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1月18日，王世英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约见阎锡山。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王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日本表面气势汹汹，实际十分虚弱，进退维谷，面临困境的实际情况。并以坚定的态度表示了中共与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抗战持怀疑态度，提出，蒋介石如果同日本人妥约谈判怎么办？王世英明确回答，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下，不敢公开降日，降日会把他的政治资本丧尽，人民会把他打倒。同时，美、英等国也不会支持他降日。如果蒋介石扔掉抗日这面旗帜，去降日本，我们就坚决地打倒他。谁投降日本，我们就打倒谁；哪里有日本侵略军，我们就到哪里去打。中共方面的态度，阎不得不慎重考虑，所以暂时放慢了与日军勾结的步伐，只在互换情报与交换物资方面断断续续地进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对阎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促阎投降。阎又派赵承绶赴太原与日军交涉。在伪省长苏体仁斡旋下，决定于1942年5月5日在吉县的安平村阎与日军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会见。会见因天雨改在5月6日举行。会见中日方要求阎立即回太原，并逼阎早日通电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阎看形势不妙，怕被劫持。在会谈休息时乘机溜走。谈判遂告破裂。

中共中央得知上述情况后，指示王世英约见阎锡山，表明中共与八路军的态度，设法阻止阎降日。王向阎表明了中共及八路军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日的决心，愿同阎合作抗战到底，反对任何人向日本投降。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广泛地作阎部下各级干部的工作。并发动在阎内部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如进山中学校长赵戴文之子赵宗复，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族革命政治研究院主任杜仁之，同志会宣训组宣传股长樊耕农，运用各种形式做拖住阎锡山的工作。这些中共党员利用交际面广的条件，发动了孤立阎锡山的攻势。还动员阎的儿子劝说其父不要投日当汉奸。同时让具有民族气节的省主席赵戴文去作阎的工作。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内容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阎的降日活动。这样给阎造成了巨大压力。所以在日方要求阎发表日阎合作宣言时，阎采取了拖延的策略，虽然与日军仍勾勾搭搭，但始终未敢公开降日。

(责任编辑 吴 思)

## 欢迎订阅

# 《文史春秋》

秉笔特色 镜鉴特色

政协特色 动人特色

《文史春秋》是纪实性文史综合双月刊。她是中国和广西近现代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当代风云人物活动和社会百态的浓缩。文章由社会各界各阶层著名人士忆述，高水平作者和著名学者精心撰写或综合整理而成，以独特视角，鲜明特色，生动感人的笔调将读者想知道，对读者有启迪，于读者有所乐的史与事告诉读者。图文并茂，通俗耐读，具有较高权威性，可读性与史料价值。

●16开本 80页 定价5元

●地址：南宁市桃源路3号广西政协

●邮编：530021

●电话：(0771)2807862 2838360

# 我和于光远为『六十一人叛徒』假案平反作证

今年一月号《广东党史》发表于光远《向他祝贺,为他高兴——记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胡耀邦》一文,涉及中央为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61位老同志平反的一些事情。

于光远在文中说:“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我只做过一件事,就是曾彦修和我曾经写过一个对‘61人案’平反有用的材料。”“后来中央为六十一人平反的文件,用了曾彦修和我的证明材料。”“从过程上看,可能我先在口头上对耀邦讲过这件事,而这些我至今没有记起来。”光远同志已八十五六岁了,毕竟年事已高,有些事情的细节记不清了。我想把这事的前前后后情况说清楚,以免今后以讹传讹,目的是在暴露康生这个党内大坏蛋的罪恶,同时也记录下胡耀邦同志在为这些同志平反时心急如焚的崇高精神。

1977年大约春末夏初,于光远到了上海,住在市委的东湖路招待所。那时我在上海辞海编辑所。于打电话到单位叫我去见他。下班后,我去了,我约他在马路上谈,他问为什么?我说,刚揪出“四人帮”时,各大宾馆及重要招待所工作人员在街上贴了很多大字报,系统地揭露“四人帮”在这些地方进行的特务监视活动,重点是北京来的重要客人与上海干部的相互活动情况,包括来往人的详细登记、跟踪、监听、拍照等等。我说,现在不保还在于这种事,因为许多“文革”时的(中央)当权者照样在掌权。于告诉我,回京后他要到大庆去(当时他提过是纪登奎要他去的)。我建议他不要去,我说这是他们(指打倒“四人帮”后继续当权的原“左派”政治局委员们)嫌你这样的人在京碍他们手脚,故意把你赶下去的,你也可以找个借口不去,难道去一阵大庆就可以写出一本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么,还不是“两论起家”那一套?于对此未作答(近读冯兰瑞同志在《百年潮》今年三月号一文,才知国务院政研室面临取消合并而一致采取到大庆去是拖延战术,于带队,连胡乔木也去了)。

□ 曾彦修

我告诉于,我已写好两件材料,是致中央的,一份认为张闻天是真心拥护毛泽东的,1942年到陕北及晋西北作农村调查时,他对我们谈的很多,对张闻天必须平反;另一份是揭露康生的,就是“61人问题”,我们一齐亲耳听康生面谈的,“文革”中他又装作不知,大抓“叛徒”,康生这人必须完全推倒。那晚在路边我们二人共同回忆了一次关于“61人”案康生对我们面谈的东西。二人回忆几乎百分之百的一样。于光远嘱我回去即修改补充,用于、曾二人联名共写此件。我修改好后,第二天即送到于处去。于说,我回京后相机处理。

1978年我调到北京前,我在5月先去了一次北京。一次,在邓力群同志家中,我也只谈了张闻天、康生二人的事,并说我已写成两件材料,存于光远同志处。邓说,张的问题,王震同志已带头鼓吹平反,骨灰即迎回北京。康的问题比较麻烦,一时还不能提出彻底否定他的事情,你的看法是对的,不过还要等待一下时机。

说起来也好笑,我当时还是一个“摘帽右派”,竟敢写起对一个前党的中央总负责人,一个前党中央副主席,即张闻天、康生二人的评价都要来

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的材料。不过，我内心是很肯定的：党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老前辈和老同志们内心都是那么想的，不过在当时体制下，阻碍力还很大罢了。

1978年夏天某日上午，我当时已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筹备委员会工作，正在同姜椿芳、刘尊棋、唐守愚、阎明复几个同志一起开会时，于光远的司机老乔同志，来到我们当时所在极偏僻的三间小平房处找到我，说“光远有急事，叫你立刻去。”我打电话一问，于答“耀邦立刻要我们二人写的关于‘61人案件’的材料，你请假快来，这件事更重要。”我当然立刻就到于光远家了。时于正同三四个人在谈话，大概都是关于研究计划和出版书刊之类的事。于对我只简单地说，昨天看见耀邦，谈起我处尚有一份我们写的关于康生谈“61人问题”材料，耀邦认为极重要，说这是一个直接的、尖锐揭露康生的证据，你回去马上给我送来。但光远同志晚上没有找出这件材料。于告诉我，由于当时条件过于不成熟，“他们”还在继续歌颂康生，如果交上，很可能引起反效果，一放又找不到了。于说，耀邦等着要，反正你起草的，现在就赶快重起草，大约一千余字。写好后，于当场看了，好像没有改什么，就说可以，叫他秘书或助手马上拿去打印即送回。我说，听到这些话的人还很多，年纪大的如徐冰、张琴秋等同志已去世，但高文华和贾连夫妇尚健在，青年人凌云、史敬棠就在北京，不送他们联名送上吗？于说，来不及了，老年人如果记不得，反增加一层麻烦，凌云、史敬棠应还记得，但一个圈子绕回来，非一个礼拜不可，耀邦等着要，我们二人回忆完全一样，就可成为证明材料了。我也再没有说什么。后来并未要我再签名过，可能作为打印件送出了。材料的内容，大要如下：

1947年2月时，中央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前往晋西、冀中、山东渤海区等地作土改试点工作。团长康生（陈伯达开始也作了个把月副团长就带着团员田家英跟随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县去了），团员有老同志张琴秋、李立、曹轶欧、廖鲁言、陶××夫妇、高文华、贾连夫妇、徐冰、张晓梅夫妇（在山东时加

入的）、张越霞等；一个中年人张勃川，几个青年人于光远、凌云（兼工作团秘书）、史敬棠、曾彦修。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半年多，也随团学习，但他不参加哪个组，始终在康生身边，在群众中则用了化名。

1948年初，工作团绝大部分团员到达山东渤海区惠民地区阳信县某村渤海区党委驻地时，已快过春节了，就先没有立即下农村，而是等农村过完初五之后再下去。区党委于除夕宴请康生及工作团。但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同志是回族，他可是老得不得了革命家，据人名词典载，刘在1922年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不能参加一般性宴会，于是在春节那天在他家中邀请康生及工作团按清真习惯吃晚饭。说是晚饭，下午三时即入座了，因为要预留饭后散步时间。晚饭后，照例由康生带领大家在村外散步。散步时，康生问大家知道刘格平这个人？个别老同志知道，其余同志都不知道。康生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刘格平同志的历史，然后对我们说（大意）：这个同志很固执，缺乏灵活性，他是个老党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是一只要一提到‘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上面打引号的两句话关系重大，因此，我们听时印象特别深，我和光远同志当时就特别核对过，这两句话基本上是康生的原话）。康又对大家说（以下大意，不可能全是原句），“这个同志很特别，他比别人多坐八年牢，党要他出来，他坚决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康生继续说：少奇同志1936年春到平津重组北方局后，眼看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学生运动尤其经久不衰。可是，我们党的老干部绝大多数都在北平敌人（指宋哲元政权）狱中。那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敌人（指日本侵略者）一旦占领平津，这些同志就会全部牺牲。而且，蒋介石只要讲一句把这些犯人送到南京去，宋哲元就会立即欢送，以减少自己的麻烦。所以，情况是很危急的。少奇同志等研究后，觉得不能坐等日、蒋来屠杀这些同志，只能作为例外，履行“假自首”手续后，就能全部出狱。于是，北方局请示中央，经中央研究同意后复示同意。但具体出狱经过仍很复杂，这个指示传到狱中后，当时以薄

一波为首的61人都不同意出狱。“后来又催促多次,说再不执行就是违反中央指示了。”康生提及此时期奉北方局命办理此事的有几个人,提的次数较多的,好像是徐冰与孔祥祜二同志。康生又告诉我们,“后来狱中同志有点相信了,但不放心,决定先出来一个人,看看是否敌人的诡计,并约定暗号,放出的这位同志回去探监时,如果是真的就带去什么东西,讲什么暗语;如果是假的,又是如何如何等”。康生说,“结果这位先出来的同志了解确是中央的决定。于是这些人才出来。”康生又说,“可是刘格平决定不出来,把监牢继续坐下去。”至于刘格平同志是在日本投降后出狱的,还是抗战末期日寇败局已成,敌伪监狱当局已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而由狱外同志救援出狱的,康生好像也没有说的很具体,只是说刘格平同志“比别人多坐了八年牢”。康生还特别对我们解释了敌人占领了北平后为什么又没有杀刘格平的问题。康说,“敌人占领了北平后,汉奸们以为共产党员都在1936年夏天一次‘集体自首’全部出狱了,就把刘格平当成普通刑事犯继续坐监下去未予理会了,因此,他活了下来。”康生对刘格平坚持不出狱的态度如何呢?此点,光远同志和我特别核对过:康当时决未表示赞美,意思是说刘格平这个人太迂了,但原话我们记不得了,不能确定是否用过这个“迂”字。上述只是概略,已可看出康生当时对此事叙述之详。

上述经过,党中央自有全部详细资料,那才是合法的材料。我这里之所以记这么一些,只是为了一点,即:此事的源源本本,康生是比谁都清楚的。他长期任中央社会部长,也有责任弄清此事。所以,康生发动当时南开大学的“抓叛徒”造反兵团,首先出来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进而在全国几乎把一切地下党员都看成“叛徒”,完全是一个极大的一网打尽地下党员的阴谋。而且,薄一波同志等61人出狱的经过,长期在延安党中央重要机关工作过的一些党员同志也

早就大略知道了,我就是如此,不过这次是从康生口中亲自详述就是了。我怎么会早耳闻呢?因为我接触过不少从南京、苏州监狱在抗战后一两个月才出狱的同志们说,我们在蒋介石的直接统治下,蒋不可能像华北地方势力宋哲元那样释放我们,因此南方不可能采取这一方式出狱。

于光远和我二人联名送上的康生谈话材料,得到了上面的重视,因为它太直接有力了,把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有意制造冤案的狰狞面目彻底揭穿了。所以,这份材料的全文被中央附在了平反决定的后面,我看见过这个红头文件。

再说一遍,此案具体的实际经过,应以中央的翔实档案为准,此处所写,目的只在证明康生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阴谋家而已。

(作者是本刊特邀顾问,原人民出版社社长)

百分之百的纪实作品 百分之百的独家文章

欢迎订阅

# 中华儿女 杂志

阅读的享受 心灵的震撼

《中华儿女》杂志是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的国家级大型综合性人物纪实月刊。共青团中央主管,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为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指定允许刊登领袖人物传记的报刊,大量的政坛领袖秘闻秘史和各界风云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从这里独家首发。



邮发代号:2-10  
请向当地邮局订阅  
大16开月刊 每册5元 年价46元

邮购地址:北京市右安门外东三条中华儿女之家  
邮编:100054 电话:(010)63551157 传真:(010)63552136  
<http://www.dina5w.com> E-mail:zhern@bj.cnl.com.cn

# 赵祖康把上海的 资产档案移交陈毅

□ 吴跃农

上海不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吗？怎么还有政府移交这一说？而且是国民党移交给共产党？

确确实实。

上海市政府没有出现真空，国民党在最后一刻也没有撂下管理一个城市的挑子，还是留下了陈良和赵祖康两任代理市长的看守市政府，维护着最后几天的市政运行，在战火之后，战败者向胜利者交出政府印信，举行了政权移交接管仪式，由这个国民党的看守市政府心平气和地将大上海的市政权完整地交接给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旧市政府的全体公务员只要愿意，都平稳地过渡到新的市政府工作，继续为管理大上海出力，赵祖康本人也立即被陈毅市长任命为上海市工务局局长。

**国民党终于找到了上海最后一位代理市长，他竟也是共产党喜欢的人，是共产党点名要他留在上海别去台湾的“亲共分子”**

可以说，赵祖康是国共两党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选定了的国民党最后的上海代理市长。或者叫“交接市长”。这在中国现代史上绝无仅有。

屈指算来，赵祖康是第九位国民党的上海市长。

民国政府是在1927年7月7日成立上海特别市的，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上海特别市的成立，是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结果。先后有黄郛、张定璠、张群、吴铁城、俞鸿钧、钱大钧、吴国桢七任上海市长。然而，在1949年的4-5月间，就接连出了两位代理市长，即陈良和赵祖康。知道守不住上海，国民党的官员们一个个脚底抹油，谁都跑得比谁快，蒋介石4月底跑到上海，给汤恩伯打气，让上海坚持守住6个月，幻想美国出兵干涉，而这个时候，上海第七任市长吴国桢早跑到台湾去了，他不相信老蒋的痴人说梦，美国人早就对老蒋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在4月14日，就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市长一职由陈良代理。

陈良并不想站这最后一班岗，他的算盘打得鬼精，只想拍老蒋马屁，在这最后关头好好表现一把，把上海的黄金白银装上船往台湾运，自己最后也往台湾一跑，还怕老蒋不给他在台湾混个一官半职？所以，他在4月份一开始被吴国桢选中代理上海市长之职时，就在考虑找下一个代理他这个代理市长的又一个代理市长人选了。

陈良一直在打赵祖康的主意。解放军即将攻破南京城的那天晚上，国民党狼奔豕突，下一站就是上海了。陈良打开中共设立在附近、对准上海城区广播的“陕北人民广播电台”，听见中

共正在进行着“策反”，点名要上海老资格的经济专家颜惠庆、工务局长赵祖康以及张元济留下来别去台湾，为建设新上海而贡献自己的专业之长。

说实话，陈良怀疑过老实巴交的赵祖康跟共产党有瓜葛，只是树倒猢猻散，没功夫来管这事，更没力量来“肃奸”了。好！陈良眉头反而舒展开来了，共产党为他找了一个代理市长，妙，就让赵祖康来代理市长，让他把上海市政府移交给共产党，国共两党都体面，何乐不为？



1949年8月陈毅和赵祖康视察海墙工程

### 赵祖康，代理国民政府举白旗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代理市长，他只当了短短4天的代理市长，却永久地记录在史册上，上海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他是有功之臣

赵祖康是喜剧性人物。他的人生哲学是无党无派干实业，但他还是参加了国民党，他的参加国民党，是国民党硬拉死拽的结果。国民党有个规矩，凡在政府供职，做官至副处长，就必须加入国民党。

赵祖康是中国著名的公路桥梁专家。他30年代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道路工程，抱着“交通救国”、“工程救国”的理想，放弃了留在美国工作，毅然回国，可惜，旧中国连年战乱，他这个专家无用武之地，尽管在国民政府的交通部任要职，后来又被派往上海担当技术官僚，官至上海市工务局长，但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是越来越心灰意冷。

1949年初，像赵祖康这样的人，必须面对何去何从的人生选择。这年2月初，中共地下党派一位“李小姐”与他接洽，要求他能够留下来，共建人民的上海。地下党派来的“李小姐”还给

他送来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他把毛泽东的书包上《论美军登陆》的书皮，经常秉烛夜读，兴奋难眠。他心中开始亮堂起来，知道中国的光明前途在哪儿。之后，他以研究建桥情况为名，从工务局中拿出《市郊大桥地址图》交给地下党，好让解放军作战时有个参考。

共产党的电台点名要赵祖康留下来共建上海。“点名”不是随便点的，这是上海地下党市委的建议，经华东局和陈毅报党中央毛主席同意的。

解放军进攻上海市区的那天晚上，陈良派出的人一直在四处找赵祖康，赵祖康躲在同学家迎接解放。到24日凌晨，陈良的秘书通过特务机关调查，还是敲开了他同学的家门，找到了他，秘书一脸的喜色，赵祖康感觉不像是抓人的样子。秘书催他马上去见陈良。赵祖康驱车来到陈良家中，陈良正在指挥佣人收拾金银细软，他告诉赵祖康，找他是请他来代理上海市长的。陈良说，赵老兄，这事关国民政府的最后形象问题，国民政府前面在撤出南京时，只顾跑，撒手不管市政，秩序太坏，市民遭受极大的损失，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行政院长何应钦给我来信，要求上海市政府维持到最后一刻，不能自行作鸟兽散，国军与共军打仗归打仗，国民政





工作中的赵祖康

府还是政府嘛，不能自我解散嘛，要像个政府坚持到最后一刻嘛。赵祖康没有心理准备，地下党传口信让他坚持下来，为保护好上海多做工作，但他没有想到国民党会在最后关头“慧眼识珠”，找他担任代理市长，把大上海交给他来打理，心中一阵突跳，准备答应下来，又不知陈良是否是在试探他，便多了一个心眼，沉默不吭声，像是在考虑什么，半天才脸露“为难之色”，提出不如另找诸如赫赫有名的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主任、老资格的颜惠庆等人来代理。陈良忙摆摆手，很诚恳地说：“这些人都找过了，关键时候都不愿出来挑担子，再说——”陈良有意味地看赵祖康一眼，继续说，“他们看到共产党早吓破胆了，哪还有能耐与共产党办交接？赵老兄，这代理市长就只有你最合适，你在市政府担任局长时间长，资格老，出任此职，大家接受，你也得到了市民的认可，最关键的是，你是技术官员，没有政治派系背景，你形象好，共产党对你印象不错，共产党不会为难你的。”

确实，赵祖康在国民党官员中，他的人品是交口赞誉的，他只求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修身养性，情系天下。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他一直在国民政府的交通管理要害部门担任负责人，官至交通部公路处长、总局副局长，可谓实权在握，只要略施小技，在工程中玩一点手

脚，暴富是绰绰有余，然而，他没有这么做。在他那儿，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是安身立命之本；勤俭为根，静心为上，是人生态度。

### 红旗下的上海市政权 交接进入程序，这是解放 战争以来惟一的国共两党 市政府交接，赵祖康的准 备工作做得很认真细致

25日天蒙蒙亮，通宵未眠的赵祖康，急匆匆地来到老资格的国民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主任颜惠庆的家中，请教如何向共产党办理政权移交，颜惠庆表示支持他担任代理

市长，鼓励他承担责任，与共产党派来的接收代表圆满地洽谈好接收事宜。到25日早晨太阳升起时，苏州河以南市区已经被解放军解放。一大早，赵祖康赶到外滩市政府大厦，白旗在风中飘着，大门口已经没有哨兵站岗了，大门口的排列架上排放着市政府的所有枪支。

刚进办公室，秘书就敲门报告，说中共将在下午派人来商谈政权交接事宜。赵祖康马上给市政府各部门作了四点指示：一，各局处员工必须坚守岗位；二，各部门必须确保档案和一切财产完整齐全；三，市政府各系统向中共的移交在市政府移交仪式后进行，且必须事先经赵祖康联系中共才能进行；四，从26日起，各部门指派几名高级职员到市政府集中办公，及时沟通情况，迎接移交。

四点指示由秘书分头传达下去了。赵祖康坐下想还有什么要关照的事。他想到财政局和银行是社会运转的动脉，他立即要秘书把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召到办公室来，要求他们采取认真有力的措施，把现有的财产和档案资料保管好，完整无缺地移交给中共。之后，他个别召来市政府秘书长，要求他保护好市政府大楼的财产。他还打电话给工务局，要求他们坚持上班，各工务所的工人要去抢修市政工程，确保交通畅通。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他匆匆赶到与中共约定的见面地点、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李思浩家中，与中共代表商谈交接事宜。双方想的问题比较一致，商谈很快有了结果，达成了八点共识，具体是：

- 1, 接收机关以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派人员备有文件者为限，其余人员应予拒绝；
- 2, 维持治安；
- 3, 水电公用事业必须继续运转，防止破坏；
- 4, 原市政府各局处人员应坚守岗位，保管档卷财物，并照常工作；
- 5, 户口名册与地产簿籍务须妥为保存，等候移交；
- 6, 从速恢复交通，以安定人心；
- 7, 商店工厂和银行应立即复业；
- 8, 补发原市政府员工和警察五月份未发工资（事先应向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人征求意见）。

双方还认同，在中共政权运行前，重要事宜由军管委员会处理，具体事宜则由赵祖康负责执行。

5月26日清晨，赵祖康到公用事业部门现场办公，使上海市内的公用交通基本恢复正常，在他的督查下，上海的水、电、电话都没有中断过，一切正常。在紧张的代理市长工作中，赵祖康还参与了战事。5月26日，苏州河北岸在邮电大楼上不听从起义将军刘昌义指挥的青年军还在踞高死守，负隅顽抗，阻碍解放军攻过四川路桥，进入苏州河北岸，赵祖康应解放军要求，亲自前往劝降，用电话与邮政局长联系，让他与守敌喊话，晓以利害。下午，守敌摇出了白旗。

这一天下午3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市政府，全面接管警卫工作，赵祖康亲自站在大门口迎接解放军进驻，并专门陪同解放军警卫队负责人视察机关各局处，特别是察看了档案室，224.5万卷宗的档案在档案架上码放得整整齐齐，解放军警卫队负责人满意地笑了。

5月26日这天下午，中共代表、中共上海市总务处长熊中节持陈毅手谕来到上海市政府，手谕是这样写的：“着总务处熊处长前往旧市政府布置有关接受事宜，并通知原负责人作好准备。”熊中节通知赵祖康，中共将于明天下午三时整与国民党上海旧市政府举行交接仪式，熊中节就举行仪式的技术问题与赵祖康商谈了一会儿，很快拿出了方案。

中共代表走后，赵祖康最后一次主持召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会议，他召集财政局、警察局、工务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通报了5月25日下午他与中共接管代表联络洽谈的结果，也通报了刚才与中共代表熊中节谈定的28日下午举行交接的情况。赵祖康本是一介书生，但现在他指挥若定，颇有威仪，他心中想的就是，在这最后几天，上海白璧无瑕做不到，但至少是白璧微瑕，要把这座大都市交给人民，这是他代理市长的全部意义。因此，他严肃地关照他们要严格执行军管会的要求，落实八项要求，确保财产档案的安全，不得有丝毫差池。

赵祖康考虑问题很细致，会上，他还就维持秩序、搞好移交、保障民生等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力完成，主要是：继续征收各项税款，银行不得停业，要继续运转，已经停业的要尽快恢复营业，由代理市长与中共接洽交接各项册式，会议决定于5月27日上午交接进入程序，各部门向代理市长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进一步商讨怎么样把交接工作做得更好。

### 在上海市市长办公室举行了接管仪式。控制接管仪式的人当仁不让是中共的陈毅将军

28日下午2时整，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负责人，正气凛然地迈步走上上海市政府的黑色大理石阶梯，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二楼145号房间，就是“市长办公室”，约有80平米的宽大办公室，是扇形的，东面是落地窗户，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对着门摆在正中，地上是深红色的地毯，桌上是雕花台灯和几部颜色各异的电话。这里，上午还坐着国民党的最后的代理市长赵祖康，此时，已重新打扫得干干净净，办公桌收拾得一尘不染，光可鉴人，虚席以待中共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到来。

陈毅在熊中节的引导下进来了，随陈毅进来的中共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副市长韦恂、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

中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周林以及刘晓、沙千里、周而复、刘丹等在陈毅后面成一排坐下。副市长兼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坐在陈毅的左首。

陈毅见大家坐定,要赵祖康进来。早将机关职员召集到市长办公室对面会议室的赵祖康,整理西服并拢一下墨黑的头发,微微躬身走进市长办公室,先向坐在市长位上的陈毅一个90度的鞠躬礼,后又注目左右,向其他人行60度的鞠躬礼。

两人年龄相仿,陈毅48岁,赵祖康49岁。陈毅靠着高椅背,双目威严,用低沉的语调发问:“你是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是。”“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怎么样?”“条条照办了。”“资产、档案呢?”“完整无损,请一一查点。”

问过话,陈毅脸色和缓了,站起来,伸出手来,赵祖康赶紧趋前,两人握手,赵祖康赶紧把上海市政府的印信交给陈毅,陈毅接过来,指指办公桌对面特意空着的一个椅子说,“赵先生,请坐!”

赵祖康向陈毅概要地汇报了最后几天上海市政府的运转情况。

双方又一次握手,陈毅的四川口音洪亮而亲切,他对赵祖康说:“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

嘉许。期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

简短的交接仪式结束了。陈毅等在赵祖康的引领下,来到市长办公室对面的会议室,参加由赵祖康事先安排的接管欢迎会。陈毅事先特意让熊中节关照赵祖康把政府所有的勤杂工都叫来参加,赵祖康当然是照办了,勤杂工坐在会议室里参加会议,赞叹共产党是亲民爱民的。

**新生。国民党最后的代理市长成了人民政府的高级干部,“官复原职”,担任了工务局长,肩负着新上海的市政建设工程。之后,赵祖康以民革党员的身份,先后担任了五届共14年的上海市党外副市长**

全部程序结束后,陈毅请赵祖康到市长办公室去聊一聊,陈毅的平易近人,使赵祖康决心将自己今后的工作想法跟他和盘托出,刚落座,赵祖康就说,他准备去干自己的专业,到交通大学去教书。陈毅直截了当而又诚恳地对他说:“赵先生,我们一定能在市政方面很好地合作的,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来很好,国家建设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可以发挥你的专长,我想请你干老本行,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一职。”“我们是能够很好合作的!”陈毅在结束讲话时又大声着重强调了这句话。

几十年后,赵祖康还是逢人就提陈毅当年说过的这句话,他说:“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陈毅同志那句出乎至诚、感人肺腑的话——‘我们是能够很好合作的’,这句话在我的一生中许多重要时刻都起过作用,他帮我作出了一种选择。历史证明,这样的选择对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欢 迎 订 阅

### 2001 年度《大江南北》杂志(月刊)

《大江南北》于1985年创刊,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办。主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优良传统。特色:历史与现实结合,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备,主题深刻严肃,风格真淳纪实。

大江南北杂志社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33号9号楼1楼。

邮编:200002。 电话:(021)63291031

全国邮局办理订阅零售。邮发代号:4-443。

每期定价:4.10元,全年49.20元。

本社发行部亦办理订阅邮购。

发行部地址:上海市茅台路690弄22号101室。

邮编:200336 电话:(021)62333247。

# “三出三进”祖国大门的 侯健存教授

□ 杨连元

这里记述的是我国一个老知识分子历经磨难而爱国之志始终不渝的人生历程。

——题记

年已74岁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香港大学校友联谊社理事长侯健存，每每吟诵屈子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都按捺不住激情的涌动。这位当今中国医学科学界免疫病理学科的带头人，也是建国后老一代医学科学工作者当中传奇式的人物。他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曾经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有着“三出三进”祖国大门的曲折经历。

—

1923年，侯健存出生安徽怀远。母亲生了他们兄妹七个，他排行老二。“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山东济南上小学。“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和“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等激昂铿锵的歌声，敲击他幼小的心灵；西安事变至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在北平通州潞河中学念初中。为避战乱，免受亡国奴之苦，14岁的侯健存后随母亲、兄弟逃难到四川成都，寻找由山东流亡到成都的父亲侯宝璋。

侯宝璋(1893—1967)是我国近代病理学先驱者之一，在国际病理学界也享有盛誉。他幼年在家乡上过私塾，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少年时代离家出走，开始在一所教会医院里帮工。这一偶然的境遇却决定了他一生的医学生涯。由于他肯干好学，感动了院方，保送他上北平协和医学校学习。后来，他又在齐鲁大学医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深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等地相继沦陷，危及山东，

此时已是齐鲁大学教授的侯宝璋抛家离舍，顾不了自己的妻室儿女，却全心全意组织该校学生转移到成都华西大学借读，使诸多学子免受失学之苦。

既有着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又接受了“五四”时代科学救国新思想的侯宝璋教授，结交的朋友大都是当时的进步人士，如老舍、赵望云(黄胄的老师)、关山月等，还有抗日将领冯玉祥。

至今侯健存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一些情景。

在齐鲁大学幽静的花园里，才华横溢的老舍先生常给他们几个满脸稚气的孩子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神了，欢喜了，先生回家后便挥就一篇佳作；孩子们若是分了神，不爱听，过几天再讲，人物情节准有改动。

有一次，冯玉祥将军要亲临侯府吃饭，令家里好生为难：国乱当头，教授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贵客临门，侯夫人还是忙不迭地下了厨房。其实，冯将军一直牵挂着教授一家的冷暖安危，将军来时竟随身捎来两袋在当时比金子都贵重的面粉。开饭时，侯健存帮着母亲上菜。冯将军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位风华正茂的侯家二公子，意味深长地说：“好好学习呀，将来国家得靠你们啦！”

父亲的言传身教，周围环境的影响，小小年纪的侯健存决心继承父业，发誓要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他在成都先读完高中，后就读金陵大学化学专业，按照父亲学好医学必先打好化学基础的意见，侯健存计划毕业后转学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读医学专业。

然而，特殊情况发生了：

父亲得到左派朋友的通知，国民党特工人

员正在跟踪他，还有他在金陵大学读书的二儿子侯健存。第二天，金陵大学国民党三青团的负责人、农学院的学生易某人也找到侯健存，“友好”地出示了由上峰签发的一道密切监视侯氏父子的指令。所幸易某人平日很尊敬侯宝璋，待侯健存也不错。易某人说：“我们都知道你的，你也不会的。”有意无意，这种“警告”等于放过了他。

1946年，美国政府邀请中国一批知名学者赴美讲学，包括老舍、曹禺等人，侯宝璋也在其内。他应邀赴美后，第二年又赴英国讲学。1948年，他受聘于英国教育部，成为香港大学二战后第一任华裔病理学教授兼系主任。侯夫人廖文瑛则随后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经广州转赴香港。

父母都走了，侯健存留在了内地。1949年成都解放了，而在华西校园内，却掀起一股“反国民党余孽”之风。有人说“侯宝璋曾经在法医病理诊断上帮过国民党军阀的忙”云云。作为儿子的侯健存，面对如此尴尬的境遇，他只好提出申请，拿到军管会的“路条”后取道北京，与正在协和医院进修的恋人刘冬生话别，尔后去了香港，就学于香港大学医学院。

这一年，他刚刚26岁。

## 二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周恩来代表党和



侯健存教授和夫人刘冬生

政府号召海外的炎黄子孙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这时，侯健存在香港大学刚刚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并在生理、生化系申请到示教员（助教）的工作，如果干下去，前途大有希望。但1952年底，侯健存毅然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并得到父母的支持，放弃香港大学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只身一人回到北京，进入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工作。当时，国际上正掀起一股反华的逆流，而朝鲜战场的炮火也危及我国的边陲，侯健存的举动在当时的海外学子中，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1955年的“肃反”运动开始了，他成了卫生系统重点审查对象，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响应学校号召“投笔从戎”，在美军战略情报局当过翻译。在一次会上，主持人宣布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代号为“055”。工作人员连忙上前纠正说：“念错了，不是055，那是战略情报局的英文缩写——OSS”。

一下子，他如入云里雾里，新婚燕尔的妻子和千里迢迢回国探子的老母也爱莫能助。

侯健存第一次回国后，便与大学时的恋人、在上海同济医院工作的刘冬生喜结连理。老舍和夫人胡絮青即作主婚人，又代表远在海外的侯宝璋夫妇，祝愿他俩天长地久，幸福美满。

但新的生活刚刚开始，侯健存就被隔离审查了。

1955年11月间，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广东省委称：香港大学组成以布兰敦教授为团长的访问团，拟于12月中旬到北京访问两个星期，主要目的是了解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情况，还要与我科学界、教育界人士接触和进行学术交流（涉及文学、历史、法律、医学、农业、生物、物理等学科）。该团共有30人，其中24位是英国人。6位中国人中包括国际上公认的病理学权威、该校病理系主任侯宝璋教授及夫人、香港著名大律师陈丕士、香港文化界名人陈君葆等。

廖承志获悉，立即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委托中央副秘书长刘澜涛负责着手安排接待。

遗憾的是，参与组织这次访问活动的侯宝璋教授，最终“因故”未能成行。不言自明，是他

儿子方面的原因。

访问团到京时，单位派刘冬生去接站，接侯健存的母亲。

婆媳见面，侯老夫人亲切地问：“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健存呢？”刘冬生解释：“他正忙，今天来不了，明天也许可以。”老人急了：“他是不是给关起来了！”儿媳无言以答，只有流泪。

第二天，侯老夫人由港澳办工作人员诸华陪同，来到单位要见儿子，遭到拒绝。婆婆问儿媳，怎么办，儿媳说，只有找周总理了。

12月15日上午，诸华向熊向晖汇报了侯老夫人的要求。16日凌晨一时，熊向晖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四时许，熊向晖便收到总理特急批件。总理指示：应让侯健存与其母自由见面，不加限制，也不必老舍等向她作任何解释，只有当侯宝璋夫人向我们询及肃反情况时，才需要派人向她作解释。总理批评道：此类事为何事先不向我报告？他要求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赵毅敏抓紧这一接待工作，并要求熊向晖遇事电话请示，不得贻误。

12月17日，侯健存告别了隔离室。

12月24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23日下午接见了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京访问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布兰敦一行。

接见时在座的，有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阳翰笙，文化部长沈雁冰、副部长丁西林、郑振铎，教育部长张奚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等。

12月25日傍晚，华灯初上，侯健存与妻子陪同母亲来到北京饭店，出席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主持的招待香港大学访问团的茶会。其实，精心安排这个茶会的也是周总理。茶会进行中，总理健步朝他们走来，大声地对侯老夫人说：“真是佳儿佳媳啊！”寥寥数字，侯健存的心中如沐春风，冰消雪融。

老人家后来特别高兴，尽释前嫌，祖孙三代共享了几日天伦之乐。

侯健存认为自己的学问还不够，想再次出国深造病理学。侯健存的请求，首先由于父亲的

支持，或者更准的说由于父亲的原因，很快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因为此时，我有关方面正争取侯宝璋先生回国。

侯健存没花国家一分钱，由父亲推荐到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学习。

他第二次离开了祖国。

### 三

侯健存是唯一来自新中国的留学生进入伦敦大学医学院的，他在国际著名病理学家凯美隆爵士的指导下，攻读实验病理学博士学位。

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出国之后他仍然有时受到冷遇，一些国家的学生当面辱骂我们的党和国家，还对他采取过非礼的行为。侯健存身处异国他乡，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进行了严正的驳斥。同时，他坚持自强、自重，奋力学习，只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学业，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导师的评语是：侯健存并不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留学生差，尤以他的品德是优秀的。他立即推荐侯健存享受伦敦大学每两年一度的“葛兰氏研究生奖学金”，并担任“大学示教员”指导学生实习。周围的人也渐渐对他改变了态度。

在伦敦大学就读期间，侯健存发表了六篇论文，每篇论文的通讯地址，他写的都是“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他从来都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

不久，侯健存接到来自国内的信息：周总理希望他协助父亲返回北京工作。他放弃了应聘英国伦敦皇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员的计划，1961年底回到香港，1962年经过辗转曲折，和父母一起回国定居。周总理签署命令：任命侯宝璋先生为北京中国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

全家到京后，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为他们洗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出席宴会作陪。周总理亲切地尊称侯宝璋先生为“侯老”，幽默地称年近四旬的侯健存为“侯小”。总理举杯说：“侯老，对你们在这个困难时期回来，我十

## 四

分钦佩！”他接着说：“我们闭关自守多年，对外面的科技发展、进步很少了解，侯老这次回来，可以引进医学新科技，引进人才！”总理谆谆嘱托，要侯健存协助父亲办好中国医科大学（即今协和医科大学），使中国医学教育和科学走向现代化。

此刻，“二出二进”归来的侯健存踌躇满志，他协助父亲把老人家毕生收集的几十箱病理标本、图片资料无偿献给了国家，还把周总理亲批的10万港币安家费花在了中国医科大学，建立一个病理生化实验室。

漂泊多年的海外赤子对祖国可谓一往情深。

在侯健存的住所，有三张已经略微发黄的证书却分外醒目——

一为1963年5月7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署：侯宝璋先生以历年在香港收集的晋、唐、宋各时代的瓷器229件捐献给国家；

二为1964年5月18日继续捐献珍贵瓷器后，又将多年苦心收集和珍藏的名贵书画68件捐献给国家；

三为1972年8月17日侯夫人廖文瑛女士捐献：书画736件，文物277件，图（古）书2067册。

以上均为侯宝璋教授夫妇用多年收入和心血积攒收集而得，他们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给子女留下的，是自立、自强的人格，是恪守情操，汲取知识的魂灵。

侯宝璋先生不幸于“文革”风暴心脏病突发而故；侯老夫人长寿106岁无疾而终。

他们把根留在了热土，也把风范留给了后人。

如今满头华发的侯健存也曾不无惋惜地说：“当初我们国家正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也有了一展报国之志的机会，真想大干一场啊！”

但是，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原因，使侯健存的美好愿望没能实现，一场祸国殃民的狂风逆流摧毁了他们父子刚刚建立的教学和研究实验体系，全家不仅受到了冲击伤害，不幸的是，还失去了慈爱的父亲，失去了亲如手足、在北京医学院任教的弟弟。

“文革”中，有人仍旧顽固地认为：侯健存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来，肯定是受了派遣当特务的。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到1974年，才被允许参加一点辅助性的工作，大好的年华就这样被无情的政治运动消磨掉了。

侯健存说过，经受挫折而奋发向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对以往的苦难含泪低吟，也依旧燃烧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历史翻过新的一页，侯健存的人生也展现新的篇章，他说过：“是小平同志给了我报国的机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负责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关照他陪同母亲出国休假，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向海外朋友做些宣传解释工作。

当他和母亲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香港和英国时，引起了轰动。

当时国外的离奇传说很多，有的说他和父亲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此次出国，一些朋友力劝他移居国外；国内的人们也说，他有此机会绝不可能再回来了，只有傻瓜才往回跑；单位领导对他负责的工作都按照“不会



侯健存教授与母亲在一起

回来”而安排接替了。

在探亲访友之余，他抓紧时间应邀到伦敦大学医学院、剑桥大学医学院讲学，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国际免疫学会，还利用自己的影响组织了英国三个科学家代表团到国内访问。1982年，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三出三进”，又陪同母亲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回国这些年来，他从事着在国内外都尚属首创的免疫病理学课题的研究，也为国家培养了十几名研究生，还一直坚持与香港人士之间的往来沟通，担任了香港大学校友联谊社理事长，并当选为第七、八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回顾40多年的往事，侯健存说，祖国的向心力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任何力量

都无法隔断与征服的，这是祖国统一、民族强盛的根基。

侯健存最后感慨地说，真正了解我的信念与追求的人，对我“三进三出”不会感到诧异。从我的父辈和许多志士仁人起，为了救亡图存，都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熔铸在一起，这是一种最可贵的传统。我高中毕业时，老舍先生曾在纪念册上以我“健存”的名字写下意味深长的留言：“体健、神健，国存、我存。”我已经77岁了，但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享受着我的科学青春。

人生是无悔的。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代 购 代 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询购较多的书籍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季羨林人生漫笔	季羨林	21.00	3.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19.50	3.00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徐 葵 张达南 译	28.00	4.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6.00
斯大林秘闻——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李惠生 盛世良 张志强 等译	39.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直面人生	戴 煌	19.80	3.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3.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载	15.00	3.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毛泽东最后十年	陈长江 赵桂来	17.00	3.00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与故事	许启贤	23.0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的自述	温济泽	22.80	4.00
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原上草	牛汉 邓九平	24.00	4.00
六月雪	牛汉 邓九平	25.00	4.00
荆棘路	牛汉 邓九平	23.00	4.00
	(购买全套《思忆文丛》邮费7.00)		
海 丝	杜明明	28.00	4.00
龙文化与民族精神	鲁淳 王才 冯广裕	20.00	3.00
红墙回忆	纪 学	48.00	5.00

《李锐其人》最早走出“左”的禁锢，坚持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通过李锐的一生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翻卷，而从中国以至世界历史的背景来看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知识分子的李锐，才能更看清他“这一个”最早走出“左”的禁锢，坚持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29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红墙回忆》红墙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红墙内是共和国领袖的住地。这里，有波澜起伏的政治风云，有领袖人物的真实人生，有领袖们的感情生活……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邮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 考据之学未可废

□ 吴 江

中国是一个有考据学传统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文字最早是刻在骨片上、竹片上(用绳子串起来,叫做“编”)或写在布帛上,极容易散落不全,用纸印刷是后来的事。古籍除散落不全外,有很多还是经后人补漏、增删、修改过的,伪书也很不少。加以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古籍散失及被大量焚毁,数不在少。秦始皇焚书,项羽进咸阳的一把火,不知道毁掉多少古籍。有的书后来又出现了,其可信程度极低。为此,中国古来考据训诂之学甚盛,是不足怪的。古人治学分为二:一为义理之学,一为考据之学。

考据学最盛是清代,史称“乾嘉考据学”,因为它主要兴在乾隆嘉庆年间(约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代考据学之盛,固然和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有关,文人都钻到古籍中讨平安生活去了,然而这样一来,清汉学家反而能够承袭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之法,并发扬光大之,提倡严谨平实,实事求是,反而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在整理古籍尤其在发展史学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就说明考据学的兴盛也由于学术自身的需要。据说,乾嘉时期著名的考据学家达170余人之多,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外国也有考据学派,例如德国的语文考据学派,提倡确实可据之文证,一切传闻复加考证,辨其真伪,衡其高低,据以作史,务信而可征。这学派对中国学者也很有影响。

段玉裁在《经韵楼集》中说:“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论之是非。必

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后人。”这段话最能说明古代考据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今天是不是还需要考据之学呢?我想,还有此必要。当然,我们今天的考据和古人的考据不同,不仅对象不同、目的不同,而且要避其烦琐、无谓之风。古代考据的主要手段是以文献考证文献,有时只拘于一字的是非,纯属经验型,缺乏必要的理论思维,因此很难走出为考据而考据、蔽于古而不知世的圈子。我们是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辨明是非真伪,所以需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证方法,要有批判的理论思维。举几个例子来说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需要对自来的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著作加以考证审查,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其价值和历史上曾起过的作用。如我们过去反对考茨基,许多人却连考茨基的一本著作也没有读过,现在不妨回头去读一读考茨基的书,特别是他晚年所阐述的唯物史观,重新考证一下他的思想和主张究竟如何。又如过去跟着斯大林反“托派”反得恐怖之极,但究竟托洛茨基的主张是什么,列宁为什么和托洛茨基长期共事,都要重新考证明白,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在这方面,读一读《托洛茨基自传》是有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有可以考证的。如《资本论》第3卷,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原始手稿整理的,外国学者历来有争议,但过去由于马克思原始手稿一直束之高阁,争论双方的论据都不足。

1922年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公布了(收入德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4卷第2册),过去的争论就变成了考证,即比较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的整理稿来弄清问题,弄清哪些是马克思的原文或原意,哪些是恩格斯补写的,由此对《资本论》第3卷作出总评价。至于当代领导人的《文集》、《文选》等,可考证之处也很多,特别要和原始文稿相对照。现在的领导人编自己的文集往往修改原稿,有的原则性的删改或增加,实属不当,因为这往往改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上有的重大问题的创见的“发明权”究竟属于谁,也要考证清楚。中国人是最喜欢抢“发明权”的。

关于历史。近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国史、党史,其中的问题和人物需要考证明白的就更多了,尤其是涉及政治方面。政治,无论是正义的、非正义的,大都被人和阶级的利害关系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或多或少被歪曲,常常失去了本来面目。中国人积几千年经验,认为当代人不能写自己的历史,即便写也写不出真实的历史来,不管愿意不愿意,非待后人重写不可,这是有道理的。历史好比是被人的利害关系搞浑了的一池水,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沉淀,或者撒下一些清洁剂,才能清晰起来,使人看清其中事物的真相。考据学好比是清洁剂,起排污除杂的作用,但也须间隔一段时间之后才着手去做。

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现代史,许多问题议论不一,评价各异。这里自然有立场问题、观点问题,但首先(或者起码)要把事实考证清楚,根据事实下论断。对于历史,首先不是要“划清”什么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弄清是不是符合事实的真历史即“信史”。根据主观设定的立场观点来取舍事实,是不足取的。在中国,“中华民国”已成为过去,算是“前朝”了,历史学家已经写出了一部篇幅浩瀚的《中华民国史》。与此同时,台湾学者也写出了一部《中华民国史》。两部史书恰好可以对照,这样或许有利于考证清楚某些历史事实。至于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正处在发展过程当中,难以写出全史或完史,很长时期内

只应重在积累资料并考证清楚一些人和事方面多下功夫。“史事难,核实为难也”。特别是核实清楚当代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难度极大,阻力必多,从事这些工作必须有足够的勇气甚至牺牲精神。应赋予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以必要的独立权和自由度,官方,特别是当事人及有关人员不得任意干涉。也应当允许历史工作者以私人身份从事著述。否则,“历史”本身将禁不起历史的检验。权力在这方面归根到底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各种形式的考证、考据平日我们也在做,只是由于教条主义、权力意志(说得不好听一点,还有“奴仆思想”)作怪,往往做得不彻底,或者该做的没有做,单凭“上面一句话”或“经典的论断”决定问题。忌讳曲笔,事实失实,或有意隐讳伪造。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我说我们需要考据之学,不是说要起“乾嘉考据学”于地下,而是说,我们无论对待“经典”,或写历史,或对待已有的史书,都要有一种考据眼光,下考证的工夫,不要轻信,不可盲从。比如,某经典书中所下的论断其根据究竟如何,所批判的论点恰当与否,是否与事实相符,尤其是被批判的人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其学说究竟如何,都要用考据的精神将他们弄清楚,不能囫圇吞枣地吞下。特别对当代各种史书(包括党的历史)要依据辩证唯物史观和新的资料,独立地重新加以审视。清考据学家钱大昕写《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写《十七史商榷》,赵翼写《二十二史札记》,就是下的这种功夫。我们自己撰写历史更要有这种精神,要把每一重大事件、关键事件、重要人物都考证清楚方可下笔,作定评更须如此。撰史必须对事实和历史负责,不能对权力意志负责。凡有“奴仆思想”者均无撰史资格,可以改作“私人秘书”去。认为凡经典著作上写的都无可怀疑,任何一本官方批准出版的史书其中每事每人的记述全都合乎事实,那是奇谈怪论,决不可以相信。相反,凡是有这种认识的人大抵可断定是“教条”成性,连“南书房行走”都不够格,马克思是决不会将这种人收入门下的。

(选自作者最新出版的《文史杂论》一书)

# 《城南旧事》作者 林海音青少年时代的 人和事

□ 张光正

自1982年《城南旧事》电影放映以来，台湾老作家林海音的名子在内地几乎家喻户晓。林海音之父林焕文和我父亲张我军，都是七、八十年前定居老北京的第一代台湾人。海音之母黄爱珍与我父是台北板桥乡亲，据说爱珍女士在15岁嫁给焕文先生之前，与我们张家某人有过姻亲之议。此事虽未成，两家却一直以亲戚相称，我和弟弟们从小都叫林母为姑妈；海音姊妹称我父为大舅或清荣舅（我父原名清荣）；我与海音则以表姐弟互称。当年焕文先生的丧事及海音的婚事，我父亲都是主事之人。这大概是林海音写她在“第二故乡”（北京）“金色年代”的一些作品，使我读来倍感亲切的缘故吧！

但是，我们在研讨林海音作品时，万勿只注意到她“比北平人还北平”的一面，而忘记了她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番薯仔”（老一辈台胞自称“番薯人”）。

1987年林海音在台湾出版《家在书坊边》一书，其中刊出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是1926年他父亲在家里召开台湾同乡会时，十二位“番薯人”的合影，其中有几位是最早定居于北京的：

陈顺龙（1867—1937），台南人。16岁从台湾到香港，师从一位美国牙医学习（林海音的文章说他在德国学牙医，不确），清光绪十三年（1887）到北京，在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46号（现为64号）开设“陈顺龙牙医馆”，曾应诏进宫

为西太后医牙，得到过赏赐。据《鲁迅日记》1917年12月至1923年1月的记载，鲁迅曾在此医牙疾9次。林少英（1879—1956），台中人，20年代初携眷自台来京定居，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曾开办汽车行和投资公路建设事业。谢廉清（1903—1961），彰化人，1922年入北京朝阳大学，1926年毕业于该校经济科，曾任记者、教授，据说他在1925年春，曾自北京秘密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4个月。照片上还有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1889—1931）和叔叔林炳文（1902—1927），他们是台湾新竹人，分别于1922年和1925年自台来北京定居，供职于北京市邮政局。

旅居老北京的台湾人，同北京的会馆多有不解之缘。清康熙年间台湾是福建省下属的五个“道”之一，当时台湾举子进京赶考就下榻于福建省各州、府、县设在北京的会馆。1885年台湾建省后，曾单独建立台湾会馆，但不久日本霸占台湾，台湾会馆也不复存在了。民国建立后，从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到北京求学的青年学生，大都囊中羞涩，不付房租的会馆，便成了他们的安身之所。所以20年代初我父亲张我军和洪炎秋先生等到京后，就住在后孙公园胡同泉郡会馆。父亲在这里住了九个月，与住在湖北会馆一位补习班女生（即我母亲）相识、相恋并相偕赴台成婚；他将全部恋爱经过写成55首新

诗，题名《乱都之恋》出版，成为台湾的第一部白话诗集。

林海音之父林焕文一家，1922年从台湾到北京定居后，在京曾先后设寓7处。但居住时间最长，给林海音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其中的三座会馆。一座是宣武门外椿树上二条3号的永春会馆。这座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初年，林焕文一家住在会馆后院3间房，在椿树上二条开了个后门进出。海音在这里开始上小学，三妹燕珠、弟弟燕生都在这里出生，弟弟的奶妈即《城南旧事》中的“宋妈”，也于此时出现在林家。

第二座会馆是宣武门外虎坊桥大街51号的广东蕉岭会馆。会馆共有房17间，占地一亩有余，林焕文先生以大陆祖籍在广东蕉岭为由，租住了会馆的三进院落并油饰一新。此时他的二女儿已从台湾来到北京，又生了四女和五女，加上车夫，“宋妈”和另一奶妈，全家共有11口人，林海音说这里是她“成长中最难忘的地方”；“《城南旧事》和其它短篇怀念文章，都是以此地为背景”。

然而，《城南旧事》里却写道：从宣外骡马市大街，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就到椿树胡同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她家住的胡同。按这么说，林宅应当指的是椿树上二条胡同永春会馆那个家，但文章提到“厢房”和“跨院”，又像是蕉岭会馆那个家，看来《城南旧事》是把两个会馆的家“合二为一”了。文章又说“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是“惠安馆”。查“惠安馆”原名为“惠安邑馆”，是属于泉郡会馆的附产，地址在宣武门外旧羊肉胡同东头路北。羊肉胡同现已改名为耀武胡同，与椿树上二条并非一条胡同，这或者也是作家出于小说情节需要，而把它挪了个地方吧。

在海音的作品中以会馆为背景的，好像只有《城南旧事》里的“惠安馆”，这一节几乎占了全篇文

章的1/3。其中主要人物是住在会馆里的“疯姑娘”和住在会馆附近井窝子的“妞儿”。“疯子”王秀贞的爷爷和爸爸原来在海淀惠安义地看坟，爸爸后来被调到惠安馆当“长班”。“义地”又名“义园”，是埋葬在京逝世的惠安乡人的坟地；“长班”又称“馆役”，是会馆的勤杂人员，负责收发、卫生、传达、接待等工作，大多由本乡人充当，且有世袭的习俗。王秀贞一家是否惠安乡人？书中没有交待。这个姑娘的故事主要是与住馆的惠安人名叫思康的北京大学穷学生发生恋情，未婚先孕后又遭男方遗弃而引发的一场悲剧。王秀贞六年前临产时被送到海淀的义地分娩，女婴生下后被包裹起来弃于齐化门城墙根。巧的是，井窝子的“妞儿”这年6岁，是被她养父母从齐化门城根下拣来的，英子又发现妞儿脖子后正中有块青记，同秀贞私生女的胎记一模一样，于是英子就使秀贞与妞儿相认。母女出走，打算到惠安找那个思康去了。齐化门就是北京内城东边的朝阳门，海淀镇则位于北京城外西北方向，王秀贞的私生儿为什么要丢弃得那么远？是怕她寻迹找回，还是有什么迷信说法，就不得而知了。

林家安居的第三座会馆，是焕文先生逝世后，家道中衰，为节省开支，从梁家园租住的两层楼房搬到位居南柳巷55号晋江会馆的。海音在这里读书、就业和结婚，度过10年之久。这是座建于清初的老会馆，奶奶和父母曾多次带我去过那里，主要是同与我年龄相仿的海音的弟弟燕生玩耍。1985年7月海音的二妹要从上海去香港同海音相聚，我为了拍些北京的现状照片稍去，特意去南柳巷寻访晋江会馆。谁知连会馆的那个门楼也踪影全无，经多方打听，才知那座门楼被一户人家改建为住房了。

清代北京实行“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的政令，于是大大小



一九三一年，林海音时年十四岁

小的会馆逐渐在外城的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外的商业繁华地区兴建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琉璃厂等新旧书肆的出现，民国以后又开办了京师大学和改为师范大学后新建的中小学校，加之原有的厂甸、天桥、城南游艺园等集会和民间娱乐场所，编织成老北京城南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浓郁氛围，使青少年时代的林海音深受熏陶。她又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贫民和弱势群体，观察到他们的苦难和心境，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当年的“番薯人”背井离乡，从富饶常夏的台湾，来到十丈风尘、寒风凛冽的北京，初来乍到，水土不服、习俗不同、语言困难等障碍是免不了的。

但对于绝大多数“番薯人”来说，不用多久便融入京城生活，表现出台湾同胞勇于漂泊异乡去开创新天地的传统。正如日据时期台湾文化革命先辈黄呈聪先生所说：“我们台湾的文化，从前也是由中国而来，不论风俗人情、社会的制度都是一样，比如我们到中国，不论什么地方，住了两个多月，大概就可以会意没有什么难的。（因为）中国就是我们的祖国，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当然，这里不能不提到，受雇于台胞家庭的北京佣人，尤其是在主人家庭中身份、作用特殊的奶妈，使台胞融入京城生活起着重要的桥梁、媒介作用。她们常把北方城乡习俗、杂粮面食制作、民间谚语传说、土话方言以至胡同街坊里的趣闻琐事，带到台胞家庭中来。“宋妈”所以成为《城南旧事》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是同她在林家这个台胞家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

台胞家庭中的语言往往是多元化的，在海音家里父亲的客家话和母亲的闽南话相互通用，后来闽南话占了上风，连“宋妈”耳濡目染也听懂几句。海音和妹妹自然是讲得一口地道的京白，但也会唱客家民谣《想心肝》，又听得懂闽南民谣《天乌乌》。旅京台胞看病吃药也是中西兼用，我喉头的扁桃体就是小时候父亲请同仁医院一位日本大夫割除的；而奶奶患高血压症，父亲却请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来家

诊脉开方。《城南旧事》里的英子发烧，她父母要么就请日本山本大夫来出诊，要么就到西鹤年堂中药店买“万应锭”服用。这都是“番薯人”家庭中习以为常的。

北京“番薯人”的婚丧大事并没有老北京人那么多的礼数和讲究。我的父母1925年9月1日在台湾结婚时，只在台北市江山楼饭庄摆了两桌酒席，请当时的台湾文化协会主席林献堂先生证婚，由王敏川、洪炎秋做介绍人，并且按中国法律在福建办理了结婚证书。林海音是台湾姑娘嫁入旧京官宦人家，是按当时北京大户人家新旧结合方式举行的婚礼，地点在协和医院大礼堂，新郎夏承楹着燕尾服，海音披白婚纱，左右有伴郎伴娘。男主婚人着长袍马褂，女主婚人着晚清妇女大礼服，我父亲是介绍人，着西装。现在我手头仍保存着海音赠送的当年的婚照。关于北京“番薯人”的丧事，据北京会馆研究学者白鹤群先生告诉我：京城曾有台湾义地一处，位于现在的崇文区幸福大街永生巷4号三露厂内，1956年时尚存坟墓70至80座。也有些台胞驾鹤西去时遗骨仍愿叶落归根，如林焕文先生病逝后，采取了当年还很罕见的火化方式，然后将骨灰运回台湾新竹头份庄祖坟安葬。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中国是台湾的祖国”，这在老一辈“番薯人”心目中是毫无疑问的。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割台的《马关条约》时，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和台籍官员痛心疾首上书光绪，斩钉截铁地表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日）人俱生”；“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当时有位70多岁的高山族武举叫胡盛兴，毅然从北京返回台湾，在高山族地区组织民众抗击犯台日军，半年中杀敌过百（据金果《台湾史料》）。日本割台后的30来年间，大批“番薯人”摆脱日本统治，到祖国求学、定居。据当时在台的日本总督府警务局分析：“他们把支那（中国）视为民族的祖国而仰慕思念，对支那5000年的文化传统引以为荣，且对之怀有憧憬之念。”（引自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记》）

从1920年到1930年，在北京13座大专院校读书的四五十名台湾青年中，政治信仰虽各

不相同,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等,但坚持中国人立场,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则完全是一致的。1922年1月成立的北京“台湾青年会”,积极支援、策应台湾岛内反抗日本统治当局的斗争,林焕文先生就是其主要成员之一。该会多次印刷宣传文件向岛内散发,1923年“台湾民选议会请愿团”被日本警察拘捕后,北京立即召开了“华北台湾人大会”进行强烈抗议。当时,最为激进的团体是“台朝(革命)同志会”,该会主张台湾人与朝鲜人携起手来,舍身奉献,不计成败,不择手段地展开反日活动。林海音之叔林炳文参加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团体,在他的床底下藏过炸弹。1926年林炳文奉团体之命,携经费拟经东北潜入朝鲜,不幸在大连与朝鲜抗日志士一同被日人逮捕,并被毒死于狱中,牺牲时年仅25岁。林焕文先生去大连收尸,伤心生气,回京后即病倒,于1931年去世,这是林海音一家人亲身遭遇没齿难忘的国仇家恨。

林海音曾说她“写东西从不政治挂帅,也不



1924年,林海音7岁时与叔叔林炳文、妹妹燕珠在中央公园

高喊革命”,但我们从她作品里看到的是她那一颗堂堂正正的中国心。她一向把北京和台湾看做是自己的“两个故乡”,在台海两岸尖锐对立和严密隔绝的60年代,她毫不顾忌地写出:“当我在北平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小远离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回到台湾一十八载,却又时时怀念北平的一切,不知现在变了多少了?总希望有一天喷射机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可以常来常往,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人生应当如此,我相信早晚会做到的。”这就是说,在林海音心目中,台湾和北京一样当然都是中国的地方,而且相信暂时分离的台海两岸是一定会统一起来的。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十分钟情和精心雕琢的作品,1960年出版后印刷过十几版,1983年重排时又配了20多幅图片。在该书的扉页上,她郑重地写下:“谨以此书献给先母林黄爱珍女士——一位中国的女儿、中国的妻子、中国的母亲。”林海音把她最心爱的作品献给冠以三个“中国的”崇高名词的一位纯粹台湾女性,在她看来台湾人当然就是中国人,而“中国的”这三个字,是多么的光荣和骄傲!

1984年她在美国旧金山一次文学集会上,发表《回顾台湾文学的启蒙与成长》的演讲,批评“认为光复前中国新文学界在台湾是一片空白”的观点,说明“台湾虽然在日本窃据下,可是文学界还是一脉相承的跟祖国一样进展”;并指出“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也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谈到台湾光复后直到60年代的台湾文学界时,她认为尽管有流派的不同,社会意识的论争,但“主流只有一个,那就是都是中国的”。

1991年2月林海音在台北《联合报》副刊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针对一些发言表示:“我觉得海峡两岸还是有前瞻性的希望,我们不必觉得悲哀”。她在1993年秋,第三次回京后写了《我的京味之派》一文,“结语”中充满自信地说:“两岸的文化交流应当不仅止于此,以后会永远永远的下去,直到有一天,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我是这样地期待着。”

(责任编辑 洛松)

# 由评价两位皇帝 触发的两桩公案

□ 李一鑫

五、六十年代若干以权力干预学术的事件中，由郭沫若对秦始皇和吴晗对明太祖的历史评价问题所触发的两桩公案，是颇有代表性的。

秦始皇嬴政和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在位时间相差 1500 余年，却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如：都是开辟一个新王朝并独创一套国家体制，给后世的历史走向留下了非常深刻久远影响的开国皇帝；都有过人的文韬武略和显赫的文治武功；都非常专制，大权独揽于一身，置百官于办事役吏的地位；都“钳民之口”，防民甚于防川，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心狠手辣，杀人过多的暴君；都要求子子孙孙千古坚持他们的训示，想要把万世一系的基业永远传承下去，等等。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因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每每见仁见智，特别是对于像嬴政和朱元璋这样以其一生之惊人作为而深刻影响了历史的大人物，褒贬不一更是不足为奇。当然，这样人物在世时，由于权力的支撑，他们是很少听到或根本听不到不同声音的，是非功过只能留给历史去无情评说。至于评议当政人物，在现代，则已是人民的固有权利，除非涉及诬蔑伤害，法律是予以保护的，而不许评议倒是非法的，更是做不到的。在“偶语者弃市”的皇权专制时代，比较豁达明智的是武则天。她在读骆宾王《讨武曌檄》时，不但丝毫未因文章中那些贬损嘲骂她的言语而震怒，反而抚掌惊叹作者的才华；更难得的是，她遗嘱不许替她镌刻歌功颂德的墓碑，只留下了一块独绝千古的白板无字碑，把平生一切尽付后人评说。看来她深知，为逝者特别是权

势人物洋洋洒洒嘉言孔彰的惯例，终归代替不了时人和后世公论。这种大见识，在传统中国，是权势人物乃至绝大部分常人绝难免俗达到的。而评议历史人物，即使在旧时代也属学术范畴。秦始皇虽有“以古非今者族”的峻法，历史却证明这样的法再严峻也行之不远。他死后不过几十年，司马迁不是就在《史记》里无情地褒贬了他一番吗？

因此，历史学作为科学，不但在于它经过沉淀澄清而达到真实，而且在于它经过广泛争鸣而达到厚实。学术自由始终是历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因学术观点特别是历史观点而获罪得咎却司空见惯，企图以权力为历史一言定谳的事也屡见不鲜。

人们知道，毛泽东从特定政治眼光出发，对嬴政、朱元璋这两位皇帝都是颇为欣赏的。为此，他以革命权威的身份和口气，对鼎鼎大名的郭沫若、吴晗，提出了罕见的毫不客气的批评。而由于我们的体制和他的地位威信，这种批评总是具有无上威力，影响既深且大。

## 毛泽东对郭沫若 批判秦始皇的批评

郭沫若在他 40 年代的名著《十批判书》中，有一篇《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文中除了对《史记》所述秦始皇实为吕不韦的血肉这一艳情秘史加以质疑外，主要是论证吕不韦与秦王政的矛盾在于政治理念的不一致，导致后来秦始皇罢黜吕不韦并坑杀了若干儒士。郭文认为，从吕不韦所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的去取褒贬，

可看出“它主张君主无为，并鼓吹儒家的禅让说，和‘传子孙，业万世’的观念根本不相容”，“它的每一篇每一节差不多都是和秦国的政治传统相对立，尤其是和秦始皇后来的政见与作风作正面的冲突”。因而，在政治上，“吕不韦可以说是秦始皇的死对头”。

这篇文章还认为，吕不韦是反对家天下制，尊重民意，赞成哲人政治，主张天下为公的大政治家。而认为秦始皇“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不仅焚书坑儒，把天下变成“一面大刑狱的网”，并且“沿守着秦人的原始信念”，认定“群神分镇的宇宙……是固定不变的”，“他自己就是至上神的化身，所以他的天下也应该万世不变”；他同时“又是一位纵欲主义者”，其“宫室壮丽惊人”，生活“极端纵欲”。基于此，郭沫若甚至对吕不韦与嬴政有这样的扬抑笔墨：“这并不是两个人的对立的问题，而是两个时代的对立”；“吕不韦是封建思想的代表，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吕氏可以算得是一位有数的政治



秦始皇像

家不幸遭受迫害，并被埋没了两千多年”。

而毛泽东欣赏秦始皇并非始于“文革”。他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及范文澜写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对这一观点予以肯定之余，又指出：“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直提倡厚今薄古的，这里把秦始皇引为同道，可见评价之高。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时，高度概括又高度形象地说了句极具个人色彩的话：“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706页）这句话后来被简化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样一句公式化语言，不但成了毛泽东治党治国理论的凝缩，更空前提升了秦始皇的现实政治评价。

秦始皇究竟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和伟大改革者呢，还是“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的旧制度复辟者呢？显然，毛与郭观点是大异其趣了。这就伏下了后笔。

到了“文革”毛提出“批儒评法”时，对于郭沫若的旧作《十批判书》（按：此书陆续写于1943—1944年）中有关秦始皇的问题，就不能不重新提出来作一番清理了，否则会不利于“批儒评法”运动的展开。而“批儒评法”及“批林批孔”，又是“文革”后期一场重头戏，是关乎毛晚年“继续革命”理想的实现，和身后重要人事部署的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于是，1973年7月4日，毛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话题转到《十批判书》，指出：“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话语份量之重，超乎寻常。接着，8月4日，毛又向江青念了自己的诗作《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按：此诗传抄不一，如第三句中的“魂”字，



有的传抄为“秦”，恐未必是。二字相较，“魂”更深刻。秦“二世而斩”，国脉断了，作为朝代不能说“犹在”，但秦的立国精神即所创立的政法制度，却留给了后世。又第二句“要商量”，有的传抄为“待商量”；第四句的“孔学”，有的传抄为“孔子”，似亦可推敲。）

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呈郭老”的，已不详。但念给江青听则有日可考。在那“传达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不过夜”的时代，念给江青听，就意味着“不过夜”传遍神州。果然一时争相传抄，甚至纷纷作为“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器”正式传达。尽管诗题中有个表示恭敬的“呈”字，但批评的口气，特别是批评一旦由江青其人传出而必然挟来的不寻常的声势效应，就早已离平日的诗词唱合乃至学术讨论十万八千里了。而且，《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不过是郭的十批判之一，十篇中还包括其他，如郭对自己早年作品中一些自以为“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经反思所写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是反映了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的严肃治学精神的，毛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便也一古脑儿否定掉了。

这还不算，接着，在同年9月23日毛与外宾谈话时又提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转引自《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46页）这就直接把秦始皇历史评价问题现实政治化了——反对秦始皇就变成了影射毛泽东。

幸亏郭老的文章是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如果说是以古讽今，那也是另有讽的对象；若是在“文革”前写的，那会招致什么后果呢？

## 毛泽东对吴晗 批判朱元璋的批评

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1943年，吴晗先生写了《明太祖》（又名《从僧钵到皇权》）一书。1947—1948年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扩充，写成《朱元璋传》。在这两本书中，吴晗对出身于流浪儿，当过托钵讨饭的沙弥，参加过农

民起义并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贬多于褒。

总的来说，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在他的起义军逐渐强大，特别是招引和重用了刘基、宋濂等浙江豪族名士之后，一方面，这些儒生“利用元璋的雄厚军力，拥之建立新朝，以保持几千年来传统的秩序、习惯和文化，保持巨室豪绅的利益”；另一方面，“元璋也利用巨室豪绅之护持，儒术之粉饰，建立他的万年基业”，并“自命为旧秩序之恢复者和旧文化的护法人了”。也就是说，朱元璋是叛变了起义并完全成了起义农民对立面的一个新的封建统治者，“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给予朱元璋这样一个历史定位，是空前的史笔，是作为一位有创见的历史学家的独立见解。他所根据的事实，择其要端，大体如下：

朱元璋出身贫苦，吴晗在其出身上特意加了若干“小”字：“小沙弥”、“红军的小兵”、“小亲兵”、“小军官”……等等。“小”，无非指出身低微，算不了贬损，但却另有一个很具贬损意义的



明太祖朱元璋

词语：“小流氓”。吴晗认为，朱元璋从17岁起大约八年时光无所事事，只在皇觉寺做个既不礼佛又不嗔经的挂名和尚，凭着一袭僧衣托钵游方混饭吃，应属封建社会的流氓无产者，这就把他和一般贫雇农区别开了。而写到日后朱元璋发迹，又用了几个“大”字：红巾军“大元帅”、“大丞相”，最后是“专制独裁的”“大皇帝”。“小”“大”对照，凸显着作者深刻的讽意。不但是说，由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不可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共产党宣言》语），而只能照单抄收旧的统治方式；而且是说，若是农业社会的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这样的人建立一个新朝代，他就往往会重现其流氓本质，以流氓手段对付一切人，包括一同起义的袍泽和广大农民。其结果，新朝代建立，绝非是农民新的欢乐节日，而是农民新的灾难，甚至是更大的灾难。

在《朱元璋传》后三章里，作者历述朱元璋得势后如何背叛和出卖农民军。除设计溺死已故红巾军领袖“明王”韩山童的幼子“小明王”韩林儿，篡夺“明教”“明王”的“明”字为自家国号外，并赶尽杀绝其他各路农民军领袖，把新国家变成了“新官僚养成所”，用军队和新官僚机构这“两个轮子”，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这些，在书中都叙述得相当详尽。例如说朱元璋“政权的维持建立在流血屠杀、酷刑暴行的基础上”，光是宰相胡惟庸、李善长，大将蓝玉等四件大案就株连了几万家，杀人以两位万数计；而出于疑忌防范和刻意报复，大兴文字狱，针对知识分子的警示性大屠杀，则尤其表现了一旦掌有天下后的流氓无产者的本质。

如果说吴晗也有“讽今”之意，在当时，其对象也是十分明确的。

吴晗在解放后曾把《朱元璋传》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回函除了表示“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之外，又说：“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劝其“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至1955年，吴把修改过的书再呈毛看，毛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吴因而违心地四易其稿。但

是，吴晗却又因写作剧本《海瑞罢官》惹起真正的文祸，特别是因为，毛把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一现实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我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场祸就绝对无法幸免了。吴晗终于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死得很惨。

## 两个皇帝两桩公案之总体比较

对秦嬴政、朱元璋的历史功过，向来见仁见智不一。若要把这两个年代相隔如此遥远的开国皇帝试加比较，除了本文开头粗粗列举的两人共同点外，他们的最大不同之点，是否可用如下一语以蔽之：秦始皇是在中国一个历史大转变关头，主要起了促进作用的关键人物；而朱元璋则是在中国另一历史大转变关头，主要起了阻碍进步作用的关键人物。这里，所以在“起了……作用”前头加上“主要”二字，当然是为了充分正视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避免论其一点而不及其余。

为什么给予两人如此不同的评价？

如果说郭沫若对秦嬴政的评价有所失当，或许就在于没有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去评价嬴政一些作为。秦灭诸侯，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修驰道，开灵渠，严法令，统一度量衡，这些都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要求，适应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历史趋势，适应了巩固统一（其统一规模远超过夏商周三代而使历六百余年的春秋战国纷乱时代得以结束）的新国家的需要，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历史的一次飞跃。郭沫若没有指出秦朝这些划时代建树的意义，只着力罗列嬴政的暴政并大加挞伐，甚至把修驰道也说成“动机却完全是为‘游观’”，即为了游玩，“纵欲享乐”。这恐怕失之偏颇。即使不排除“巡幸”包含游玩享乐意图，但“巡幸”也绝不应只等同于“游观”、“纵欲享乐”。六国乍平，统一甫定，修驰道对于传信息（信息之重要，在两千多年前也应不言而喻）、征贡赋、通商旅、调军队、行巡狩等等来说，都是绝对正确的重大举措。

特别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公元前3世纪秦所建立的一套封建政法制度，为后世中国巩

固、发展、完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进而为中国在农业文明方面作出世界性贡献，奠定了基础。而欧洲最早建成封建制度的法兰克王国也只是到8世纪才出现，晚于秦十几个世纪。有说法认为，西方称中国“支那”，就是“秦”的音转。秦朝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应不仅及于中国和东方。

从这些方面看，毛对郭的批评，是包蕴着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得出的极具深刻内涵的正确认识的。

但是，毛对嬴政过分地情有独钟。也是在1958年，在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甚至说：“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语词之严厉，之强硬，乃至之得意，溢于言表，大有“亲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种语调口气。这，当然不仅是为秦始皇的“暴政”辩护，更是为把共产党比作秦始皇进行辩驳。但不能忘记，秦末农民大暴动正是由于不堪忍受暴政而爆发的这一严重历史教训，不能把这位创建中国封建统治制度的“千古一帝”以及他的历史作用拔高到连他的暴政都可忽略的程度。“百代都行秦政法”，那是指封建王朝的“百代”，解放了的新中国要不要“行秦政法”？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秦始皇毕竟是创建了最严酷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家天下”者。“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公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封建帝王专制掺杂糅和，只有生长在东方封建土壤上的某些革命领袖人物才会有这种特殊思维惯性和行事惯性，在西方是不会出现这种思路的。东方有穷苦百姓揭竿而起的优势惯性，却又容易有革命之后走封建专制老路的劣势惯性。这也许正是中国过去某些领导人在斯大林的错误被揭发以后，仍旧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循着斯大林的错误路数，重犯极左、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迷信等系列性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对朱元璋的评价，除了“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肯定”之外，毛还认为他是个“好皇帝”。毛曾说过：“明代只有两个好皇帝，一个明太祖，一个明成祖。”这些看法恐怕大大值得商

榷。不以实践检验的结果论人，而只以出身成份和社会集团归类站队论人，只因为“是农民起义领袖”，就“应该肯定”、“应该‘写’得好点”，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朝代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时代开始之际有影响的关键人物，朱元璋究竟应不应肯定，只能由他对历史所起的长期而不是一时的作用来论证。

明代开始之际的14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总体文明程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世界公认的。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比之商业发达的地中海沿岸欧洲诸国，至少绝不逊色。除了农业技术之外，中国的建筑、冶炼、纺织、瓷器、造船等技术，也都在西方之上。明初“三宝太监七下西洋”（1405—1433）的壮举，就是一次相当全面的综合国力显示。第一次出洋，光是载重约1200吨的巨舰就有62艘，兵员共约27800人；第二次出动兵员竟达3万余人。而所载武器之先进，宝贵珍物之丰富，在航海史上均首创“世界之最”。仅此一斑，似乎就可以略窥当时的综合国力之全豹。

就在比这稍晚的一个时期，欧洲开始了向海洋的真正征程。先是葡萄牙、继而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它们向海外发展的原因之一，据说就与《马可波罗游记》所描写的东方大国（元朝）“遍地黄金”的吸引力有关。（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为了逐利，1509年，葡萄牙船队到达马六甲，1513年进入屯门（今属香港新界），1517年进入广州。在帆船时代，能以如此之快的脚步克服沿途障碍，走向远东，速度可谓惊人！其后，西班牙人则企图另辟蹊径，从相反方向寻觅到远东的道路，结果却成就了“发现新大陆”和第一次绕地球航行一周的事业，从而开始了拉丁人的殖民潮。紧跟着，荷兰、英国相继代之而兴，成为新一代海上霸主。西方“征服世界”的又一章历史就此掀开。

然而，作为曾以其繁荣富庶惹得西方倾慕的“天朝”，在葡萄牙船队来到广州要求贸易时，明朝廷先是“允留货物，给予赏赐”，令其走人；后来则是下令驱逐。这是因为，朱元璋在立国后，就定下了禁海的国策。“三宝太监七下西洋”之壮举，原来并非要开展海外贸易，而是扬我国

威(或云是明成祖朱棣篡位后,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有消息说其逃亡海外,朱棣为了剪草除根,务求找到这个流亡皇帝,才派心腹太监郑和频繁带兵出洋)。朱元璋不仅禁止海外贸易,而且在国内严格推行秦汉以来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他创制“黄册”,以户口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一般不许出外经商,并往往寻找借口籍没富商(最有名的如江南首富、巨商沈万三等)财产,从而大大地压抑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种为了充实皇家财库,保证皇朝稳定,而压制广大人民发家求富渴望的政策,与西方积极发展贸易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快速增长的路数适成对照。朱元璋的思路说明,他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出身是多么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政治视野和政策取向。

一般认为,在中世纪晚期,中西方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事实上,单以工商业而论,中国当时也是比较领先的。元末明初,中国(特别是江南)商业城市、手工工场、行会、有专业分工的工商户和城市雇工(这两种人形成城市市民阶层)都已大量出现,而封建制度则已暴露出盛极而衰日薄西山之象。这应表明,当时这个东方大国已大体具备了产生新生产关系的条件。但是,朱元璋最后篡夺了其领导权的农民革命胜利后,非但回到了封建主义,反而以更严厉的形式重铸了封建皇权的上层建筑。而遵照祖训恭谨守成的朱家子孙,非但守成无能,反而越来越腐败堕落,终至也为农民起义推翻。这是历史对朱元璋重铸封建帝国梦的嘲弄。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进入社会新阶段。没有理由认为在相同条件下,东方就绝对不能由发达的自然经济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上层建筑,是有没有出现适应时代要求的伟大历史人物来推动上层建筑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伟大历史人物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是一种偶然,而必然总是通过偶然来完成,历史总是通过看似偶然出现的人物来写。不幸的是,朱元璋不是一个“好皇帝”,而是一个历史侏儒。而明末以东林党和复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腐朽的封建政治的强烈批判,则表现了

一种历史的觉醒。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觉地给予自己以这种历史角色,但这种角色的出现却是迟早的必然。吴晗仅仅以朱元璋重建暴虐的封建统治而指斥他背叛农民,这还不够。朱元璋的“革命”没有为中国带来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支持当时的工商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支持当时海外贸易势力的发展。相反,从明朝起,继之以清朝,都曾大力抑商,都曾以禁海的峻法对顽强的出海经商者予以残酷镇压。在同一历史时期,在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亦即走向新发展阶段的态度上,西方主动进,而中国主动退,因而中国也就把氤氲化育中的资本主义胚胎闷死于母腹之中,从而空误了历史给予中国的机遇。这,才是朱元璋及其子孙(包括姓朱和不姓朱的)最最对不起后世中国人的。

因此,不止吴晗先生,台湾的柏杨先生在其《中国人史纲》中也认为:“明朝在血流成河中通过瓶颈”(指历史的“瓶颈”),从此“东方和西方发展的方向,分道扬镳!”美国历史学家博克塞则说得更引人深思和浩叹:“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转引自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

曾经有文章说,所谓清朝“康乾盛世”是落日的辉煌,其实稍作比照,苍凉的落日景象自明朝中叶以后就早已显露无遗了,“康乾盛世”只不过是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

“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对秦始皇和朱元璋这样的封建集权制代表人物的欣赏态度,有没有对他的思想行为风格产生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刻研究总结教训的话题。但作为拥有很大权力的领导人,如何慎重对待学术自由问题和拥有学术自由权利的学者,如何分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什么问题上要集中权力,什么问题上不能,则是一个更为严肃的现实问题。

这两桩公案,应为我们提供许多思索空间。

(责任编辑 致中)

# 「开眼看世界的」

## 林则徐与其友魏源

□ 朱天策

史料考证表明，清朝最早向国内宣传西方文明的先驱是林则徐和他的挚友魏源。重温这段非凡的史实，有助于我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林则徐这位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他凛然正气，销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的英雄事迹，在我国可谓妇孺皆知。本文着力介绍的则是常被一般读者忽略的林则徐在长期的禁烟斗争中，从细心研究敌情入手，继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被后人称为“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一面。

林则徐（1785—1850），福建闽侯人，生于一

个比较贫苦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青年时代起，他就开始研读《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等经世致用的著作。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27岁的林则徐中进士，选庶吉士。从这年起至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林则徐历任编修和江西、云南的正副考官。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起他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任职，办理过军政、漕务、盐政、河工、水利等事务，由道台升至巡抚。1838年12月（清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在第五次进见皇帝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烟毒泛滥最重的广东禁烟。1839年3月（清道光十九年正月），林则徐在广东采取果断措施，迫使英国鸦片商缴出鸦片近2万箱、2千余袋，6月3日在虎门当众销毁，取得了禁烟运动的重要胜利。

但颇有战略眼光的林则徐冷静分析形势后认为，英国殖民者一定不会甘心失败，必然会来报复。为了长期斗争的需要，林则徐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夷情”，特别是英国方面的态度和动向。为此，从1839年2月起至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在他的钦差行辕，组织人力翻译西方报纸和书籍，藉以了解“夷情”和学习自己迫切需要知道的知识。由于不懂英文，林则徐招募了当时社会上少有的专职翻译人才四名，他们是：早年印度塞兰普尔教会学校学生亚孟，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受过教育、当过北京俄国使馆拉丁语译员的袁德辉，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康华尔基督教会读书的亚林，以及在美国传教士家庭生活了八年的梁进德。他们按照林则徐的要求从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上翻译《澳门新闻纸》（即报纸）的相关内容，“抄齐，统订数本”，并按类别编辑成《澳门月报》，除供林则徐参阅外，还把其中有重大价值者附奏进呈给道光皇帝。为了直接探访外情，林则徐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学习英语词汇，以应接见外国人之需用。林则徐曾直接向英国人喜尔询问英国与土耳其的情况；他请为他诊治眼疾的美国人伯驾参与西方《国际法》的摘译工作；他还向英国人喜尔和孟加拉人沙结了解鸦片的种植、制造、品种和价格状况。这在视外国人为“夷人”的时代，敢于学习“夷语”，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是罕



林则徐

见的。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林则徐又命人从西方报刊上摘译评论中国的资料,编辑成《华事夷言》一书;由袁德辉和伯驾从瑞士人滑达尔1758年出版的欧洲近代国际法权威著作《国际法》摘译有关内容辑成《各国律例》,成了中国最早的国际法中译本,比美国牧师丁韪良1864年(清同治三年)出版的《万国公法》中译本还早了25年。林则徐还命人摘译了英国僧侣地尔注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

尤其重要的是,自1839年下半年至1840年,林则徐亲自主持翻译了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于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在伦敦出版的新书《世界地理大全》,并将其中译本定名为《四洲志》,这部世界最新政治、地理与国情著作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布朗牧师赠送给林则徐的。它的译著问世非同凡响,从此开创了近代中国探索研究西方——西学东渐之风。

由于国力的羸弱和清政府的腐败,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1年7月13日(清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受投降派的诬陷,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戍

边。次日林则徐离开居地镇海北上新疆,挚友魏源闻讯从扬州赶来相送。8月两人在镇江相会,同宿一室,对榻倾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译著和全部翻译外国书报资料赠与魏源,叮嘱他根据这些资料抓紧时间编撰出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的著作《海国图志》,以便中国公众及时开阔眼界,尽早了解世界。魏源早有此愿,当即郑重地接受了林则徐的嘱托。

魏源(1794—1857)是湖南邵阳湘潭人。他15岁中秀才,29岁中举,后屡试不第,捐资为内阁中书。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52岁时才中进士,官至高邮知州。是清代与龚自珍齐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一生勤奋好学,著述甚丰。中进士前长期在江苏充任地方督抚的幕友,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时,魏源常至林则徐幕内磋商兴利除弊事宜,协助林则徐处理公务,两人成为挚友。

1825年(清道光五年)魏源被江苏布政使贺延龄延聘入幕,帮助贺延龄在漕粮改河运为海运,确保京师粮食供应上大获成功,从此开始了他的“经世”实践。魏源还协助贺延龄主编120卷的《皇朝经世文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1829年(清道光九年),他循例纳资为候补内阁中书舍人,内阁为清政府政令发出之所,典藏书籍极为丰富,魏源置身其中,博览群书,见闻日广,使他不仅更加熟悉和了解清代历史和典章制度,而且也领悟理解了其沿革与发展。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打破了魏源的书斋生活,他坚决支持挚友林则徐的禁烟主张和抵抗政策,并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加了浙东地区的抗英斗争。因投降派昏庸误国,魏源愤而辞职。1840年9月,攻占定海的英军军官安突德在浙江海面上被俘,在两江总督陈銓幕府的魏源应邀到宁波军营审讯他,并就安突德口供,旁采其他资料,写成《英吉利小说》,魏源自此开始对英国有了初步认识,萌发了“师夷”的思想,也形成了他写作《海国图志》的初衷。

鸦片战争开始后,魏源在扬州密切注视着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运动和时局的发展,他理

解林则徐的思想和正义果敢的禁烟措施，同时也为林则徐的个人安危和国家的命运担忧。林则徐被投降派陷害、革职遣戍的消息传到魏源耳内，他义愤填膺，怒作《寰海》诗十一首，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投降派的血口诬人，指责战和不定和自毁长城的可耻行径。当他得知林则徐即将北上赴戍的消息后，立即从扬州赶赴镇江，看望阔别五年、时运不济的挚友，彻夜长谈，接受了林则徐赠送的《四洲志》和全部翻译外国书报资料后，面对挚友的郑重嘱托和自己师夷思想的即将实现，魏源激动感慨不已，他又赋诗两首，追忆这次难忘的志同道合者的会面。他不曾料到的是，这次会面竟是两人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海国图志》遂成为两人友谊的见证和思想共鸣的结晶。

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魏源得知消息后，受到极大震动。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政府因腐败而导致软弱，若不进行改革是难以继的。他想通过清朝开国以来的历史找出盛衰之由，兴替之渐，再提出匡时济世的治安良策，于是写就14卷的《圣武记》，为《海国图志》的问世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半年后的12月，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编撰成50卷本《海国图志》，这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理历史专著是中国研究世界的开山之作，它以林则徐的《四洲志》为基本素材，又参考了魏源自己搜集、友人支援的历代史志，以及国外的舆图、书籍和外国传教士的最新著作，补充了很多林则徐无法找到的资料编撰而成书，较之《四洲志》更为全面、系统和完

善。

《海国图志》全书57万字，比8万字的《四洲志》增加许多内容，50卷本刊行以后，普遍受到社会欢迎。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海国图志》由50卷本扩充至60卷本，文字升至60余万，书中增加了对海外各国的概况介绍，新书在扬州刊行。1852年魏源又亲自到澳门、香港实地考察，访求资料，继续将60卷本又补成88万字的100卷本，刊行于高邮。林则徐赠给魏源的有关鸦片战争的档案资料和组织翻译的《澳门月报》等国外书报资料，也都利用起来编入书中，在《海国图志》中分别注明“欧罗巴人原撰”、“侯官林则徐译”和“邵阳魏源重辑”。

魏源在解释自己编著《海国图志》的目的时说：“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在世界各地的侵略和剥削，特别是它的东扩直接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并探讨了英国“兵贾相资”的海盗式贸易与致富政策，指出其原因是英国政治制度造成的，要对付列强的侵略，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只能学习它的长处来与之抗衡。

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思想影响下，自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派开始出现并形成了后来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人物左宗棠主持重刻了《海国图志》，并亲自作序。另一位洋务派重要人物张之洞说：“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纸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介绍，也给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要启蒙。康有为早年读过《海国图志》，22岁时“复阅《海国图志》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梁启超则说：“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他还说：“魏氏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自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

林则徐和魏源不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不甘落后、倡导新思想的先驱！

(责任编辑 舒元璋)



魏源

# 楚图南接受“审查批斗”时写的“早年经历”

□ 楚泽涵

父亲楚图南“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69年接受“审查批斗”时，由父亲口述，母亲彭淑端记录，写下了父亲的早年经历。这篇最后经父亲修改过的短文，对于人们了解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楚图南无疑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此文写于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中有许多“话外音”，通过父亲事后的回忆和我的理解，介绍出来，一定是有意思的。

父亲说：

我是云南省文山县人（文山县在云南省东南角，与越南、广西交界处，距云南省会昆明较远）。189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祖父是私塾先生，死得很早。父亲由祖母抚养长大后，与祖父一朋友的女儿结婚。因母亲年龄大于父亲，因此两人感情很不好。母亲生我兄妹两人后，父亲即离家去云南省会昆明。六岁时，我母亲死去，兄妹两人无人抚养。我妹妹即送给一苗族人家作养女，我即由四伯母（称四大妈）抚养。四伯母家也是一贫困的家庭，四伯父早逝，留下二子，加上我，数人生活很难维持。四伯母勤劳朴实，每年为人缝缝补补，织布养猪，并为人舂米维持生活。当时舂米的惯例是领人家一斗谷子，舂成米后，缴还七升，余下的碎米即我们数人的主食，其余糠渣等还可留下饲养一个小猪。所以我小时即帮四伯母浆纱、喂猪，还从城外挑水进城来卖。

文山山多，天气暖和，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野菜，因此我小时，采摘过各种各样的野菜，

也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

父亲这里专写摘野菜、吃野菜一小段的背景是：

当时军代表组织的吃“忆苦饭”活动，年已七十并患胃溃疡的父亲被某“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造反派头目勒令吃下两大碗野菜，并被训斥：“让你们这些当官做老爷的尝尝你们一辈子没吃过的东西！”据父亲后来回忆，吃野菜不难，只是两大碗多了一些，好在后来也没有出毛病。只是被斥为“没吃过野菜”，而且是“一辈子没吃过”，颇为不服，因此在其自传中特别写了一句“也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按父亲事后的回忆及我的理解，这句话的另一重意思是：“我吃野菜时你们（指某些造反派头目）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另外父亲认为当时不可一世的军代表，“忘了他们是吃什么长大的”。

父亲说：

我家附近有一私塾，有些小朋友去上学，我因无钱缴学费，只能偶尔跑去听那位老师讲课。那位老师看出我的心愿，也知道我是穷苦勤劳的孩子，被破例免费收取我做学生。因此我断断续续、“半工半读”地读了两年私塾。后来在文山的新式小学也听过几天课，但没有上过正式小学。

我十二三岁时，四伯母的生活更加艰难，已不能再继续抚养我了，于是打发我去昆明找我父亲。我即随着马帮步行经宜良到昆明，寻找我父（由文山到昆明，相隔大山，单人不敢行走，必



须与马帮结伴同行)。

当时父亲在昆明教书,已娶后母(原文在此句后有“我饱受后母虐待”一句,后被删去——整理者记),生活又很痛苦。经多方要求,考取联合中学。当时学校有个规定:即每学期、每学年考取前三名者,免收学费。我则争取每期、每年考在前三名。所以我是在这种情形下读完中学的。中学毕业后,不可能再继续升学,找职业也很困难。有人劝我去学经商,到店铺当学徒,我不愿意。恰在此时(时在1919年春夏之交——整理者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来昆明招公费生。我报名投考,经初试录取。但经初试录取后要到北京复试。由昆明到北京,那时内地不能通行,必须经安南(今越南)的河内、海防,再由海防由海路经香港到上海、天津到北京。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旅途费用很高,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大难题。后经父亲向友人借贷援助凑了六十元,历尽艰苦到了北京。1919年秋经复试后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录取。在高师四年,因经济困难,又因北京与云南相距太远,每年寒暑假,其他同学都可回家,我则整整四年没有离校。我的寒暑假即在高师图书馆度过。我在图书馆读了一些旧书,受旧教育旧书籍影响,也中了一些旧东西的毒害。同时这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是“五四”运动后,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因此也读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和刊物,也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和进步人士,并参加了工学

会。这里谈到阅读进步书刊云云,也是针对“军代表”的。当时,军代表曾“义正词严”地“批判”过父亲:“你们过去念的书,统统是封、资、修的大毒草!”因而父亲在自传中有上述语句。据父亲事后的回忆及我的理解,有一些没有知识或知识不多的人,往往对知识和有知识的人,表现出或为嫉妒、或为敌视的心态,可惜的是这些人往往有权在手。个别握有重权者甚至以整有知识者为业、为乐,这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理应消除的这种现象不仅没有结束,有时反而变本加厉,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结束。应该说这是现代这一辈人不能忘记的教训!父亲在新时期中发表的一篇文章

中曾提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仅要有方法和措施,还应理顺干部的思想和情绪,这些提法,实际上早在“十年浩劫”中已在酝酿。另外,还要说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实有很大成是属于“还账”性质。而且将知识分子视为异类的种种“理论”,如“翘尾巴”论等,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清算。

父亲最后回忆了他加入共产党的情况:1920年经许兴凯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传记中记为1922年加入S.Y.,应理解为1920年即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整理者记)。1923年前后,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编辑并出版了《劳动文化》期刊(共出版过五期,为4开铅印小报,现已无存——整理者记),撰稿者有施存统、蔡和森、向警予、许兴凯等人。1923年至1925年经李大钊同志嘱托,先后赴安徽阜阳省立第三师范、云南昆明昆华中学、成德中学、昆华女中等校教书并做青年学生的宣传鼓动工作。1925年底应北方党组织及李大钊同志召唤回到北京,被派往东北,到哈尔滨等地工作,经李大钊同志批准,由杜继曾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即在东北各省,通过组织的安排,做青年学生的教育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中间一度到山东曲阜、泰安、济南等地工作,直到1930年又回到哈尔滨,在第一女中教书。是年12月,因长春学潮,砸毁教育局,我被捕,解送吉林监狱。

父亲是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1930年在东北被捕之后,一度与组织失掉联系(直到1978年中央组织部同意其党龄从1926年算起)。出狱后,他追随党的领导,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66年“文革”前,中共中央批准他公开党员身份后,他同时担任对外文委党组成员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文革”中父亲遭林彪、康生、江青迫害,想将那时最恶毒、也最“时髦”的恶名加在父亲身上,所以父亲才在这里写下他人党的经过,并写了他1930年底被捕的事。

关于在狱中的抗争及活动,父亲另有专门材料说明。

(责任编辑 洛松)

# 炎黄春秋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欢迎订阅  
2001年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自1991年创刊以来，高举爱国大团结的旗帜，秉笔直书今古中外大事。不增美，不益恶，坚持求实存真。

《炎黄春秋》拥有大批高水平作者。有的是老革命家，重大革命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专家学者，对重大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2001年订价每期仍为4.80元。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在邮局订阅不便者，可向本刊发行部邮购，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翘首期待 衷心祝贺

# “经济全球化 与 中华文化走向” 国际学术讨论会

——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首次会议

**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

**会议时间：**

2000年10月25—29日

**会议地点：**

北京东长安街  
中国妇女活动中心  
好苑建国商务酒店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任大会筹委会主任。

▲大会得到季羨林、张岱年、任继愈、金冲及、戴逸、李文海、饶宗颐（香港）、李亦园（台湾）、林达光（加拿大）、沟口雄三（日本）、熊玠（美国）等著名学者的积极支持和响应。

▲张岂之、丁守和、汤一介、方克立、刘梦溪、葛剑雄以及一批活跃在学术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已寄来论文（或论文提要）70余篇。